

炎黄春秋

第 **3** 期
2005年

吴江：试解“共产主义”之谜

世界坐标上的“康雍乾盛世”

夏衍：“我从来不悲观”

苏联拆运我国东北机器史实

“大寨工”对全国农村的恶劣影响

目 录

沉思录

- 1 试解“共产主义”之谜……………吴 江

春秋笔

- 8 “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孙丹年
15 “大寨工”对全国农村的恶劣影响……………消 寒

人物志

- 18 不畏强权的名记者严怪愚……………达 文 严 农
21 杨明斋为陈独秀鸣不平……………吴 晓

一家言

- 25 呼唤工商文明……………武克钢
29 从胡适的一首词说起……………盛禹九
33 从魏延说开去……………桂向明

往事录

- 34 苏联拆运我国东北机器史实……………薛衍天
39 “孤岛”时期郑振铎抢救国宝……………倪怡中
45 二十世纪初的新疆留学潮……………帕哈尔丁

怀人篇

- 47 “我从来不悲观”
——夏衍同志逝世十周年祭……………袁 鹰
51 坚持独立思考的胡克实……………赖诗逸
55 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李新……………魏久明
59 我的老师张治中梁漱溟杨效春……………陶天白

亲历记

- 61 我收藏毛选四卷的遭遇……………樊 思
64 随父亲为新四军采购军需物品……………陶家云

文荟苑

- 66 陈登科提案恢复国歌歌词……………陆志成

九州景

- 68 一九一八年的上海社会风情……………吴国英

古镜台

- 70 世界坐标上的“康雍乾盛世”……………李一鑫
75 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郭嵩焘……………朱 薇

文配画

- 80 虚导与实导
——精神现象零拾……………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周 惠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一鑫
李学勤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凌 云 龚育之
曾彦修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陈 渊

秘 书 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271606)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4.80元

试解“共产主义”之谜

● 吴 江

共产主义的基本要求

近代，主要在西方，共产主义的幽灵并未消失，各种的人提出各种共产主义或近似共产主义的概念。我在这里要谈的自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自《共产党宣言》问世直到苏联垮台，世人对共产主义始终一则以惧，一则以喜。但是究竟何为共产主义，无论惧者喜者至今仍多迷惑不解。无怪恩格斯早在1894年就提出，对“共产主义”一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待能够确切地表达它时才用它。

很遗憾，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重读恩格斯著作时才特别注意到他关于《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几句话。他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说，这就是整个《宣言》的基本思想。而我们却长期没有注意这一点，我想恐怕与我们过去长期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关。80年代中期我们的改革进入一个重要时期，“人”的问题开始引起注意。那时我所写的《社会主义社会关于人的问题》（载《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一书），专门阐述了《宣言》这一基本思想，并且写上：社会主义应明确地将这一点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但是坦率地说，我那时及其后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还是很有限的。

偶然读到《炎黄春秋》杂志（2004年第9期）杜光同志所写《马克思是怎样论述自由的》一文。这是近年在国内少见的论述关于人的自由的文章。至于恩格斯对《宣言》所说的那几句话这几年已被人争相引述了，但大都并未切实阐明

其意义）。他以下述这段话来表述马克思关于自由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他们的共产主义学说时，明显地继承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空想共产主义前辈的思想成果。他绝非偶然地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在早年著作中曾指出：“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而人的本质特征便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是人的本质的复归，争取自由的过程，就是争取人的本质的复归过程，也是人的解放的过程。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人的解放，实现自由。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社会将“以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来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生产条件”，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被简称为“自由人联合体”。

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里我只想补充说明两点：第一，马克思所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是和他所说“全人类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思想相一致的，换句话说，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互为条件的（举例说，20世纪中国每个人的自由解放以全民族的自由解放为条件）。第二，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及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人的自由问题，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功勋，但是他们只是把自由主要理解为一种“理性的行动”，自由以理性为基础，并依靠理性的指导与推动来实现，这是因为他们不能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看待人，因此容易把人只是理解为一种脱离一切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

马克思虽然也承认人的自由“合于理性的本

质”，自由使人们成为理性的存在物”，甚至承认“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等等，但是，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需要“依靠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活动”，即依靠改变一定生产关系状况的实践活动来实现。换句话说，自由不仅要依靠消灭等级（这是资产阶级做到了的），而且要依靠消灭阶级，消灭人的异化状态来实现（这恰恰是为资产阶级所坚持的）。如此才能达到人类的真正解放。而要做到这一点，马克思认为，自由不能仅仅依靠人的理性，它首先需要依靠“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活动”。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现实活动，主要就是指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进行阶级之间的斗争，以消灭现存状况。尤其对前者马克思尤为重视。马克思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人的理想所规定和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马恩全集》中译本第3卷第107页）。这句话十分重要，人的自由活动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达的程度。

而大大小小的阶级斗争不管其动机如何，形式如何，就其总根源来说，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反对生产力的桎梏，推动生产力前进。例如，社会主义

者在一些贫苦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取得某种成功，也能够某些方面为人民争得一定的自由，但是，正像邓小平所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相应地，贫穷也不能为人们争得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自由。相反，有时甚至产生扼杀自由的恐怖行为。这是已为我们的痛苦经验所无情地证实了的。

在社会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

如果说共产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人类解放这一点至少从理论上还比较容易说明的话，那末，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出现何种所有制的问题，单从经验上看就是一个难解之谜了。过去，一般人（尤其是缺乏文化的劳动者和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常将粗陋的平均主义看成共产主义，或者将共产主义与“财富归一摊”混为一谈，尤其是经历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那些人会这样想。这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自然相去甚远。为了提出一种设想，我们或许可以拿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一段话（见《马恩全集》中译本第20卷第143页）来作为这种设想的代表。从恩格斯的叙述来看，马克思是在讲否定的否定规律时，在谈到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将“重建个人所有制”时提到这个问题的。恩格斯的原文如下：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这就是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



吴江

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物。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反对对未来社会作任何凭空想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对未来人类社会提出某些原则性的意见。例如，马克思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消灭任何个人所有制，而是依否定之否定原则在消灭私有制度之后“重建个人所有制”。如恩格斯所表述“这个社会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及其他生产要素，照现在的说法，包括一切生产软件与硬件）归社会公有，除一部分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料外，部分产品即生活资料或消费品则分配给个人所有，这是在剥夺剥夺者之后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状态，恩格斯称之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这种重新恢复的个人所有制毫无疑问是个人自由发展的物质保证，无此保证就谈不到什么自由。个人所有的东西（如家庭住宅、私人花园、交通车辆、日常必要用具、子女抚养、教育费用、免费医疗、各种社会保障，乃至个人研究或实验设施——文化的、科学的等等）均受社会的和法律的保障而不受侵犯。这些当然都需要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来保障。过去像我们所经历的贫穷条件下的那种“归大堆”然后按平均主义进行分配的生活，事实证明不可能使人获得自由，相反，反而会造成一种新的奴役或新的劳动异化。

如果要举出例子，除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人民公社外，在以色列还存在一种名叫“基布兹”的农庄。“基布兹”在希伯来语中是“团体”的意思），它是一种公有制组织，团体的数目曾达三百多个，但它不是被强制组织起来的，而是在恶劣的政治和自然环境条件下，由人们自愿组织起来的。在上世纪70年代，基布兹曾一度创造出好的时光，在死海之滨营造出一片绿洲，被美国一家杂志誉为“人间奇迹”。加入者必须将全部财物充公，成员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外出打工的收入也全部归公。有一位中学教师，她对采访者说，她只愿意暂

时住在这里而不愿加入“基布兹”，因为这意味着丧失自由，你没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和空间”。最近一些年，随着环境的逐渐好转，“基布兹”正经历着痛苦的蜕变和改革，例如，房屋开始私有化了，田地也逐渐“包产到户”，自己耕种、自己收益，食堂不再免费，许多家庭开始在自己家里做饭，外出打工的社员也可以自己保留20—30%的工资，等等。这些无疑也在被逼创造出一种“个人所有制”（关于“基布兹”的材料，根据《青年参考》2004年6月9日的报道）。

以上例子，至少使我们懂得如何创造真正通向自由之路，而避免那种不切实际的“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诱惑。

民主：政治上通向自由之路

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说这样一句话：“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平等的。”例如，卢梭和法国《人权宣言》都这样说。我只想把这句话改一改，改成“人生来应当是自由平等的”。因为，人从一般动物演变过来，好像很自然地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既要任凭自然界的摆布，又要受同类的生死相争，甚至达到人吃人的程度。到了阶级社会，人奴役人、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好像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只有经过漫长的时间，到了阶级社会的一定阶段，人才开始感觉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好像应当是自由平等的，这就是人开始有了理性。这种理性首先由资产阶级表达出来。

资产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来，首先是针对着统治权力，主要是对国家而言，因为国家首先是控制人、支配人、使人丧失自由平等权利的统治机构。这里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当美国人1776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下挣脱出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组织国家，直到1789年才制定宪法正式成立中央政府，其原因，就是美国人惧怕国家权力会妨碍个人自由。欧洲的封建国家没有给人以自由，所以后来人们以“不自由，毋宁死”相争，和封建制度作殊死的斗争。资产阶级从封建主手里夺取统治权以争取自由，主要是用民主的办法，就是利用人民大众的多数，采取选举的办法，从封建主手里夺取统治权力，建立起议会，声称议会就是给人民以自由。资产阶级所运用的民主，当然首先是为资产阶

级的利益及其统治服务，但是越到后来事情越清楚，资产阶级运用民主为自己所用，但民主本身作为一种手段却同时可以为人民力量所利用，使自由平等越出资产阶级的范围，向全社会扩展。

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分成赞成民主和反对民主的两派，一直争论不休。反对者主要以卢梭的《契约论》作靶子实施攻击。本来，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体现着民主、平等和尊重个体权利，和那种人压迫人的丛林法则针锋相对。但是，反对者认为企图用民主手段来保证主权和自由而不侵害个人利益只能是一种幻想。在他们看来，任何主权都必须由具体的个人来行使，不能由“民主”办法产生的“人民代表”（虽然他们自称代表多数）来行使，否则，必然产生“多数人的统治”。而“多数人的统治”以及他们声称所拥有的“总意志”（或称“公意”）则必然产生“绝对权力”乃至产生“多数暴政”，堵塞人们通向自由之路。著名和平主义者罗素就是这种主张的代表之一（中国“五四”运动以后也出现过这类人，他们激烈反对当时提出的民主）。这种人只表达这样一个笼统的概念，即认为：“现代人的自由是一种在法律保障下的生存空间，是个人不受社会与政治控制的权利”。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主张现在不应当有政治、人民代表、国家等等东西。当然，这种主张经不起实际生活的检验，实际上行不通。因为试想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又由谁来制定呢？并且将由谁来裁决执行呢？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就能够去决定吗？因此，很显然，这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无政府主张而已。

当然，当“民主”或“民主国家”或“多数的统治”掌握在剥削阶级、少数富人、资本寡头等类人手里而不受人民制约的时候，完全有可能出现“暴政”、“侵犯人民主权”、乃至出现“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像有人（而且是美国人）所说的，美国是“对内讲自由，对外搞法西斯”的国家。因此，问题在于要将“民主”这一武器掌握在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和集团手中。恩格斯在领导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时候，根据当时情况重新考虑工人阶级斗争策略时，着重地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利用普选权作为“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并且说明：“《宣言》

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并特别说，我们的同志绝不会因此不再使用自己的革命权。这也就是说，“争取民主”是为革命服务，为解放人类服务的。

因此，不是害怕民主消灭民主，而是要夺取民主，扩大民主，改造民主，真正实现民主。我们要争取社会主义，但是，没有民主能够有社会主义吗？经过多年困难的岁月，实行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什么？因为事实证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自由平等，更创造不出共产主义来。这里可以提一下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瑞典是北欧一个发达国家，长期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前几年我国派出一个考察团去考察。我们的人直率地问瑞典社民党人：你们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对方也率直地回答：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有条件的，就是社会主义前面必须加上“民主”一词，即我们是“民主社会主义”。他们强调说：如果不加“民主”一词，则我们宁肯人家称我们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听！这不是从遥远的北方传来的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反省和深思的问题吗？

共产主义社会要由真正成熟的社会主义创造出来

这里首先要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凡是读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有这样一个公式：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后来列宁又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公式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因为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碰了几个大钉子之后，才修正其原来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的公式，而将这两者区别开来，说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发展出共产主义”；并说：“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41—143页）。这个观点就和上述恩格斯关于必须确切解释清楚“共产主义”一词的含义

才能够使用这个词的意见相一致。而且无论恩格斯或列宁,在这里都把“共产主义”一词打上引号,意思是要重新审慎地研究“共产主义”,决不可头脑发热,胡乱吹嘘。然而,自那以后,无论苏联的共产党人也好,中国的共产党人也好,依然死抱住那个旧公式不放,认为只要政权一旦到手,不管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如何,社会主义就可唾手而得,而社会主义的获得(不管它还有多少人穷得没有饭吃)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其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获得,今后的任务就是向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过渡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如何是大家都见到了的。

将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区别开来,这是实践(尤其是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的实践)作出的结论,书本上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那是人类主观上所追求的一种长远理想。现在,不论是在发达国家中还是在发达国家中从事共产主义事业的政党和人,大都把自己初步争得的成果定位在社会主义,或曰“民主社会主义”,或曰“不发达不完全的社会主义”,中国则名之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白了,就是说我们的国家虽可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的社会尚只处于为进入社会主义作准备的阶段),而没有称自己已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左”倾空想共产主义者已经失势,处境狼狽不堪,特别在苏联崩溃以后,有的已直言退回到资本主义去了。

但是,对于共产主义信仰者来说,共产主义理想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人无理想,浑浑噩噩,不知其可也。

现在是重新回过头来审查已经走过的道路,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准备的时候了。在界说社会主义时,我们发现,人们通常偏重于经济建设、共同富裕方面(这自然也是对的),而忽略了政治民主化和人的自由发展方面(这是一个错误)。

人的自由是逐步获得的,正好像人性是逐步进化的一样。资本主义之

所以能够战胜封建主义,除了生产力方面的优势以外,就是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而且确实在这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不但应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超越资本主义,而且在民主自由方面也理应超越资本主义。然而,20世纪出现于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却和原来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不同。由于各种条件和主客观原因(这一点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分析过了),这种社会主义就其自身来说是失败多于成功,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窒息了民主自由的发展就是其失败的明显证据之一。现在被迫不得不从头做起,并且将社会重新定位,走改革开放之路。

过去我们按照《宣言》,回答十分简单:只要政权到手,不管社会发展程度如何,就可用经济和行政结合的手段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获得社会主义,而这样一来,共产主义也就在其中了。现在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十足的“左”倾幼稚病。共产党人获得政权,并不能轻而易举地获得社会主义,称国家为“社会主义国家”尚可,因为当权的是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共产党人,而且在施政中也采取了某些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而要旧社会改造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则需要经过很长的过渡时期,其中包括民主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化资本主义等一系列内容。在这种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私有制和公有制也将长期并存,虽然公有制获政权之助居于主导地位,但在真正发展社会经济的功能上未必一定占



1919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

优势。

为培育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创造以下的条件：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利用资本主义所已获得的成就，尤其是在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文化方面，全力发展社会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协调并逐步消除城乡、工农、劳体之间的差别，为共同富裕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而奋斗；积极推进以政治民主化和公正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发展以宪法规定的公民所应享受的各项自由权利为中心的精神文明，等等。至于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我想主要表现在：在上述基础上，物质生产力获得极大的发展，足以基本上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不剥削人，人奴役人的现象已不复存在，阶级已经消灭，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已为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

到了这个时候，我想，社会大概可以认为已有条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吧！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现在有人不相信共产主义，甚至百般加以嘲笑，几乎把所有共产党人看成是不知改悔的狂想病患者。我对上述这类人的态度表示谅解：谁叫你天天喊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的苏联这么出人意料地就垮台了呢？谁叫你大夸人民公社就是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天梯却顷刻间就被人民抛弃了呢？不受人信任甚至被嘲笑是自找的。但是，也必须坦率地告诉这些朋友们，不能因为有人犯过错误（包括胡乱解释共产主义的错误）就否定人类对未来的理想。近年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思想家不也在大谈资本主义之后的新社会吗？他们也不喊“资本主义万岁”，除了一个名叫福田的日籍美国人以外，他断定苏联垮台以后从此“历史就告终结”。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比较一下，那末，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作是人类未来的前途的，在目前恐怕还是一种比较务实的态度，尽管有人不喜欢“共产主义”这个名词。但是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识之士都憧憬资本主义之后的新社会，其中“空想”自然不可避免。但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空想主义相比，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性总要比较地多一些，否则《资本论》就不会长期风行世界了，而共产主义的前景正是从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中自然得出的结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从来拒绝对未来的社会进行任何凭空的具体构建和描绘。但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人、资产阶级的无聊政客，以及不读书不思考却自夸聪明的一部分人，对于共产主义却编造出种种奇异的谎言，竭其轻蔑之能事，只嘲笑别人陷于“空想”，自己却安于吮食资本主义的“奶水”。故此，我甘愿冒“空想”的风险，根据以上各节所述关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述，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首先作个总的交待：今天无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均无绝对真理可言，社会的发展始终是一个过程，共产主义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发展阶段而已。共产主义的实现固然是马克思人类解放学说的一个胜利，但并非是它的最终完成。

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我认为最值得注意也最有价值的，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在这个基础上，将重建个人所有制（亦即私人所有制）。这就是，生产资料及其他生产要素归社会公有，所有消费品除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外，其余将平等分配给每个人所有。分配不再以每个人的劳动和能力为标准，而是按个人的基本需要进行分配。这就消灭了社会主义下的那种“按劳分配”的不平等权利，但又与平均主义相区别。分配当然要有一定的规则，不是每个人想要什么就取什么，想取多少就取多少（如对“各取所需”做这样理解自然是错误的）。这时人们的生产时间在不同部门仍将进行有计划的分配与监督，物质产品在不同主权的地区之间仍可能进行某种等价交换）。人们既有按需要平等获得生活消费品的权利，也有各尽所能平等从事劳动和工作的义务。社会对于那些只想享受权利而逃避应尽义务的人，即那些偷懒耍滑的人，自然也要有必要的措置和舆论监督，不能听之任之。这也属平等范围之内。在那种社会，因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极其丰富，可以分配给个人的自然是丰富而多样的，如前面所说的包括家庭住宅、花园、交通车辆、个人研究室，社会管生活必需品、管教育、管医疗、管子女抚养及各种社会保障等。

其次，关于人的自由发展。到了那种社会，阶

级已经消失,社会公正得到实现,人们共同富裕,个人所有权受到尊重,这就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人的自由发展归根到底要依靠社会“自由时间”的增加和利用。《资本论》说自由时间是剩余劳动时间的转化。那时各种条件足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把剩余劳动时间直接转化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每个人的创造性和各方面的聪明才智、特长、个性具有的奇异能力等,都能在自由时间内充分发挥出来,在这种条件下,人也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顺便提一下:很可惜,我们在现时条件下所勉强获得的一周两天的一点自由时间,大多被旅游、宴请等市场性活动占用去了)。但自由是不是无限的、绝对的呢?当然不是。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甚至比共产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人的自由都受两种限制:一是每个人的自由不得侵害他人的自由和利益,否则就不能保证“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二是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必然王国”的约束而不能肆意妄为。有人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必然王国”不存在了,只有人的“自由王国”,这是一种狂想式的奇谈怪论。

说到自由,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家庭、婚姻的问题。共产主义社会仍会坚持一夫一妻制。人的情爱当然是自由的,真正有情爱的男女同居也应当允许,但是社会仍需要由男女双方共同负责的家庭,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而且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家庭将越来越成为一部分社会工作的场所和学习的场所,这也是增加“自由时间”的一种方式。同时,家庭也对延续和培养人类后代负有特殊的责任。有人以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将回到原始的乱婚状态去,这不是无知,就是诬蔑。康有为的“大同说”不主张有家庭,“人民公社”破坏家庭,这不仅是破坏社会,也是糟蹋人性。所以,共产主义在这方面也应当有自己的法律约束和道德保障。

再次,关于共产主义政治。19世纪法国有一位鼎鼎大名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师圣西门,他首次以确定的方式表达未来的共产主义,认为那时社会已没有了对人的管理,只有对物的管理。就是说,到那时,政治已消失了。这也是一种好心人的设想,以为到了那种社会,人都会被改造成有理性有觉悟有道德的人。这里,我认为有必要让我们

听听恩格斯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是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马恩全集》第3卷,第140页)这就是说,人性中包含着兽性的因子,并且将伴随人类的始终。甚至人类社会的后天文明(包括消灭了阶级之后的社会文明),非但不可能完全消灭反而有时还会激发人类本性中的兽性因子,尤其在追逐权力和卑劣的贪欲这两方面。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虽然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但每个人的性格、兴趣、才能、世界观等方面仍各不相同,更不要说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了。有人安分守己,有人想出人头地,有人追求享乐,有人酷爱权力,并用各种手段追逐权力。人们中间也会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激烈的竞争,其中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虽然总的方面权力和利益均具有社会公共性质。但在那种社会里,如果我们不沉溺于幻想,那末社会自身的管理不能不同时具有政治性质。社会的管理仍然不能不依靠一定的政治法律手段,法的规范和道德的规范将一道存在(这时的“法”自然不是任何阶级意志的表现,而是全民公共意志的表现)。

再说一遍,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仍是具有“兽性因子”的“政治动物”,他们有强烈的意志和愿望,特别随着新事业的不断开拓和活动领域的扩大,人们不可能避免各种不同思想和利益的争论与冲突。人世间为什么会出现宗教呢?除了由于人们在“必然王国”中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以外,还因为人们有一种遏制人性中兽性因子的善良愿望,所以多数宗教一开始都是向善的(当政教合一或宗教被政治所利用的时候,情况自然就不同了)。所以,只要人尚不能跳出“必然王国”的范围并且不能消灭自己本性中的兽性因子的时候,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宗教还会和科学一道存在,这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与社会的改造同时,人自身的改造是个极大的问题,同时也是极难的问题。

总之一句话,共产主义社会依然是各种人间矛盾和冲突的舞台,否则,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共产主义社会倒真正成了历史的总结。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正好像我们自以为容易掌握绝对真理而这是不可能的事一样。

(责任编辑 杜导正)

『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

● 孙丹年

（一）孙铭勋与电影《武训传》毫无关系

1951年，重庆育才学校校长孙铭勋被定为西南地区“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其实孙铭勋与电影《武训传》毫无关系，批判之初，他根本没有看到过这部电影，因为当时西南地区还没有放映这部影片。此前他也从来没有单独地以个人身份大力宣传武训。孙铭勋从一开始就被定为重点批判的对象，是因为“批判武训运动”的实质，是要否定当时众多教育家们各自所主张的教育理论，如“生活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活教育”等等。孙铭勋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代表人物。

1951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的同时，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陶行知先生，意在牵引即将大规模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1951年5月25日《大公报》登载“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拉开了批判武训的同时也批判陶行知的序幕。

1951年10月6日《新华日报》刊登重庆市教育局对各公私立中小学的指示《开展电影《武训传》及《武训精神》的讨论》中，首先说明“……所谓‘武训精神’，由于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予以表扬传播，其影响尤为普遍深刻”；重庆教育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明确革命的立场观点”的问题，规定了学习分为两个阶段，时间必须学满两个月，每两周汇报一次等等，还特别指出：“除教职员外，……育才中学的全体学生，都须参加学习。”

陶行知先生是享有崇高威望的教育家，不可能全盘否定，也否定不了，批判者们采取的是承认陶先生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民主斗士”的一面，而否定他作为“人民教育家”的一面，将他定位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1951年，“改良主义”一词的概念等同于反对武装斗争、反对政治斗争，也就等同于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改良主义”主张教育救国（或别的什么救国）而不提倡“暴力革命”。

由于陶行知先生早已去世，他的学生们便成为批判重点。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被称为“陶门大弟子之一”的孙铭勋，在劫难逃地陷入了被重点批判的灾难。

自1951年10月11日《新华日报》对孙铭勋公开点名批评起，至1952年4月针对孙铭勋的批判基本告一段落，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中，据笔者对《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所登载文章的不完全统计，共有数十篇文章对孙铭勋点名批判，直接以姓名作标题的有16篇。其中影响最大的有1951年11月28日用黑体大字标题置于头版头条的《关于重庆育才中学“武训精神”影响及前校长孙铭勋思想的初步检查报道》，同版配发社论《批判孙铭勋思想，进一步肃清“武训精神”的影响》；1952年4月10日《新华日报》

头版显著位置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关于开除孙铭勋党籍的决定》,1952年4月13日《新华日报》第三版《开除孙铭勋出党是党的重大胜利》;以及1952年4月20日《大公报》第二版《育才中学学生拥护市委开除孙铭勋党籍的决定,纷纷批判孙铭勋思想》在校内散播的毒害》等等。

(二)孙铭勋坚持“育才立场”

孙铭勋顽固坚持“育才立场”,他拒绝承认陶行知先生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是错误的。

“生活教育”作为教育理论体系,内容是博大精深的,涵盖面很广,主张教育要与民主政治相结合,要联系经济的发展,要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等紧密结合,要注重人格和品行修养。在教育方法上,主张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教学做合一”,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多动脑、多动手,从实践中培养才干,在具体的教学方式上富于独创性。

1905年底孙铭勋出生于贵州的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为革命的新思潮所吸引,辗转到了上海。偶然和同乡同学戴自俺看见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招生简章,觉得十分独特新奇,立即给陶行知校长写了一封信,询问有关事宜,并很快收到陶先生的回信:“……晓庄学校开办已快一年,贵州的同志一个还没有。两位有志加入乡村教育的队伍,有志到晓庄来学习,我们极表欢迎!如果将来乡村教育有到贵州的一天,两位便是第一个使者……”这时孙铭勋已经21岁,是贵阳师范学校毕业生,他在晓庄相当于研究生学习,很快便成为陶行知先生的得力助手。

孙铭勋和戴自俺曾向教

育家张宗麟请教“男子可以办幼稚园吗”?张先生笑笑说:“我不是男子吗?陈鹤琴先生不是男子吗?你们打算学习幼稚教育,好极了!”他们又请教陶行知先生道:“假若我们研究儿童能从幼儿研究起,研究教育能从幼儿教育研究起,将来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有根基。”陶先生大加赞赏,鼓励他们说:“这是有志气的想法。你们要在教育上做一番事业,这样走是对的。”

孙铭勋先后参加创办了南京迈皋桥幼稚园、上海劳工幼儿团、江苏淮安新安幼儿园等,还参加创办新安小学。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幼儿教育文章,并先后写作出版了《幼稚教育》(作为师范生教材)、《乡村幼稚教育经验谈》、《劳工幼儿团》、《古庙活菩萨》、《从行知诗歌看教育》等专著,与戴自俺合著出版了《晓庄幼稚教育》、《幼稚教育论文续集》、《晓庄批判》、《儿童节教学做》等专著。到30年代中期,30岁左右的孙铭勋已经是国内有名的幼稚教育专家。在陶先生及其他先生指导下,他和同学一起,初步创立了早期中国幼稚教育理论及实践体系。



著名画家伍必端为武训画像

1930年6月晓庄被查封,孙铭勋被捕入狱,坐牢数月,得到张治中先生营救而释放。

抗日战争中,全国著名文化人云集重庆。陶行知于1939年在重庆远郊创办育才学校,曾延请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到校讲学。蒋介石政府要求将育才学校纳入公费管理,被陶行知拒绝,因为陶先生要保持独立性,避免被国民政府掌握和控制。育才学校招收的学生主要是抗战中流离失所的“难童”,学校维持生存靠的是社会各界募捐和进步人士援助,因此这所学校尊崇“行乞兴学”的武训精神。育才学校的大楼曾经取名为“武训大楼”,门前还挂着“武训大

楼”的牌子。即使在重庆解放后,孙铭勋考虑到可能出现政府对育才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还在进行向社会各界的募捐活动。

1952年2月2日《新华日报》刊登作者柳的文章《略论对孙铭勋错误思想的批判》涉及到了本质问题:“……对孙铭勋来说,要真正使他彻底清算自己的错误思想,最后也必然要牵涉到生活教育的思想体系。”

孙铭勋数十年如一日,充满独立性、富于创造性地实践着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他坚持的“育才立场”就是“生活教育”的立场。

(三)孙铭勋继承陶行知“育才学校的道路”

对于育才的发展前景,陶行知先生有一个庞大的规划,他曾经设想,等到战争结束、社会安定、有了条件,就将育才学校办成一个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专科的完整的“生活教育”实验学校(见《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陶行知先生去世,作为重庆育才校长的孙铭勋,就决心继承陶先生的遗志,去实现这一理想。他的整个计划见1950年7月21日《新华日报》第六版《育才学校的道路》一文。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得到周恩来赞同的。周恩来与育才学校的关系很深,一直亲自关心支持并给予实际的帮助。南方局派出共产党员到育才学校工作(孙铭勋就是党组织派到育才去的),周恩来坦诚地将学校中共产党员的名字告诉陶行知,在白区秘密工作时期这种情况十分少见。育才学校决策层中的共产党员们,帮助陶行知制定了学校的教学计划和远景规划。如此密切的关系,基于周恩来对陶先生的信任,也基于周恩来对“生活教育理论”的赞同。1946年7月陶先生在上海逝世,毛泽东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也被一般人看作是毛泽东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认可。

抗战胜利后育才学校大部分迁往上海,小部分留在重庆。不久内战爆发,留在重庆的育才学校分部与上海失掉联系,完全断绝了经济来源,募捐又越来越困难。周恩来鼓励重庆育才分部负责人说:“把育才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这个鼓励

像明灯一样指引着苦撑苦熬中的育才师生。重庆解放前夕,周恩来指示从香港给育才学校汇来800块银圆,使他们顺利度过最艰难最黑暗的一段时期。那时候,孙铭勋已经在思考着解放后育才学校大发展的实施计划了。解放后,孙铭勋遇到重要事情还直接与周总理通信。

解放了,育才师生扭着秧歌舞欣喜若狂地迎接解放军进城,并且在“抗战胜利记功碑”(现在的解放碑)顶上插上他们自己制作的、飘扬在重庆上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解放当天,重庆广播电台播放的第一支进步歌曲,也是由育才师生演唱的。

解放之初,作为国内知名的幼儿教育家、育才学校校长、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孙铭勋,享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的委员,当选重庆市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他写的文章经常见诸于各报刊杂志,育才师生的学习及活动情况也经常为各报刊所介绍。

孙铭勋向重庆市政府文教局提出了创立规模庞大的“育才学园”的设想,希望得到政府支持。他是这样想的:“……饱受压迫,尝尽辛酸的育才学校,已随着重庆解放而获得新生,……明年将增设托儿所,恢复小学,扩大初中,和社教组,并呈请军管会另拨较宽的新校址,发给学校经费和部分学生公费,同时积极开展募捐工作,筹集款项,以便从事新建设。……”

这一想法初步得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允许:“本市育才学校……校址和经费问题,军管会同文教会已答应帮忙协助,并发起向社会人士募捐运动,共同来完成这有益于后代的义举。”

这一设想最终没有能够实行,原因在于一方面孙铭勋的规划与现实有着较大的距离,另一方面,依然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所激动的人们,难于静下心来思考文化建设。孙铭勋怀抱着宏大的育才学校发展规划,找到刚刚成立的人民政府文教局,又直接找到副市长,说明育才学校从创立开始就是租借房屋校舍,一直“贫无立锥之地”,现在准备扩大招生,希望政府拨给相当于一所大学的地盘,并给以人员和经费物资的支持。

他说话十分直率,一切都直截了当。他的态

度即使文教局长和副市长非常反感,副市长不客气地斥责说,你是党员首先要有党性,你是干部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服从组织决定,你怎么总是强调你的个人意见!两人发生争执。孙铭勋觉得人民政府理所应当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公仆”,便说出“人民政府是不是人民的政府,就以对育才的态度来考验”这句传播很广的“名言”。

(四)教育家的民主政治理想

孙铭勋对于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充满着梦想。他在《怀念陶行知先生》(《新华日报》1950年7月25日第六版)里这样写道:

一九四五年十月陶行知先生从重庆城里到乡下草街子去参加育才的庆祝胜利会,他听到一位老太婆问:“民主是不是老百姓做老板?”这“老板”二字感动了他,于是,他写了一首诗,题目是:“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公司,四万万五千万人做老板。”里面有这样的一些句子:

“……中国好比一个大公司,老百姓都是老板,大人是大老板,小孩是小老板,妇女是女老板。……文武百官是伙计,大官是大伙计,小官是小伙计,女官是女伙计。……要想事事如意,人人如意,伙计要忠实,伙计要和气,伙计要努力。还要四万万五千万老板,坐上第一把交椅。”

……目前除了台湾西藏,全国解放了,人民政协,人民政府,人民代表会议,地方协商会议,各行各业的各种会议,组织起来了,老板坐上第一把交椅,人民做了主人,“重大方针自己管”,“好的规矩立起来”。而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要密切联系群众,要理论与实际一致,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真正要把忠实和气努力的工作作风普遍到全国了,诚然如陶先生所说的:

“工厂还是工厂,情形大不相同,从前工人是奴隶,现在都是主人翁。你来我去拉拉手,工人歌声遍西东。只要自己不懒惰,海阔天空路路通!”

是的,陶先生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解放区的幸福是永远说不完的。今天如果陶先生仍然健在人间,看见了人民大翻身,看见了共产党领导的英明正确,不知道会如何的愉快高兴哩!

电影《武训传》放映之时,京津沪渝等大城市里刚刚从国民党末日状态下解放出来的文化界民主人士,反对专制独裁的高昂情绪尚未消失,追求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优良传统依然存在,英勇无畏、敢说敢为依然是一种受鼓励的时尚道德评价。但是理直气壮地追求民主与开放的文化人还没有懂得新中国的法则,他们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对某种尚未得到当局首肯的事物大声叫好,实在是犯了大忌。

于是孙铭勋面对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承受了各种责难甚至污蔑,孙铭勋有着太多的委屈,他在《解放一年来的我和育才学校》一文中说明了自己担任育才学校校长前后的情况,这样剖析自己:

在解放前的一段最艰苦的时间,……我积极准备,要能维持到解放后三个月,就是说:在解放后三个月之内,不能向政府要钱,而政府也一时不会有钱,但是,那时候,也有着一种主观的幻想,以为解放三个月之后政府就可能有较多的钱来支持,绝不会使我们内部的物质条件再像过去那样的贫乏,……今年三月,育才改为市立,必要的经常的费用,已由政府负责,原有的一些无家可归的公费生的饮食,也有了人民助学金来维持。但这些公费生的衣服、书籍、文具、零用还得由学校自行设法,尤其是医药方面,过去对于校内师生尽量供应,而且供应校外民众,现在是一天天的在紧缩,……

在没有能够迎刃而解的时候,政府没有力量来负担这个责任,学校也没有力量负担这个责任,遇着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生了重病的时候,以及一些虽然有家而穷得连伙食费都纳不起也不能请领人民助学金的孩子没有饭吃的时候,多半是由先生们来解囊相助。先生们的薪水,在改市立之后,和私立时候相较,实是提高得很多,因而有可能也极愿意拿出钱来帮助解决困难。育才的师生,从来就是在同甘苦共患难中生活出来的。

在过去的反动政府压迫之下,十一年来弄得贫无立锥之地。最初在草街子的凤凰山,是租的房子,虽然订了二十五年的租约,但被当地的土豪恶霸侵略、驱逐,最终不得不整个离开。到了红岩村,也是租的房子,我们采取不声不响的躲藏

的策略,也算躲过来了。解放前后我们主观的希望也太奢,以为政府一定可以拨给我们较多的房子,这种愿望与客观的现实不相符,重庆的房子根本也不多,而政府机关所需要的房子还不够用,自然一时无法拨给我们,到了六月,红岩村塌了楼房,死了一个女生,伤了几个。据建设局派人视察的结果,整个房子,如不大加修理的话,都有在短期内倒塌的危险。于是只好宣布暂时停课,……

从这一大篇实事求是的倾述里,可以看出孙铭勋能够体谅政府的困难,他并没有把人民政府当成敌人,同时他也在反省自己,认真地作着自我批评。

但是1951年11月28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黑体大字登载的《关于重庆育才中学“武训精神”影响及前校长孙铭勋思想的初步检查报道》长文中,却说“……孙铭勋向人民政府提出要求,其中有‘请拨伪国防部——即前伪国防中学旧地全部地皮及房屋’,……补助150个工作人员及500名公费生的经费,要农场工厂用具、小汽车、大汽车、钢琴、提琴、收音机、电影机……孙铭勋的个人野心,在这里已充分暴露无遗了。……”

在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定为一尊”以后,任何人的名字“更不要说‘思想’”)不能再和毛并列时,孙铭勋还在一股劲儿地要“按照陶行知教育思想办教育”,真是表现出文化人对待政治的十二分天真。

许多教育家都懂得充分运用沉默的力量,或有充分的智慧虚与周旋,由此得以保存自己。孙铭勋却缺少保持沉默的涵养。又因为孙铭勋是共产党员,他认为共产党员对待组织必须坦诚。

(五)孙铭勋不愿意盲从

当灭顶之灾明显昭示给他时,孙铭勋是可以选择的——生存,或者毁灭。

一位当年经历过批判“孙铭勋思想”的老同志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公开发表的孙铭勋的自我检讨的文字。只是在运动前期的学习发言中,他引用过报纸文件上的话。”

在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孙铭勋实事求是地

写出思想检查,没有胡乱招认,没有人云亦云。他要对陶行知开创的教育事业负责,要对党组织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但是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被工作组的领导人认可。

1951年《重庆教育》第二卷五期发表孙铭勋的《武训与陶行知》。10月11日《新华日报》这样评论:“重庆育才中学前校长孙铭勋,在《武训与陶行知》一文中,着重解释陶行知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表扬武训。这篇文章没有联系到自己的思想实际,只是作了空泛的议论,态度是不够严肃的。”

孙铭勋不是一个盲从的人,他不说没有经过自己思维的话。年轻时追随陶行知先生,是因为陶行知先生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识、谦逊的风范深深地吸引着,从精神上温暖着他,从前途上指引着他,使他心向往之。解放后,文化素质偏低的行政干部普遍存在。孙铭勋对于个别对教育仅仅一知半解或完全外行、对教育理论并无兴趣、作风又很专横跋扈的领导,从内心深处不认同。这些领导却极其粗暴地要求各具特色的教育家们批判他们亲手创立的教育体系。

孙铭勋不认可对外来教育理念断章取义的作法。批判陶行知和其他教育家,批倒批臭之后,总要另立一种教育理论来取而代之。这另行祭起的大旗,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教育的一些片段和苏联教育体制。

孙铭勋并不是不知道外国教育家的言论,他是不愿意盲从。

(六)极端个人主义者,能不贪污吗?

“批判武训运动”一开始,先后由市文教局副局长、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带领的工作组进驻育才学校,孙铭勋被隔离审查,不许和任何人接触,每天枯坐在学校图书室一角写思想检查。工作组物色了一部分学生参加他们的工作,并广泛找学生谈话。

十来岁的中学生说话不需要在政治上负责,经过一再启发鼓动,他们揭发了不少“问题”,试引录一段:

……育才中学普遍存在着乱抓乱拿的不良风气。有的人自己没有东西用,看见别人有了就

要想拿走,没有牙膏自己不买,想到反正可以乱拿。而且竟将这种恶劣风气称为“小型共产主义社会”。这简直是对于共产主义的污蔑!这种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分不开的。育才学生普遍以穿得破烂和不爱整洁卫生为光荣,认为要穿得烂垮垮的才能表现出育才是有优良传统的好学校。同学们常常竞赛不洗脸、不洗澡,“以苦为荣”。显然,这更是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有关的。更有甚者,在“武训精神”和“天才教育”的教育下,大大助长了学生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并被称为“独特的性格”而得到鼓励。师生们存在着敌我不分和轻视劳动的观念。在减租退押中,有的学生帮助地主隐藏财物。初三上级学生许桂庆曾检讨说:“我看见劳动人民洗衣挑菜就觉得他们做的事太渺小,很是看不起。我自己劳动洗衣种菜则是学习武训的吃苦精神。”……孙铭勋一直把育才看做他个人的事业和地盘,把学校当作一个封建家庭来管理,孙妈妈(孙铭勋在育才的称呼)之下,教师们则按照到校的先后次序称为某哥某姐。

工作组得出如下结论:

……孙铭勋办教育的思想与个人的打算是分不开的,也就是持着“教育至上”、“文化至上”的思想办教育的人,他本身即是极端个人主义者。而这正是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者的发展的必然结果。……总之,解放后孙铭勋在育才坚持的教育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并灌注着“武训精神”,处处与人民政府的教育方针相违背,与政治运动 and 实际工作脱节。

“改良主义”等同于反对武装斗争、反对政治斗争。但是事实上育才学校并不反对武装斗争。1948年和1949年,孙铭勋主持重庆育才学校工作的时候,亲自送出不少成年学生去参加华蓥山武装起义,共有13名学生壮烈牺牲在战火中和刑场上。孙铭勋还参与了促成国民党第四十七军军长杨熙宇的起义,并派遣学生打入国民党二三九师策动起义(未遂)。孙铭勋也没有反对政治斗争,他是一名忠实和积极的共产党员,许多老党员都证实孙铭勋在解放前对敌斗争非常坚决,党性很坚强。

对于大多数育才学生来说,运动开始时他们

积极参加批判武训、批判改良主义,后来突然变成了批判育才学校、批判校长,甚至变成了批判他们自己,就瞠目结舌了:他们一直很爱干净讲卫生,也很热爱劳动,穿得破烂是经济困难迫不得已;学校领导从来都是教育他们跟着共产党走的,他们对特务的斗争十分勇敢,比如1946年校场口事件中,育才学生的英勇表现世所瞩目。他们面面相觑:为什么《检查报道》中要污蔑他们?

这场批判否定了育才学校的优良传统,使育才师生感到异常困惑。育才学生一直以母校为荣,他们的精神状态一直是神采奕奕昂扬向上的,现在却都灰溜溜的低下了头。那些经过工作组启发鼓动而揭发孙铭勋的学生,看见自己随口说出的话变成了铅字,被登在报纸上成为孙铭勋的罪状,许多人十分后悔。有些人到了80年代还找到孙铭勋的妻子道歉。

1951年下学期,孙铭勋被迫辞去校长一职。育才学校被“分解”了——一部分撤消,一部分合并于其他学校,只留下中学部,取名“育才中学”。到1952年上半年,高中部分离出去,改名“重庆市第13初级中学”,再改名为“第20中学”。育才学校的特色彻底消失了。

“三反运动”开始,孙铭勋的问题上升为敌我矛盾。据一位当年亲身经历过批判孙铭勋的育才老同志回忆说:“当时的文教局副局长找我去了解情况,我跟他说孙铭勋决不会贪污。他反驳说:既然孙铭勋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极端个人主义呀,怎么可能不贪污?他还搞了那么多的募捐册,怎么会不贪污?怎么不该审查?他当然是大贪污分子!”

于是把孙铭勋定为大贪污分子,发动学生对他轮番批斗,带他到学校食堂中央,让学生们围着他高呼“打倒贪污分子!”刺激得他要发疯。搞疲劳战术,常常一昼夜不让睡觉。把学生食堂里饭桌上抛洒的残渣剩饭抹下来给他吃,晚上强令他睡在100瓦的电灯下,终夜不许关灯,借上厕所之机用枪押着他在学校里示众,以摧毁他的尊严。

孙铭勋平生最钟爱的就是学生。他投身教育和革命数十年,两袖清风,身无长物,想尽办法募捐来的收入都供给学生,还不够学生吃饱穿暖,而现在,来自学生的侮辱和伤害使他无限伤心。

孙铭勋终于心力交瘁。同志们不相信自己,党组织也不相信自己,只有用死来表白清白无辜,只有死后让历史去评说。他对自己说“我只有死路一条了”。1952年3月6日深夜,他找到一把平时用来剪叶子烟的小剪刀,用力割破了颈部的动脉血管,鲜血进涌中,他辗转发出窒息的呻吟,惊动了看守,立即将他抬到医院抢救。脱离生命危险后又送回来,继续批斗,监视更严密了。

由于他的自杀阻挠了运动的深入开展,真正是罪加一等,经中共重庆市委讨论研究决定,定性为“自杀叛党”,给予开除党籍并撤消一切职务的处分。

孙铭勋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一落千丈,一度陷入为勉强糊口而辛劳奔波的境地。经过朋友们向市里多次反映,一年多以后调动到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儿童文学。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死于贫病饥饿。

(七)全盘承袭苏联教学模式

50年代初期,把所有教育家的呼声都压制下去之后,中国的教育体制顺利实现重大改革,全盘承袭苏联的教学模式成为大一统。

曾经充满理想光辉、充满创造精神的育才学校在政治车轮的碾压下变为一般中学,又变为将学生陷入“题海战术”的一般重点中学。

曾经对中国教育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其他著名教育家,也没有逃脱这场灾难。晏阳初先生虽远在国外,仍作为教育界的主要批判对象,在重庆首先被“揪”了出来——1950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大字标题刊登“晏阳初是怎样为‘农民’服务的?”文中列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晏阳初先生是怎样剥削压榨农民的。一个多月后,1950年12月28日,又登载“撕破改良主义外衣看晏阳初的真面目”。1951年7月30日起《新民报》连载“从自我批判认识反动组织平教会及文化买办晏阳初”。

陈鹤琴先生也逃脱不了厄运。陈鹤琴先生《我对“活教育”的初步检讨》分为两部分在《大公报》1951年10月15日、17日连载。1951年11月15日《新华日报》的报头广告中,关于新一期《人民教育》的内容也登载了陈鹤琴先生

的《我对“活教育”的初步检讨》,以及评论文章《写在陈鹤琴先生的初步检讨之后》。

这则报头广告还配有一段文字介绍:“《人民教育》月刊,自第二卷第六期起,即已开始了对‘活教育’的批评,至第三卷第六期已将此项批评逐渐开展,第四卷第一期起将更有系统地开展这一批评运动,以此树立全国教育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风气。这一批评运动,对于中国教育界清算反动的杜威思想将有很大作用。值得全国教育界注意的。”

以批判“武训精神”为借口进行的这场文化围剿,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文化冤案”。批判的结果,使原本具备高度社会良知、“以天下为己任”、勇敢地站在民主斗争前列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一步步走向了沉默。他们只能缄口不言,或终身幽闭,或妻离子散,或肉体消灭,终止了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而且使原本多元发展、朝气蓬勃的中国文化教育事业逐渐进入一个难以解脱的怪圈,直至今日。

问题还不止此。

当教育工作者全都唯唯诺诺之后,当学校校长很少由教育家担任,而是由政府选派那些政治表态很清醒的行政人员充当的时候,当代表一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的孩子们,从满七岁背上书包到学校去报名开始,就进入严格的班级制度,被整齐划一地编制进某种体制、按一定的程序准确运转、被制造为同一模式的产品的时候,当人们一生的道路都听命于政府安排的时候,这个民族的创新和拼搏精神也就委顿了。

人们已经习惯了一切等着“上面”安排,一切等着上级发给,一切都首先服从于政治需要。过了半个世纪,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的命运不再由政府安排了,铁饭碗、福利分房、公费医疗等等令人心安的政策不再存在了,到处拥挤着焦虑万状的下岗失业人员——他们全都是从小就按照整齐划一的班级授课制的思维模式成长起来的,人们一致发出的强烈呼声就是:“政府为我们安排!”

新一轮改革阵痛中,包含着多少血腥的历史教训。

(责任编辑 吴思)

「大寨工」对全国农村的恶劣影响

● 消 寒

据阴发祥遗著《往事今鉴》记载：1979年全国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会议发奖仪式的前一天——12月28日上午，陈永贵到西苑饭店看望山西代表，在带人入住的房间坐了一会儿。他对阴发祥说：“劳动管理上我错了。”就这么一句话，别无反省与自责。这不啻是陈永贵个人觉悟与进步的表现，更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政治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拨乱反正初见成效的结果，是理性的胜利。至此，“大寨工”——一场持续16年之久，席卷全国的风暴，以陈永贵认错而告终。此次陈永贵与阴发祥的谈话，自始至终在座的有栗茂林和杨葆荃。

分歧从何而来？ 从头谈起：

1964年3月5日，晋中地区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在榆次召开。陈永贵在会上介绍了大寨劳动管理经验（即所谓“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事实上是取消劳动定额，不要评工记分，后来简称“大寨工”），全场轰动，反应不一。会前，我（当时任中共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到招待所看代表，在陈永贵住处说起他的发言题目，他说准备讲劳动管理。我说还是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好。他没有听。他在大会上讲了劳动管理经验。随后，我讲了我的意见：这是大寨

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可以在先进生产队试验、示范，不宜普遍推广。会后，各县选择一部分生产队试验。截至年底统计，有占全区生产队总数13%的一类生产队试行，试验结果（效果不好）。从此埋下了我在“文革”中遭遇的祸机。

1964年3月25日，阴发祥随陶鲁笳到邯郸汇报山西“四清”，毛联珏把他写的建议托阴发祥送交毛主席。建议写的很短，用3号黑体字打印了半页。内称：“生产队社员计酬，大体合理即可，不宜斤斤计较，把制度搞的繁琐复杂。29日下午，陶鲁笳让阴发祥给毛主席送材料，阴发祥把毛联珏的建议放在上面。毛主席当即看了，随即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党是连续打了20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根据地社会并不实行供给制，但是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多的时候有几十万，少的时候也有几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致过的是平均主义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革命精神的鼓舞。”毛主席的这段话不胫而走，《山西日报》记者郝占鳌闻风而动，把大寨的劳动管理概括为9个“活”字，写了一篇充满革命词藻的报道，4月上旬见报。

这篇报道一发表，山西全省哗然。各地、市、县、社纷纷提出意见，要求省委表态：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经营管理还要不要制度，社员报酬还

要不要有差别?于是,山西省委派出由省委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王林堂任组长的工作组到大寨调查。阴发祥(当时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组织领导了这次调查。经过调查研究,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是在历史上死分活记、等级工资影响下,在抢险救灾中逐步形成的,是有制度的,社员标准工分也是有差别的。调查组回来后,约请《山西日报》记者到省委农村工作部座谈,共同核实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求得了共识,要点如下:

第一条叫定额先定心;第二条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叫打铁先得本身硬;第三条出勤日、标准工分等也是有制度的,叫做制度不繁琐;第四条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标准工分也是有差别的,叫做有差别悬殊不大;第五条农活质量主要不是靠事后检查,

而是靠社员自觉和生产中互相监督,叫做把不合质量的农活消灭在生产过程中。自然,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大家在座谈会上一致认为:大寨的经营管理也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1964年4月30日,省委工作组写出了《关于大寨生产大队以革命精神改进劳动管理的考察报告》。5月10日,省委批转了这一报告,批语中写道:大寨生产大队改进劳动管理的五条基本指导思想,各地在整顿经营管理工作中应该普遍学习,至于具体的劳动定额、计工形式、劳动组织和验收制度,各个基本核算单位应该根据本单位社员觉悟程度、干部条件、管理水平及其它条件因地制宜,不要把原来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盲目废掉。7月省委农村工作部又印发了《改进劳动管理,提高农活质量——段店大队实行按农活质量分等计工的办法》等经

验介绍。

陈永贵一再向新闻界大讲大寨劳动管理经验,越讲越起劲。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965年继续在广大农业农村工作者、四清工作队中进行争论。赞成大寨劳动管理经验、主张“按政分配”的人上纲上线,借突出政治之风占了优势。不赞成大寨劳动管理经验、坚持“按劳分配”的人退守阵地,据理力争。文水四清工作团内部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辩便是一例。阴发祥及其主持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和省委四清办公室始终站在维护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边。为维护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和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制度,维护广大农民利益,维护农业生产秩序继续努力。

1966年2月,陈伯达派方纪来太原,约刘芝兰(延安时期老同学,任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陪他到大寨。他们和陈永贵长谈之后,方去武汉向陈伯达汇报。陈伯达说:“这是土生土长的,有创造性的经验。”肯定了大寨的方法,认为是一个方向。在陈伯达的示意和支持下,1966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陈永贵谈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验》。洋洋万言的长篇报道,并加了编者按语。陈伯达还派方纪在湖北省和上海市到处做报告。不久“5·16”通知发布,“文革”开始,“大寨工”形成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

陈永贵是全国劳模中第一



个“杀出来”造反，夺县委、地委和省委书记的英雄”。他当了山西省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政委以后，到榆次地委后楼地下室对我“拼刺刀”，又在太原五一广场群众大会上讲话谩骂我。后来，当我在姑姑庵见到阴发祥时，他满头系着绷带，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伤病员，早已被关进了刘芝兰为他安排的高级“牛棚”。我们都成了陈永贵的阶下囚。在此期间，1967年9月、1968年1月，先后以国家农业部名义在大寨召开的两次全国学习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现场会议，把“刘少奇一伙”的按劳分配“批倒批臭”，把陈永贵和“大寨工”的身份抬得更高，掀起学习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新高潮”。

在“文革”中“大寨工”的风暴越刮越凶。它是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口号下，按阶级出身、政治态度以至社会关系亲疏爱恶计酬分配，事实上成了一种赏罚予夺的手段。陈永贵大肆鼓吹为革命种田，“劳动越重越光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被滥用。陈永贵欣赏柬埔寨红色高棉对城乡男女劳动力实行军管那一套做法，说马列毛没有实行共产主义，波尔布特做到了。这样做的结果，直接损害农民经济利益，侵犯农民民主权利，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秩序混乱，造成大面积磨洋工、大幅度农业减产。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农业学大寨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号下进行的。陈永贵红

得发紫，连“永贵好”一句礼貌用语也成了最高指示，广为传诵。

1975年七八月间，陈永贵让宋沙荫起草给毛主席的报告，提出五条建议，主要是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大寨劳动管理办法。其余三条是社员住房和欠粮欠



债处理办法。关于劳动管理是这样写的：“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怎么搞好？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所谓‘标准工分’，其实就是思想好，劳动态度好，既能大干又能干得好的‘标准人’。自报工分要同这个‘标准人’的条件比。实行这种评工制度，政治就挂帅了，可以从根本上摆脱‘工分挂帅’的繁琐哲学。”8月14日，毛主席在陈永贵的建议上批示，让政治局讨论一下。9月23日至10月27日，第一次全国农业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座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赵紫阳和谭启龙坚决反对，连张春桥也表示不同意，陈永贵一再强调，争到上火处还忍不住高腔大嗓地嚷起来，

以至后来有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之说。由于分歧太大，座谈会无结果而散。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重新指出，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且明确指出：按劳分配只能按劳，不能按政。现在农村人民公社早已不复存在，农业生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年。在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的条件下，还要加上按生产要素分配。十六大报告进一步要求：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责任编辑 吴思）

不畏强权的 名记者严怪愚

● 达文 严农



严怪愚

严怪愚先生的名字，在青年一代读者中，或许会觉得陌生，这主要是因为他一生中受尽了政治上的不公平对待。

战争年代，他的笔触揭露日伪，开罪国府。1949年以后，他还是为民请命，忠直敢言，先是被打成“胡风分子”，1957年又被打成长沙大“右派”，从此沉寂，受尽二十多年磨难。

1979年，严先生的冤案平反昭雪，长期的磨难留给他的是一副病残的躯体，但他仍然抱病写了大量回忆录。他才过上几年好生活，但死神缠绕着他，1984年3月1日，严先生不幸病逝——上帝对他未免太不公平了。

严怪愚本名严正，湖南邵东县人。他之所以改名怪愚，是因为邵东乡下多鲶鱼，此鱼形象丑陋，习性刁钻古怪。乡人乃喜欢以“鲶鱼拐子”或“鲶拐鱼”来骂人。在湖南大学读书时，严正即谐“鲶拐鱼”取“严怪愚”为笔名发表文章。

1935年，严怪愚从湖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他放弃了所学专业的大好前途，却投身新闻界工作，开始了动荡危险的记者生涯。当时许多亲戚及同学劝他不要放弃专业，不要走“歪门邪道”，有人甚至说他人如其名，又怪又愚。他回敬说：人各有志，请勿勉强。

踏入新闻界的第一年，他第一次前往沪宁探访，即趁机拜会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对他说，做人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这句话竟影响他一生，也使他受了不少苦。

1936年“三八”妇女节，二十六岁的严怪愚与大家闺秀姚家芳参加了长沙市政府举办的湖

南第一次集体婚礼，这件事在当时很轰动，比赵丹、江青（蓝苹）等人的集体婚礼早一个多月，在湖南的影响并不低于赵丹他们在沪杭的影响。当时湖南的封建势力很强，社会舆论压力很大，特别是女方家长极力反对女儿嫁给一个“穷书生”。但是，严怪愚不向反对势力低头，情愿托朋友向成衣店赊账为新娘子做嫁衣，亦不去讨好很有钱的岳父。而主办当局亦刻意选择象征妇女解放的“三八节”为他们举办集体婚礼。

鲁迅悼文引起论战

婚后，严怪愚更是全力投入独立的《长沙力报》的工作。可是不久，鲁迅先生逝世，当时任采访主任的他与主编陈楚率先在《力报》开专栏悼念鲁迅，使许多其它报纸不敢采用的纪念文章得以在《力报》发表，并在长沙发起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因为这张报纸创刊时曾声称“拥护中共”，此举深为一些政要和右派文人不满。

刚好，随后段祺瑞也辞世了，当时在东南新闻界风头十足的《国民日报》主编罗心冰，就抓住鲁迅与段祺瑞两人的遗嘱大做文章，还出特刊追悼段祺瑞，实行与《力报》唱对台戏。他在一篇《随便谈谈》的文章中，说段祺瑞至死不忘国事，仍在为国家操劳，贬责鲁迅死也不忘个人恩怨，为儿女操心。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鲁迅之死不

算得损失,段祺瑞之死才算得损失”。

严怪愚马上撰文回驳,他写道:“鲁迅的遗嘱,我喜欢他的‘硬’,喜欢它刻毒而近乎实在……段祺瑞的遗嘱,我喜欢他的堂皇,口气足,虽然实际上做不到,事实上近乎夸大,可是到底可以给‘幻想’一点安慰。但我更爱鲁迅,因为他一生没有做过‘媚’的文章,他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为民众的觉醒而呐喊。的确,段祺瑞功在‘民国’,那么,鲁迅则功在‘国民’了。”

罗心冰以他的老资格,万万意料不到会败在年仅二十六岁的严怪愚手里,他大骂严怪愚“领了俄国卢布”和“啃了俄国的黑面包”之余,只好央人斡旋调停。

1938年春,在台儿庄战役打响之前,严怪愚作为随军记者去到徐州前线,进行几个月的战地采访。他写了十几万字的战地通讯,揭露日寇的野蛮行径,讴歌了抗日军队的业绩,大大鼓舞了后方军民的斗志。

揭露丑闻险遭杀身祸

1938年底,严怪愚又到了大后方重庆。12月29日,汪精卫辗转到了越南河内,在那里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日本政府的近卫声明,对重庆国府建议“和平”,实是对蒋介石等人劝降。因为这是国民党内亲日派脱离中央投日的丑闻,使中央政府极为紧张,连忙封锁消息,免得家丑外扬。

当时重庆各报虽略知内幕,但国府不准报界披露,慑于当局威势,各报也一时不敢将消息见报。当时中共的名记者范长江也在重庆,他得到消息后由于种种原因发不出去,乃将有关材料转给了严怪愚。严怪愚虽无党无派,却有一腔民族激愤。他还未看完材料就拍案而起。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觉得有责任揭露汪伪真相,就是杀头坐牢也在所不惜。当晚,他就写成《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稿,连夜电发长沙《力报》。

第二天清晨,这篇电讯在《力报》以头条刊出,东南一隅顷刻哗然,整个国统区为之震动,激愤的军民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湖南当局由于疏忽,让《力报》漏出这个消息,想抓严怪愚不得,慑于重庆当局的恼怒,只好登报谎称“严怪愚造

谣惑众,诬陷党国,已在重庆捉拿归案,枪毙了”云云。

但是,纸包不住火,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消息迅速传开,国府只得改变策略,一脚踢开汪精卫,几天后就由中央社和各报报道汪精卫叛国丑闻,还宣布将汪精卫开除出国民党。严怪愚及《力报》也因此幸免于难。

1939年秋,严怪愚从重庆回长沙,出任《力报》总编辑。当时国民党桂系大员自吹广西“模范省”,有“国防强大”、“建设繁荣”、“道德高尚”三大成就。于是,严怪愚怀着好奇心亲自入桂采访,写了篇《春草遥望近却无》的通讯,揭露某些人弄虚作假制造广西繁荣的假象,使所谓“模范省”名誉扫地。

严怪愚的所作所为,令一些党国大员极为恼怒,但又一时没奈何,只好对他威迫利诱。某些大人物给他种种承诺,有些更是送钱送礼,但他总是拒之千里之外。“政学系”在桂林创办《大公报》邀他加盟,他也拒绝,认为那会失去言论自由。然而,他对当时较弱小的中共,却冒生命危险去同情和支持。

触怒当局报馆被查封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国府勒令中共代表团限期撤离上海。代表团启程时,迫于紧张的局势,各方人士都不敢在便衣盯梢下前往送行,月台上只有一个送行者,他就是严怪愚。第二天,上海《申报》消息称:“昨日中共代表团成员全部离沪,只有《东南日报》特派员严怪愚先生一人在风雪中送行……”

除了正义,严怪愚也没有什么强硬的后台,所以他也因此吃了不少苦。《晚晚报》因发表了他一篇描写何键公馆黑幕的小说,就被当局查封,也使得他很久不能用严怪愚这个名字发表文章。1940年,湖南当局趁取缔八路军驻湖南办事处之机,诬陷严怪愚主持的《力报》“言论荒谬”、“协同‘八办’阴谋推翻政府”。于是,报馆查封,三人遭捕,严怪愚被投入监狱达八个月之久。此举惹起民众抗议,许多读者拒绝办理退订手续,要求《力报》复刊。出狱后,严怪愚即与冯英子找省党部书记廖维藩交涉复刊,廖同意复

刊,但提出复刊后的《力报》必须听从政府指令。严怪愚即刻表态:“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当即拂袖而去。

严怪愚记者出身,也当过文艺副刊的编辑,认识不少文艺界人士。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湖南省城及地方的好几家在全国有影响的报纸大都是他参与创办的。他曾在《力报》、《晚晚报》、《中国晨报》、《实践晚报》等几家报社出任过社长或总编辑,还约请过沈从文、聂绀弩、王彦西、彭燕郊等著名作家为他的报纸主编文学副刊。在办报生涯中,他与冯英子、陈楚以及著名女作家谢冰莹等成了莫逆之交。1980年,在严怪愚沉寂二十几年后,远在美国的断绝往来几十年的谢冰莹,还写信给《湖南日报》,查询他的下落。

50年代,严怪愚先生曾任湖南《大众报》副社长及省通俗出版社副社长。但风云际会的时代过去了,特别是中共这时开始推进“左”的路线,容不得严怪愚这种党外人士。于是,他离开了报界,自请去湖南师范学院任教,讲授新闻学。

就是在这所学院里,严先生被指为“胡风分子”,继而在1957年被打为“右派”,受到双降处分;“文革”时更是下放师院在平江的农场牧牛,过着非人生活。他曾哀叹“搞到妻离子散”。

贺绿汀与严怪愚

1960年,由于漫天的吹牛和“人祸”,人们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花生壳、树叶、红薯藤,都当成高级“人造蛋白”,供人们享用。严怪愚全身都浮肿起来,一个月六十元的生活费,要负担六口之家,他每天只能靠几两粮食充饥,一分钱只能掰成几瓣来用。每到月中,家中便出现“财政赤字”。全家只能在肌肠辘辘中过日子,眼睁睁地看着严怪愚的面部越来越“胖”。

一个阴雨绵绵的冬日上午,破窗外突然响起邮递员低沉而略带惊异的声音:“严怪愚,你的汇款单!”当时全家一惊,这种时候,谁还能给严家寄钱?严怪愚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门口,用十分疑惑的眼光,打量着雨中的邮递员。邮递员将一张被雨水微微打湿了的汇单向严怪愚一亮,十分确切地说:“是你的,请签名吧!”严怪愚用颤抖的手,在单据上签了字,从邮递员手中将汇

款单接了过来。拿到小屋里昏暗的灯光下一看,汇款单收款人一栏上确实确实写着“严怪愚”三个字,汇款人一栏上赫然写着“贺绿汀”三个字,留言栏上清楚地写着:“怪愚,知病重,汇上二十元,供买点营养品之用,请好好保重身体。绿汀。”在弯腰挨斗的日子里,严怪愚从未流过泪。这时,他的眼睛却润湿了。

严怪愚颤巍巍地走到破旧床边,从陈旧的有点霉湿味的褥子底下,慢慢摸出一张用旧塑料纸严严实实包好的小包,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相片。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贺绿汀在重庆嘉陵江边的寓所送给他的一张照片,照片上贺绿汀正坐在一架钢琴旁,在凝神深思。照片背面的题词是:“人,应当像嘉陵江水一样,百折不挠,激流勇进。”

划为“右派”被抄家时,什么都被抄了去,唯独贺绿汀亲自签名的照片,严怪愚想尽一切办法,将它保存下来。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卷来,贺绿汀在全国第一个被打成文艺界的“黑帮分子”。上海来人找严怪愚调查贺绿汀的所谓“叛徒”问题,严怪愚一听,怒发冲冠,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桌上正好有一颗钉子,殷红的血,从他巨大的手掌上流了出来。他横眉怒对“调查者”吼道:“贺绿汀同志一生革命,他是旧世界的‘叛徒’!”“调查者”被他的凛然正气吓坏了,指着怒火中烧的严怪愚,哆嗦着说:“你,你……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右派!”严怪愚赫然一笑:“那就让你看一看这样的右派吧!”

事后,有人问严怪愚:“你当时是专政对象,处境十分艰险,造反派要搞死你,比搞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不害怕吗?”“害怕?”严怪愚淡然一笑:“害怕就不是贺绿汀的学生了!”

1980年,贺绿汀再次回到湖南,第一件事,就是驱车前去探望正在马王堆疗养院的严怪愚。师生多年未见,有多少说不完的话呀!贺绿汀紧握着严怪愚的手第一句话是:“我们毕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1984年3月1日,严怪愚与世长辞。现在,严老夫人姚家芳也已离休,家里分了新房,子孙满堂,安享晚年,两个大儿子已学有所成,成为大学讲师。严老应该安享九泉了。

(责任编辑 李 晨)

杨明斋为陈独秀鸣不平

● 吴 晓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之后,中共江苏省委于11月下旬,又召开了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拥护中央反对托派的方针,拥护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并作出决议开除了省委委员罗世瑶。此后,对托派更加严厉清洗与打击,一批批地被开除出党,党内几乎没有人敢反对。然而,此时有一位被周恩来被誉为“忠厚长者”的人,毅然不顾中央反对托派的方针,挺身而出,对开除陈独秀这位党的创始人表示异议,认为这是极端主义,不利于党的团结。为此,他在遭到中央斥责后,愤而不平,偷越国境,历经千辛万苦,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为陈独秀说情与鸣不平。这位“忠厚长者”,就是1920年中国共产党筹备时期任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翻译的杨明斋,他也是上海党、团组织最早的成员和发起人之一。

杨明斋,名好德,1882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一个农民家庭里。早年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19岁那年即1901年,家庭遭遇天灾人祸,本已不富裕的家庭因而败落,一贫如洗,生活无着,被逼只得一人闯关东,在帝俄时代进入俄罗斯谋生,历经千辛万苦。他先后在海参崴、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打工为生,也当过职员,读过半工半读,学习勤奋,通晓俄文,讲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他入俄罗斯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积极加工人运动,逐渐成为一名觉悟的工人阶级战士。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积极参加十月革命和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由于他表现突出,精明灵活,俄共(布)为培养和深造他,保送他入莫斯科东方

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结业之后,他被重用,奉命到海参崴并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的身份开展工作。

1919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的怒潮震动了世界,引起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重视。于是1920年初,列宁便派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为首的工作组来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人物,杨明斋成了维经斯基的得力助手。然而,他们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一时无法开展工作。后来,他们通过苏俄驻中国大使馆的关系,才找到在北京大学任俄文教授的鲍立维,并经鲍立维的介绍首先访问了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当时李大钊是公开赞扬十月革命、宣传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李大钊通过杨明斋的翻译,很快对维经斯基这位朋友怀有好感,真诚地与他交换了意见。然后,维经斯基又通过李大钊会见了一些与五四运动有关的人士,还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召开了一次会议,实际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

维经斯基在北京工作结束后,经过李大钊的介绍,又转往上海访问了陈独秀。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一见如故,又经陈独秀介绍会见了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等,并商讨建党事宜,杨明斋不仅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很敬重陈独秀,也成了陈独秀建党的得力参谋和助手。1920年5月,杨明斋参与了陈独秀发起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加了该会的负责工作。8月,杨明斋作为发起人之一,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与此同时,为了团结、教育青年,扩大党的影响,杨

明斋和俞秀松受陈独秀与发起组的委托,又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因当时许多进步青年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找“青年社”想办法,所以上海共产党组织就把他们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还邀请杨明斋参加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新青年》、《共产党》的编辑出版工作,并撰写稿件,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及苏俄的社会情况。

由杨明斋负责的党和青年团的一些公开和半公开机关的活动基地,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如华俄通讯社、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都设在这里。由杨明斋任社长的华俄通讯社,原是维经斯基到中国首先建立起的工作部门,后改为由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虽不经常编发新闻稿件,但在中俄两国人民间却架起了沟通、相互了解的桥梁,对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杨明斋任校长的外国语学社,则是上海党组织为培养青年干部而设立的一所干部学校,从中培养和选拔优秀青年送苏联进行培养和深造,杨明斋任校长并亲自教授俄语这门主课,教学认真负责,并先后从中挑选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任伟民、何今亮、许之桢等几十名优秀青年,由杨明斋亲自安排并介绍去苏联学习深造。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还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杨明斋还协助陈独秀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他所负责的新渔阳里6号,实际成了上海产业工人发起成立工会组织的基地。如1920年10月3日,上海造成船厂、电灯厂、厚生铁厂及东洋、恒丰纱厂的机器工人代表,就是在这里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的,参加会议的各厂代表80人。发起会接纳陈独秀、李汉俊、杨明斋为名誉会员,陈独秀被推为工会经募处主任。杨明斋与陈独秀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觉悟的工人要团结、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工会,揭露假工会,去争得自身的解放。是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在上海白克路公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有1000名工人代表参加,陈独秀、杨明斋代表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与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胡汉民、戴季陶等应邀参加成立大会,受到工人代表的热烈欢迎。陈独秀与孙中山同台发表演讲,热烈祝

贺上海机器工会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工人。同时,陈独秀、杨明斋与孙中山等参加这次大会,其本身就是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为日后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杨明斋随维经斯基常来往于北京与上海,努力推动各地党组织的建立。此间,杨明斋还回故乡山东,与应陈独秀之约正在济南组织共产党的王尽美、邓恩铭联系,协助和促进了济南共产党小组的成立。时到1921年初,在南陈北李的推动之下,建党工作进展迅速且条件日趋成熟,杨明斋与张太雷受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委托赴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建党情况,并就中共成立、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问题与远东局代表进行了会谈,还起草了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是年6月,杨明斋与张太雷代表中国党、团组织,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们是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最早的两位中国共产党人。由此可见,杨明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积极贡献,对中国党有着特殊的感情。同时,在革命的实践中,他与陈独秀结下了深厚友情,认为陈独秀是中国党德高望重的领袖。

中共一大后,杨明斋主要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据茅盾回忆说,杨明斋在上海党内讲授过“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等专题。1924年,他出版了《评中西方文化观》,主要批判梁漱秋、梁启超、章士钊复古倒退思潮,李维汉曾著文评介这本书。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与北伐战争高潮时期,杨明斋奉命赴广州任苏联顾问团翻译,是年秋受党的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工作并任副校长。中山大学是国共合作的产物,经过国共两党严格的挑选和考试,中山大学第一期录取了340名学生。到1927年,在校学生达到500余名,其中不少是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子女和亲戚。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等。为体现中苏合作、国共合作,中山大学为联共与国民党共同管理,联共同时代表共产国际。这样,托洛茨基任命老布尔什维克、理论家拉狄克为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国民党派邵力子为常驻中山大学代表,负责监察校务,杨明

斋受中共的派遣到中山大学任副校长，同时，带伍修权等一批中国学生由上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杨明斋由于性情耿直，待人忠厚，工作认真，生活刻苦，为人质朴谦虚，受到中国学生的尊重，加之他那时年已40多岁，所以，年轻的中国学生都亲切地叫他为叔叔、伯伯，伍修权还赞誉他“不愧是一位老共产党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苏联广大群众的思想发生混乱，许多人承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对中国革命的预言和警告是正确的，而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共产国际的观察与指挥是错误的。中国革命形势的恶化和发展，严重地影响了苏联两派斗争的进程，党内思想路线上的分歧，终于很快变成对抗性的矛盾。中山大学也出现了两派斗争的热潮，托派教员不仅在课堂上宣传托派观点，还拿来托派秘密文件给学生看。拉狄克在会上甚至断言：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将使中国革命推迟十年。两派辩论越来越激烈，把中山大学搞得天翻地覆。这样，中国的留学生也卷进了两派之争，尤其拉狄克校长被撤职，由亲斯大林的米夫任中山大学校长，托派教员也被撤职，引起托派学生的激烈反对。是年7月，当汪精卫分共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论断和预言，被彻底的粉碎了。这样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转向托派，对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及苏联托派产生反感，就连蒋经国也毫不犹豫地站在托派一边。“四一二”事件发生后，蒋经国感到震惊和愤慨，在武汉《人民论坛报》发表声明，谴责父亲蒋介石，表示与其划清界限，宣称：“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是我的敌人。”

联共中央利用手中的权力，一面继续批驳托派，一面采取组织措施，于1927年10月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节时，发生了中山大学的苏联托派分子和中国留学生红场反斯大林游行事件。他们挥舞布旗，呼喊“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中国留学生比苏联托派分子喊得更响。这是联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事件，由此加剧了联共党

内反对托派的斗争，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事件发生后一周，联共中央即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同时开除75名托派骨干分子。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苏联东南边疆城市阿拉森图。苏联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活动转入地下。此时的中山大学已经成为米夫——王明统治集团的天下，对参加红场事件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残酷、无情地打击，开除党籍和团籍，有的被充军到边疆服苦役，有的被投进监狱，多数人1927年被遣送回国，苏联当局希望借中国反动派之手，消灭这些异国狂徒。与此同时，不满意米夫——王明集团及其控制下的党支部官僚宗派主义统治的中山大学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明等一批老中共党员，也被王明集团利用肃托运动所击败。王明借口董亦湘、俞秀松等人多是江浙籍的人，蓄意制造了一个“封建性团体——江浙同乡会”的莫须有的罪名，打击董、俞一系的人，把他们统统作为“托派”或同情托派的集团，进行残酷的审查、批斗、开除、监禁、流放，中山大学一片白色恐怖。

面对斯大林、苏联当局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及其中国留学生的极端的措置，尤其对米夫——王明集团对中山大学的白色统治，杨明斋极为不满，愤而于1928年辞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职务，回到中国平津地区工作，公开职业是冀东丰润县中学国文教员。他在白色恐怖下编著出版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以学术研究为掩护，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然而，他没想到一踏上中国大地，就敏感地嗅到中国党内反对托派的火药味。尤其当他听说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发生严重分歧与矛盾，中共中央对其严厉批判时，甚为震惊与不安。他认为共产党的同志是一家人，意见不同不能分家，尤其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更不能敌我不分地加以残酷斗争，以削弱自身的力量，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同时，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的创始人更不能随便开除。于是，他凭自己在中国党内的影响，通过中共顺直省委向中央表示，要到上海去进行“调解”，以缓解陈独秀和中央的矛盾，但为中共顺直省委所阻止。省委告诉他党中央与陈独秀之间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误会造成的，也不是仅仅在某些政策上的分歧，而是重大政治路线斗争，陈不仅是右倾投降机会主义者，而且是分

裂党的托陈派首领,这是不能靠调解解决的。杨明斋也因此被中共中央斥之为“调和主义”。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批判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及中央决定,拒绝中央委派他的工作,且在最后两封信中“公开揭开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对此,杨明斋旗帜鲜明地表示异议,且愤愤不平,认为中国党采取极端的态度,随便开除陈独秀是极不妥当的。于是,他辞去冀东丰润县中学的国文教员之职,只身冒着生命危险偷越国境,吃尽千辛万苦,进入西伯利亚,企图到莫斯科找共产国际,为陈独秀鸣不平并说情。他以为共产国际经验学识丰富,许多人也认识和了解陈独秀,不会像中共那样采取极端的态度。但他到伯力后,却被留住,未能如愿到

莫斯科,他写的说情长篇报告书几经周折,终于转送到共产国际。

这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收到中共中央的报告,并立即作出答复,给陈独秀一封电报,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局审查中国共产党的党籍决定的会议”“;如果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这虽是共产国际给陈独秀的特殊待遇,但陈独秀对此并不领情,更不抱幻想,他在回信中全面回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后,宣称:“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就这样,尽管杨明斋奔走说项,陈独秀还是无可挽回地被开除出党了。此时,年逾半百的杨明斋由于坎坷的经历、长年累月的奔波和环境的恶劣,积劳成疾,加之为陈独秀愤愤不平,一气之下而病倒了。1931年苏联当局送他到西伯利亚疗养,后病逝于伊尔库茨克。

(责任编辑 李 晨)

128枚传世邮票揭示姓氏秘密 具有极高收藏价值机不可失

《寻根中国——中华百家姓》邮票珍藏册限量发行

经国家邮政局审核批准,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炎黄春秋》杂志社共同推出的大型邮票珍藏册《寻根中国——中华百家姓》,2004年11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全球首发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掀起了全国性的“姓氏寻根热”。

这部珍藏册以“数典认祖、追宗寻根、中华子孙、万姓一家”为主题,按照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抽样数据,将占目前国内人口总数90%左右的128个姓氏,以全新发行的8个整版暨128枚个性化姓氏邮票为主要载体,结集成上、下两册,并配有采集自炎帝陵、黄帝陵的圣土,中华人文始祖大型立体浮雕包金铜章1枚,通用型空白家谱1册,圣土采集暨限量发行钢印公证书1份。

珍藏册内收入的“中华百家姓”邮票由著名邮票设计师王虎鸣设计。该套邮票的发行,填补了世界邮票史上大型姓氏主题邮票的空白,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全套珍藏邮册全球限量发行5万套,国内限量发行8000套,每套价格人民币3800元。

需要购买或邮购者,请将款汇至: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22852 68532048 传真:(010)68532569

呼唤工商文明

● 武克钢

编者按：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克钢先生前不久在北京一个企业家座谈会上发表了《呼唤工商文明》的讲话，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本刊摘要发表如下。

欧洲工商文明的兴起

世界的历史进程是如何演化的？对这样的大问题，人们会有深浅不同的解读。我的看法是，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以科技为基础的“工商文明”战胜进而取代以传统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封建文明”的过程，就是现代企业家取代传统封建贵族的过程，是用科学和民主战胜独裁、封建和愚昧的过程。

工商文明是怎样发生的呢？是小农经济和封建传统、封建文明走到了极端，走到了黑暗专制的极限后发生的。在西方，人们把它称为中世纪的黑暗。由于封建，由于农耕文化、农牧文化走到了极限，把人性的所有的光芒都掩盖了，把人性的创造性压抑了。在这种极端黑暗之中，文艺复兴的曙光在西方兴起。一批科学家、企业家、思想家站在历史的前沿，借助现代科学的思想 and 科技革命的伟大火种点燃了火炬，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哥白尼的“日心说”冲破

了宗教的“地心说”，动摇了宗教至高无上的权威。科学和理性的呼喊，终于呼喊出整个新的思维和新的科技，生产力的基础因此而变革。科学和理性是冲毁中世纪黑暗的真正神火。现代工商业文明发展于欧洲。简单说来，就是一批工商者、一批贪图钱财的、一批觉得我不应该当奴隶而是应该凭我的智慧可以和你们贵族平起平坐的新世代的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们创造了变革。他们呼喊出：凭我手里的科技，凭我的管理，凭我对生产和财富发展的贡献，我们应该崛起。代表人类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工商业者、企业家，这么一个全新的社会力量，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欧洲当年文艺复兴的背后，就是一批压不住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工商业者、企业家的意志。就是一个个新生的工商集团的兴起，新生的社会集团的兴起。

他们要变革，他们变革的对象是指向谁呢？指向的是封建贵族，指向的是那些几千年自认为对整个社会控制是不

可置疑的封建贵族。我们读过雨果的小说，读过巴尔扎克、狄更斯的小说，读过《双城记》、《九三年》等作品所描写的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整个欧洲所上演的，就是新生的企业家集团和传统的封建贵族集团进行全方位角力的精彩戏剧。刚刚崛起的企业家阶层没有社会地位，传统的封建贵族们借助宗教，借助皇权，有着强大的统治力量，阻挡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新生的工商业者越来越觉得这种不公平、这种不合理不应当再延续下去。他们不甘示弱，通过文化变革，通过工商力量发展，通过社会变革而崛起了。

欧洲的崛起，大概就是两个模式。一种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革命的模式。法国大革命，历史上可以有各种的写法，但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看到，实际上是新生工商资产阶级和传统的封建贵族之间的一次不可调和的冲撞。新生资产阶级奋起反抗传统贵族的压制，用革命的暴力把贵族推上了历史的断头台。终于以自

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为号召,推翻了君主制度,打碎了欧洲现代化的障碍。

我们还能看到另外一个模式的欧洲的现代资产阶级的兴起。那就是英国的光荣革命。英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像法国那样激烈地用贵族的脑袋来换取新生资产阶级的胜利,他们走向了另外一条路,他们走向了光荣革命。前不久我刚到英国才知道,英国在大伦敦之内,还有一个小伦敦。这个小伦敦从法理上讲不归大伦敦管,它是一个独立的小伦敦。这是个什么原因呢?当年英国的贵族和英国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激烈对抗的时候,资产阶级首先在已经被废弃的、没有人去的一个平民窟,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力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权力管理结构。他们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工商会,很多工商会的总部都是摆在这个地区。当 they 和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举起义旗进行革命,他们采取了赎买的政策。他们以当时的六十万英镑向贵族朝廷买了英国一个管辖区域内的永久自治权。这个区域我给你钱买断了,我们自己管理。在这个权力区域内,过去英国贵族经常来收税,经常来骚扰,经常来打击,他们干脆用六十万英镑把这个地区的从现在到将来永远的自治权都买下来,形成了英国伦敦商会的自治区,这就是今天的小伦敦。这个历史一直到今天,仍有象征性的仪式和意义。今

天,英国女皇如果要走进小伦敦,必须先拿女皇权杖在小伦敦的街口地上跺三下,然后由小伦敦的市长出来询问。如果女皇想到小伦敦来进行一次探访,市长得汇报小伦敦议会,等议会批准后,才能打开门,欢迎女皇进来,直至今日还是这样。我们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变革如果在中国出现,当年有人把我们西安城、咸阳城、阿房宫也买下来留到今天,不就是保留了一座完美的城市了吗?可惜呀!中国没有这样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过程。

总之,正是欧洲工商业者点燃了现代文明的火炬,呼喊出了科学、民主、人权、自由、平等、法治。所有这些口号,现代文明的口号,都是顺乎工商业集团的要求而呼喊出来的。工商业群体的历史崛起,就是现代文明的兴起,工商文明发展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体。

美国工商文明的兴起

我在美国留学五年,对这个国家多少有些了解。今天的美国走向了世界警察,走向了霸权主义,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确实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那么它又是怎么兴起的呢?

欧洲工商文明兴起以后,紧接着就是今天最具代表性的最彻底的工商文明的兴起,这就是美国为代表的美国文明。美国历史上没有过封建专制的长期统治,来自欧洲的移民们面对的是原始的印第安

人。西方移民把那片土地当成了没有人的地方,当成新大陆,以他们的洋枪洋炮,以他们的马队和先进的科技,很快把印第安人击溃了。留学过美国的人都会看到,美国人一看见国旗就会肃然起敬,就会起立,一听到国歌就会真诚地流泪。对印第安人来说,欧洲移民是强盗。但对欧洲大陆的人来说,美国是欧洲的叛逆者们组成的国家,所有奔赴新大陆的都是欧洲的叛逆者,都是对当时欧洲国家失去了信心,要投奔自由,寻找没有管制地区的一群叛逆者形成的自由国家,这就是美国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欧洲,管制太多,控制太严,在欧洲要获得发展空间,就要通过革命,要通过赎买,太累太烦,一群工商业者,一群理想主义者,一群追求宗教自主者,他们去了美国。在美国,他们寻找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他们就很快发展起来了。

很不幸的是,英国政府没有一个面对这新生社会力量的正确态度。他们把对美国的统治,企图简单变成一种殖民统治,他们把枷锁越拉越紧,把税官派到了美国的各地,把按照君主立宪的制度建立起来的一套东西要强加到这些叛逆者的头上。而这群工商文化的代表者不干,他们不愿让他们拼死逃脱的那个国家的统治延续到美洲这个新大陆。于是他们呼喊出独立宣言,他们呼喊出人权的口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工商文明的社会要求在北美大陆上最彻底地

呼喊了出来。他们要建立一个不要皇族,不要封建统治的自由社会。美国人第一场战争就是独立战争,独立战争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仍然是封建管制,是工商集团反对欧洲封建统治在北美大陆的延续。美国走上了独立。独立战争高举义旗的领袖是什么人?从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弥尔顿、杰弗逊到其他被后人所尊敬的立国者,他们五十五个人,是工业企业家、农业企业家、大金融家和律师,其中四十七位是企业家,四位是律师,还有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就是这样的五十五个人,代表着新生的力量,呼喊出了人类要求摆脱封建文化统治的最强音。他们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建立以后,出于工商业的利益和原则的驱动,他们很快地发现,如果仅仅反对封建欧洲对他们的制约,他们还不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除了废除暴君以外,还必须防止暴民。

我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最具破坏性的是“两暴文化”,即“暴君文化”和“暴民文化”。暴君把王权推到了最极端的独裁,压制了人类文明和人性的光辉。当这种压制到了极致的时候,人们对付暴君的方式就是杀掉他们,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动力是什么?是暴民。以暴制暴,成功的暴民升为君主,他的后代又被新的暴民运动所推翻。几千年来,这种以暴易暴的循环,人口周期性地被消灭,生产力周期性地被破坏。暴民和暴君是一张牌的不同面。

“两暴文化”的根基就在“官本位”。有史以来,中国的精英们无非是走两条路:一条路是“读书做官”,即“学而优则仕”;另一条路是“杀人放火”当暴民。当了暴民,或者取而代之,当暴君;或者受招安,当官。官也好,匪也好,最后指的目标都是官,都要在“官本位”的社会结构里寻找自己的地位。

“官本位”和工商文明水火不相容,“官本位”势必压制工商文明。在美国这块工商文明的土壤上,不会允许“官本位”的发展,也不应当有“两暴文化”。但这需要法律保证。

美国开国之父五十五个人,他们关上门开会了,他们明白新兴的美国文化不允许再出现封建暴君,同时又不能成为任暴民乱政的混乱社会。也就是说,工商文明的发展,一手必须防止暴君专制,一手必须防止暴民乱政。他们由此进行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运动——立宪运动,制订和通过《美国宪法》。美国《宪法》在两百多年内,五分之四的文字没有被动过,某些条款进行了十四次修订,这十四次的修订中,有两次还是为酒贸易修订的,禁酒改了一次,开放酒禁改了一次。美国《宪法》的精神是简洁的、清楚的。他们就是在现代科学、文化、人权、自由、平等发展的基础上,从社会制度上摆脱了封建王朝复辟的可能性,他们同时也从制度上控制住了来自社会底层

的可能的暴力动荡。这批开国者的智慧,他们的工商利益原则确保了美国两百年来的繁荣与发展。

三中全会开创了 中国工商文明新时代

经过25年的改革,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报告,2004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2万亿,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千美金,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进出口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20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进联合国的时候,中国赴美代表团参加这次盛会。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只能用美元。于是紧急下令全中国所有的银行将美元搜罗起来。知道找出来多少钱吗?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成了我们当时赴联合国的全部经费。今天我们的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是世界第三,我们的进出口贸易已经名列世界前列。仅仅只有25年哪!我们的国家真的是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出国,到了新加坡。我被新加坡的现代文明所震撼。当时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们在酒店说:“我们的国家五十年以后会有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吗?”我们当时的回答是否定的。历史证明我们保守了、我们错误了。我去年又去了一趟新加坡,我觉得它在一些方面还比不上我们的深圳、大连、上海

和北京。短短的25年“工商文明”将中国带上了繁荣。在“工商文明”之光的引导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中华民族崛起的道路。当然,今天中国还有八亿农民,还有几千万没有脱贫的农民和非常贫苦的地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是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真正开启的25年。经过25年,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凡是投身于这场工商文明革命的人,凡是对近代历史有所了解和客观评价的人,都不能否认这25年中华民族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从推翻帝制、推翻封建王朝到现在,仅仅只有一百年,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也仅仅是一瞬间,可是在这一百年里我们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是多么的可歌可泣。我们中华民族没有像美国的印第安人那样在强大的工商文明面前被毁灭,相反,在最近25年里,我们在工商文明的道路上开始崛起了。

毋庸讳言,正在发展中的中国工商文明,还会有种种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就是“官本位”。什么是“官本位”?就是社会上的事,官说了算。官决定着我们的命运。鲁迅先生读中国的历史,他说他翻遍了二十四史,读到了两个字——吃人。我读中国历史这本书读了一生,读出了三个字“官本位”。“官本位”是势必要排斥、压制工商文明的。

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官本位”为主的社会,官的原则仍是控制社会的基本原则。虽

然现在已经强调“小政府大社会”,可实际情况是,政府再小还是政府,企业再大也还是企业。一个科长、一个县长到了企业,还是一种君临天下的态度,他们是来视察的,企业再大也不能怠慢他们。但是,无论“官本位”如何在阻碍企业的发展,我们仍然相信,人类的发展是有铁的规律的,这就是谁效率高谁就有优势。科技和工商业代表效率,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这不是说不要官了,而是要官来适应工商业的原则。发达国家再发达,也离不开官的服务,但是有一个前提,官是否按工商原则行事,是否按主权在民,是否按自由、平等、契约、法治的原则行事。如果我们要经商,如果我们要发展,我们必须去跟官员形成某种起码的、底线的共识,保护生产力,保护发展生产力的所有人,大家一起来发展最具生产力的工商文明。

如前所述,“官本位”是以暴力为支撑的,它是以强权为基础的,它是建立在“两暴”(暴君暴官与暴民暴匪)周期性对抗并周期性转换的基础上的。那么,“商本位”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商本位”是以智力和契约为基础的。工商业者的竞争是比创新、比成本、比质量、比价格、比服务的竞争,是比创造和比建设的竞争。工商文明需要一个平等、自由、契约、法治的社会关系。因为工商文明以生产和建设为本,而不是以强力掠夺和以行政手段分配为本,所以工商文明内部的阶级关系、

官民关系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完成的,不是暴对暴。比方说,过去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但现在我们明白,这是企业内部的中上层与中下层的关系,它们之间当然会有分配上的矛盾,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需要的。谁死了都不行。没有好的企业家和优秀营销、技术人员,企业不可能发展。没有优秀的职工队伍,企业也不可能发展。如果没有职工们的努力,如果说资产阶级不给职工合理的报酬、不支持职工合理发展的话,它就不可能形成资产阶级的利益,哪怕最小的利益。大家都在一条船上。现代社会如果逐步进入工商文明,就把过去依靠强权、依靠暴力建立的文化给改造了,现在是依靠知识创造财富,依靠学习改变人生,依靠管理获得地位,依靠团队合作共同发展。工商业的发展,使整个思想文化、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开启的中国“工商文明”的进步,我们说这种工商文明给中华民族开启了一个真实的、稳定的和发展的时代。如果我们来反思近二十五年走过的路,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开创,完全可以跟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第一个共和国,跟毛泽东赢得国家独立创建新中国这样的历史功绩相媲美的。

(责任编辑 阳文)

从胡适的一首词说起

● 盛禹九

拍手高歌 庶民胜利

胡适是我国文坛巨擘。蔡元培称誉他“新知深沉”，“旧学邃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写过许多白话诗，也写过一些旧体诗词，其中脍炙人口的一首是：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民主帜，此意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笑君休笑老胡。从今后，似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这首《沁园春·新俄万岁》，是歌颂俄国二月革命的。上阕写于1917年3月21日，即革命发生后的第三天。当时，胡适正在美国留学。《胡适留学日记》中这样写道：

前日报记载俄京革命之第一日，有此一段：成群的学生很容易从他们的黑色制服和蓝帽子被辨认出来。他们中还混有许多起义士兵的粗布衣裳；各色人等杂入其中。眼下他们消除了党派之争，为了一个更伟大的事业团结成一体。

《日记》中还写道：俄国突起革命，市战三日而功成。俄沙退位，逊于其弟密雪儿大公。大公亦谦让不敢当也。吾意俄国或终成民主耳。此近来第一快事也。

20多天后的4月17日夜，胡适在《留学日记》中又记了一段：

吾前作《沁园春》词记俄国大革命，仅成半阕。今读报记俄国临时政府大赦旧以革命暗杀受罪之囚犯。其自西伯利亚赦免者十万人云。夫囚徒十万志士于西伯利亚，此俄之所以不振，而罗

曼诺夫皇朝之所以不倒也。而爱自由谋革命乃至十万人之多，囚拘流徙。摧辱惨死而无悔。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也。吾读之有感，因续成前之词而序为右。

56年前，我读过胡适这首词。激情荡漾的文字曾经唤起了我对革命的向往。“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使我记起了俄国从普加乔夫到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那段可歌可泣的百年历史：为了反对沙皇的暴政，多少革命者流血牺牲，多少工农和知识分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然而，暴政和镇压并没有使俄国人民屈服，反而唤醒并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前仆后继，进行着英勇的斗争。1827年，普希金写了《致西伯利亚囚徒》的著名诗篇，热情地歌颂了那些英勇无畏的革命者：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
愿你们保持崇高的榜样。
你们悲惨的工作和崇高的理想，
决不会就那样消亡。

……

沉重的枷锁会被打破，
自由会来到你们的身旁；
牢狱之门也会打开，
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

这首诗被人带到西伯利亚，在当地流放的十二月党人诗人奥多耶夫斯基写了一首诗回答普希金，其中一句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燎原大火烧毁了沙皇的宝座，“一万里飞来大赦书”，“冰天十万囚徒”得到解放。激情奔放的胡适因此拍手高歌：“新俄万岁”！

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之后，诞生了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继续较量，



胡适(左)与梁实秋

彼消此涨,局势未定,所以胡适词中有“后起谁欤”之句。果然,几个月后,无产阶级十月革命成功了。为此,李大钊热情高呼《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他在文章中写道:

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件事的征兆,和世界全局的征兆有关联。1789年法兰西的革命,不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1917年俄国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

事实也如李大钊所料想的那样:继十月革命之后,中国革命胜利了,许多国家的革命胜利了。74年后,苏联和东欧集团国家解体,这些国家又在恢复、继承和发展俄国二月革命的事业,走向新的时代。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见微知著,“一叶惊秋”。“从今后,似这般快事,后起谁欤?”在这一点上,胡适和李大钊都有着惊人的预见性!

两阕《沁》词 同工异曲

读胡适的这首《沁园春·新俄万岁》,很容易使人想起另一首词,那就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

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毛泽东作古以后,著名的旅美学者周策纵教授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详细研究和比较过毛泽东和胡适的这两阕《沁园春》,发觉它们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首词用同一词牌《沁园春》,主题同为雪。“冻雪层冰,

北国名都”和“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从用词到意境,多有暗合之处。毛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似由胡“乌衣蓝帽,轩昂年少”脱胎而来,且同指革命者的服色。至于“无数英雄竞折腰”,不正像“万众欢呼”“拍手高歌”吗?胡句有“毕竟谁输”,毛则有“欲与天公试比高”;而且毛的“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还是胡的“毕竟谁输”之意;从句法上,“惜秦皇汉武”似“去独夫沙”;“看红装素裹”类似这般快事;而结尾三句更妙:一个是“从今后,似这般快事,后起谁欤”?一个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都是历史的纵观,今昔未来的对比,只是毛用肯定语气,更见豪放的力量。

胡适《沁园春》成稿于1917年4月。这年底,胡适从美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此词最初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后收入胡的《尝试集》中。1918年7月,青年毛泽东来到北平,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并且成为陈独秀、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热心读者。毛泽东后来对埃德加·斯诺说:“我特别喜欢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做了我的崇拜人物。”在北大工作期间,毛泽东想已读过胡适的这首词,并受其感染,铭记在心。毛的《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发表于1945年。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对前人的佳作,常化而用之;在写《雪》一词的过程中,会不会从胡词中得到启发和灵感呢?

胡适论词,特别强调的是词的内容,即意境和情感。他认为:“单有音律而没有意境与情感的词,全没有文学上的价值”“重音律而不重内容,这种人不是词人,只可叫‘词匠’。”两首《沁园春》,就气魄而言,毛词显然高于胡词,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柳亚子评《沁园春·雪》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然不论从音律遣词,还是从情感和意境来说,胡词亦不失为上乘,这是人们的共识。

胡适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都是歌颂革命的:胡适歌颂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毛泽东歌颂的是无产阶级革命。

写到这里,我记起了韦君宜在《露沙的路》一书中写的一段文字:

露沙想教学生一点诗。有一天,她选了毛主席的《长征》……她在堂上高唱起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第二次又选了一首赞美当年俄国革命的词:“客子何思,冻雪层冰……”但是当念到“新俄万岁”的地方,她忽然不那么神气昂然了。自己心里有点不安:

这首诗,是胡适之做的。胡适之这个人,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是顶臭的。把他的作品选了给学生讲,不那么合适吧?自己是一时失于检点。

下了课,她把这件事告诉老崔。老崔说:“其实一诗一词都不错。可是,毛主席的诗,好就是好;胡适之的词,好也是坏。咱们这些人,看作品不能只看作品本身哪。”

他说完了,轻轻叹了口气。

这是韦君宜叙述自己1938年在陕北绥德教书时的一件小事和当时人们的心态。当我读着这一段文字时,也只能是“轻轻叹了口气”!

民主自由 陈胡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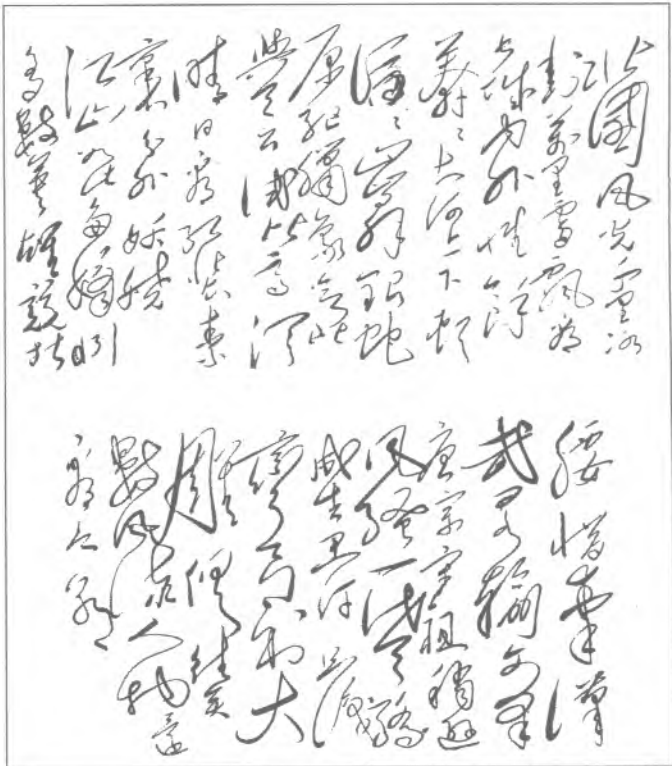
正如韦君宜所说,在过去一段时期,胡适其人和他的诗,在大陆确实是“顶臭的”;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两次“胡适大批判”,胡适从过去被称为“当今孔子”和“圣人”,一下子变成为“奴才”、“走狗”和“最危险的

思想敌人”,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真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平心静气论胡适,他既不是什么“当今孔子”和“圣人”,也不是什么“走狗”和“敌人”,只不过是一个信奉和鼓吹“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或曰“民主个人主义者”)而已。

什么是自由主义?胡适的解释是:“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我提倡自由,我一直主张,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人民必须享受思想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发表思想的自由——就是言论自由。”说他是“最危险的思想敌人”,主要是因为他在以上这些问题上,与无产阶级提倡的在很多地方是相对立的。

胡适的一生,无论从学或议政,都是为了鼓吹和实践其“自由民主”和“学术独立”这一理念而奋斗。他从大陆到台湾,曾扶植过许多学术团体,办过很多刊物,累遭批判和厄运。例如,在上世纪20年代,胡适创办《努力》,鼓吹“好人主义政府”,被北洋军阀政府“止了壁”;之后,他办《新月》,鼓吹“人权”,抨击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专政”,又受到了围剿;



毛泽东词《沁园春·雪》手迹

30年代,他的《独立评论》揭露“华北自治”阴谋而被查禁;50年代在台湾,他支持雷震的《自由中国》,针砭台岛时弊,鼓吹民主自由,再次受到围剿,《自由中国》也因此查封。

胡适曾多次拒绝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引诱,和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有过合作,但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他参加过国民党的“国大”,主要是为了实践其“和平的渐进的改革”的理想;他曾多次“进谏”蒋介石,要蒋“废除总裁制”、“实行多党制”、“培植言论自由”,并下“罪己诏”等,被蒋一一拒绝。在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如此漫长,传统势力如此根深蒂固,又如此缺乏现代意识的国度,要实现民主自由,谈何容易!当胡适“自由民主”的理想一一遭受碰壁和破灭后,他只能以流落异乡、晚景凄凉而告终。

列宁曾经这样说过:“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作为时代的启蒙者,胡适和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曾一同高举过“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之后,两人又分道扬镳:一个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一个信仰共产主义。这一段期间,两人在个人信仰上又都有过反复和游离。例如,1926年6月,胡适去苏联参观后,曾表示“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列宁一般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苏俄的制度是否有普遍系性?我的答案是,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我们如果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1934年9月,胡适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还歌颂过“那些为民十三以来的共产主义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在历经坎坷和反思之后,写了《我的根本意见》一文,明确指出:

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又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钱不值。

.....

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这样,在如何认识民主这个问题上,陈独秀和胡适两人晚年又回归“五四”,取得了共识。

56年前,笔者听过胡适的一次学术讲演,那是1948年10月在武汉大学念书的时候。记得那次,胡适作为武大校长周鲠生的朋友,应邀来到珞珈山讲学。他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身着浅灰色派力司长衫,在学校大礼堂里,面对莘莘学子侃侃而谈,讲演的题目是《东西方文化》,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为此,笔者曾写过一篇通讯——《胡适博士在武大》,发表在湖南的一个报纸上。这个报纸的所有档案资料在“文革”中荡然无存。我的原稿也在“文革”中销毁,详细内容已经淡忘,只记得那篇文章对胡适总的评价是:学术上肯定,政治上则是否定的。

54年后,在广西柳州一位朋友的家里,重读和谈论《沁园春·新俄万岁》这首词,我对胡适又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感悟:

作为一个学者和新文化运动的拓荒者,胡适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考据,以及宗教等诸多领域。他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比如,早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就着力地强调过“实事求是”的这一观点。他提出过:“一切学术和理想都必须用实行来试验过,试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这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同样一个意思。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至今仍为许多学术工作者所遵循。他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生格言,闪耀着思想的光辉,鼓舞着人们为崇高理想不懈奋斗。除此之外,我还赞赏这样一个观点:“他[胡适]的真正价值还是在他毕生挂怀、一贯坚持的中国的民主、法治、宪政上。他独特的贡献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很少的宽容精神。”

胡适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真正认识还需要时间。可以相信,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思想将越显露其光辉,他的业绩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正如胡适暮年喜爱吟颂顾炎武的诗句那样:

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至望河清。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从魏延说开去

桂向明

魏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在党内斗争中，某公称彭德怀为“魏延”，其实不是；也有论者替魏延打抱不平，断言“魏延之乱始于诸葛”，是耶？非耶？谨申管见，就正于广大读者。

作为蜀国大将，魏延智勇兼备，战功不在关羽、张飞之下。史书说他“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只有长史杨仪不买账；“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但杨仪非寻常之辈，刘备同他“语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大悦之”；“亮数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魏延也确实过分，两人争论激烈，“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这便埋下冤冤相报的种子。帐下文武不和，诸葛亮既“深惜（杨）仪之才干”，又“凭魏延之骁勇”，而“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时军中司马费“领会主帅意旨，每当魏、杨发生争执，即入坐其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匡救之力也”。

到诸葛公病歿，魏延和杨仪矛盾激化，“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

一员沙场勇将竟至于众叛亲离，身首异处，诚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所言：“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至于说魏延后脑有反骨，诸葛临终授计，那是小说家虚构，和诸葛亮无关。

值得一说的是，“建兴十年（刘琰）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亮责让之”，并“遣琰还成都”。刘琰不同于杨仪，他“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是无足轻重的角色，故坚决调离。由此可见，诸葛平生谨慎，思虑周密，一切从大局出发。

应当指出，诸葛亮并不偏袒杨仪，他密表后

主，认为杨性狷狭，不宜重用。后“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杨仪自以为“年宦先（蒋）琬，才能逾之”，而位在蒋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之后上书诽谤，“遂下郡收仪。仪自杀，其妻子还蜀”，也是悲剧人物。

魏延恃才傲物，喜欢闹独立，“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诸葛亮对他心存戒备，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护军姜维等作身歿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

我们不得不佩服诸葛料事如神，“亮适卒，秘不发表，仪令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健）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耶？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跋扈骄横之态跃然纸上，陈寿言信不诬也。说“魏延之乱始于诸葛”，却找不到半点事实根据，学术讨论的基本原则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切忌信口开河，妄下断语。

魏延、杨仪搞“窝里斗”，均不得善终，这是应该吸取的教训。我以为，关键是摆正个人在事业中的位置，诸葛亮功高并不震主，因为他没有私心和野心，“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武侯祠原是昭烈庙，但在后人心目中，诸葛亮的形象高于刘备，就把这个皇帝挤到偏殿去了。陈毅游武侯祠后写道：“孔明反胜昭烈，其故何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

平心而论，魏延有才有志，只是人格尚有缺欠，现在某些文坛勇士今天批评这个，明天批评那个，和魏延争强好胜的心态毫无二致，迟早要摔跟头。

看看鲁迅大师吧，先生对冯雪峰说：“我想，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

（责任编辑 赵友慈）

苏联拆运我国东北机器史实

● 薛衔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全境，随即将东北经济纳入战争体制，对东北工业实行垄断性经营。为了不断满足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急需，日本一方面对东北人民敲骨吸髓，聚敛可以搜刮到的一切财富，作为原始资本，投入到工业中去；另一方面从其国内向东北大量转移资本和机器设备，在东北建设起强大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到了抗战末期，日本为躲避美国飞机轰炸，把一些要害的工业部门也转移到了东北。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任日本无代价、无限制地掠夺，东北大量青壮劳动力被驱之如牛马，不分昼夜的为侵略者“勤劳奉公”。在这种超常生产的情况下，东北的工业飞速发展。据专家估计，到抗战末期，东北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出日本本土之上，东北真正成了日本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基地。日本在东北的工业，自然成为同盟国注意的目标。

中国浴血抗战8年，如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对日作战算起，中国人民抗击日本长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民族牺牲最大，所作贡献也最大。所有在华日本资产作为对华战争赔偿费用，无论就公理，还是就法理而言，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945年中苏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开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就明确指示中国代表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斯大林当时对中国这一正当要求也表示“同情”。

抗战结束后，1945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向美、苏建议：凡属日本及日本国民在华领土内所有全部产业权、契据、利息以及各类财产，包括房屋、发电厂、各种工厂、船只、船坞、造船厂、机器、矿业、有线及无线电设备材料、铁路、车辆、修理厂等

等应认为已让予中国；凡属同盟国约定归还中国之领土，如有盟国军队驻扎，应采取一切必要及紧急办法，防止敌人从事摧毁、破坏、隐藏、移动及转让等行为；关于分配日本国内各种资产，中国应享受优良百分法，及交货优先权，以抵偿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受之长期牺牲与损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复函表示，苏联完全理解中国对日本赔偿问题的立场，具体办法应由四强（中苏美英）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做出。美国还在1945年8月下旬宋子文访问时，就表示支持中国的要求。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接见宋子文时说：“中国抗战八年，苏对日作战仅数月，向日本要求赔偿，中国自应居首位。”英法等同盟国对中国的正当要求也表赞成。在当时看来，日本在华资产，作为对华赔偿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并无问题。但是谁也没想到，都认为没有问题的事情却出了问题。

斯大林虽口头上对中国以日本资产作为赔偿的主张表示同情，但实际上他对东北的日本工业早就另有打算。在签订《雅尔塔协议》时，他对罗斯福要条件：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东北的全部特权，否则他无法对人民交代苏联为什么要出兵中国东北。这是他公开说出口的出兵东北的目的；还有没说出口的目的就是把东北的日本资产全面占有、重点摧毁，然后实行垄断性的经济合作。对后一目的，是后来苏联代表在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谈判时透露出来的。

所谓全面占有，就是把东北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红军的战利品，由红军全面接收。重点摧毁就是把最新最好最重要的机器设备拆运到苏联，满足自己的需要。剩余的部分，一分为二，中苏各占其一，双方再进行排他性的经济合作，以免第三国（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这三个环节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全面占有和

重点摧毁。三个环节都服从于苏联国家安全的目的。

由于东北的轻重工业几乎全为日本的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满洲电业株式会社以及满铁株式会社所垄断，苏军占领东北后，首先将这几个垄断组织的头头满洲重工业会社总裁高崎建之助等日本高级经济管理人员抓起来，拘留于长春寓所，严加看管，然后从他们口中索取各种所需要的材料。让他们证明，东北某某企业是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资本占多大比例，以便为苏军将企业攫为战利品提供“事实根据”。

把各种材料准备齐全之后，苏军当局于1945年10月24日，强迫高崎建之助“将属于满业之各种事业移交于苏联”。高崎表示，满洲国既已解散，他作为满业总裁，无权签署这样的文件。既然苏联要求移交，应由苏联下书面命令；不然，“将来中国方面必有异议”。但苏军当局拒绝下书面命令，并说中国方面，由苏联解决。高崎经不起威胁利诱，于10月29日与其他管理人员联署了以下文件：

在满业所辖之各公司，亦曾为关东军之需要而工作，为其公司业务执行者之我辈，将我等对于全部财产之权利，移交与苏联。此等公司之财产包括其事业所、事务所、住宅及其他各种建筑物。此等公司之名簿，及应交与苏联之事业所一览表，一并附上。我等希望……对于所有之专门家、技术者、事务员、工人等，向在此等事业中工作者，不问其民族如何，均予以职务，保证其生命财产与生活。

这样，高崎等一伙为了活命，非法签署了移交文件，将由他统管的72种工业，以及150种辅助工业作为军事企业移交给苏军。苏军还让高崎倒填日期，填为9月17日。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等也签署了同样的文件，作了同样的移交。

在逼迫高崎等人进行移交期间，苏方派出人数不等的武装“代表”对各工厂一一实行接管。如辽阳橡皮公司20人、本溪钢铁公司53人、抚顺铁厂50人、轮机油厂30人等，总计783人。

这些工厂大部分是民用工厂，而不是军用工厂。但苏联认为，凡是为关东军服务过的都是军用工厂。因为谁也不能说关东军不抽烟卷儿，不洗衣服，不点电灯，不住房子，不用瓦，而且日本工厂负责人还出据了证明，证明以上所有工厂都是为关东军服务的。

接着是拆运。实际上，仗一打完，拆运就开始了。以让高崎倒填的日期断定，苏军拆运机器设备至迟是1945年9月下旬。所有被苏联认定为战利品的工厂，都被苏军当局派兵把守，严禁外人进入。日本战俘（特别是技术人员）是拆卸机器的主要承担者，事后被押赴西伯利亚战俘营作苦役。他们把工厂里的机器和重型设备拆卸下来，装进箱里，并拖拽到铁路的起点。然后分海（大连）陆（向北经黑河，向西经满洲里，向东经绥芬河）两路运往苏联。苏方人员接管各工厂后，则由苏方技术人员指挥下有选择有计划地进行。对工矿机器设备拆毁的程度，取决于工矿本身的重要程度和苏联对其机器设备需要的程度。例如，东北最大之鞍山钢厂是东北的骨干企业，“摧毁”该厂，便可瘫痪整个东北工业体系。因此苏联对其拆运也最为认真，由苏军中校柯刹罗夫指挥苏俄技工80名，暨工人及日俘共8000名，经40余日才拆运完



1946年1月22日，国民党当局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左一）同苏联红军代表到机场迎接来长春商谈苏军撤军事宜的宋美龄（前排左三）

毕。该厂被洗劫之彻底,非经重建,永无恢复之可能。又如,奉天飞机制造厂,月产高等教练机70架(装配),发动机100台。后来为躲避美机轰炸,实行分散经营,设公主岭和哈尔滨二厂。公主岭月产高等教练机30架,发动机100台。哈尔滨月产高等战斗机10架,发动机100台。以上三厂全部机件均被苏军拆运而去。所有的汽车制造厂的机部件也被拆运一空。拆运这些工厂的机器设备,既破坏东北的工业基础,又满足苏联的需求。东北水电和火电发电机,苏联也有需求,但苏联准备与中国合作,就拆了大部分,留下小部分。整个拆运一直到1946年3月苏联最后撤军时为止(实际上已无可再拆了)。

被拆卸后的工矿企业一片惨景。当时中外通讯社作了大量报道,现择录几则如下:

美联社:中国接管东北工业的希望已粉碎无余。记者目睹无数工厂仓库及机厂,战前曾充满活力,今则工厂阒其无人,仓库已被洗劫一空,机厂设备亦荡然无存。只有孤独步哨巡行其间,红军以机关枪驻守荒废各厂,红军司令虽令英美记者团随时随地视察,但仍一再被阻。

中央社、合众社:沈阳全城共有工厂4570家,内有第一、第二等工厂948家,战时全部开工,今仅有20家继续开工,内15家由中国人任经理,5家苏联人任经理,惟此继续开工的20家也均由苏方控制,苏方派兵守卫,其他工厂大部经过焚烧,仅余屋壳,重机器被掠,任何有价值物件,又遭小贼偷窃而去。20家工厂之机器,已于数月前被运走。

美国星条报:东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经日人苦心经营之庞大工业,在屠杀及恐怖中被洗劫净尽,工厂工人亦被逼协助搬运,唯大部工作,系由日本战俘为之。自哈尔滨起,凡重大军械飞机厂,据传已被剥精光,大部赃物俱由大连出口,运至海参崴,转载至苏。哈尔滨和大连之间铁路交通,现由苏方严密守卫运用,载运其“六日大战”作为战利品的千万吨重工业机械。

合众社:东北不复为富庶工业区,“九一八”后日本辛苦经营之结果,已尽付东流,盖东北无数工厂,已被按部就班搬运一空,各种机器,不论大小,自火车头至旋凿,皆被苏军当作战利品车载而去。

苏联也是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照理说它应对同样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中国充满同情,可它为什么如此野蛮地摧残东北的工业呢?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向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透露,“苏联对东北之经济”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也就是说保证苏联的国防安全是它对东北一切经济要求的核心。长期以来斯大林对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怀有恐惧心理,用董彦平的话说,就是苏联对东北抱有“过分的安全感”。抗战期间,日本对苏联进行了两次军事挑衅,一次是哈桑湖事件,一次是诺门坎事件,日军都是以东北作基地,发起挑衅的。斯大林对此不能不铭记在心。他认为,在靠近苏联力量最薄弱的远东地区保留中国东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对苏联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而苏军占领东北正是解除这一威胁的最好机会。所以日本一投降,驻东北苏军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东北工矿、企业下手了。为了自身的安全,哪里还顾得上中国的民族利益!

苏联拆运机器设备的总价值到底有多少,有各种统计数字,如(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库藏史料中的有关资料、中国记者的统计资料、鲍莱调查团的统计资料和东北工业会及日侨善后联络处(下称“东北工侨”)的调查资料都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数字。这些资料中统计数字的出入主要因调查详略和货币换算不同所致。例如,鲍莱调查团的资料,当时认为是权威性的,但事后发现,鲍莱的调查并不全面,首先,许多地方就没有去调查,而且换算也有失误之处,据鲍莱的估算,苏联拆运所造成的损失为895,000,000美元。相比之下,“东北工侨”善后联络处的调查就更准确一些。该处于1946年冬组团,对东北工业所受损失的情况作了更为详尽的调查。调查团各组有21名前东北各事业高级主管,了解实际情况,判断事实与估算方法也比较可靠,损失程度以恢复原状估计,损失额折合为美金,以珍珠港事件前10年美金与日圆的比率和1934—1945的10年中机器和材料的物价指数折算,100日元等于23.53美元,机器价值均摘自各厂账簿。按“东北工侨”的统计,损失为1,236,211,000美元。但占东北企业三分之一的日本陆军企业并未包括统计之内,如加上这部分损失,总计不下于2,000,000,000美元。币值以战

前为准)。

“东北工侨”的调查,凡与鲍莱报告出入较大之处,均说明理由。例如,关于非金属工业方面的损失,鲍莱的数字为10,000,000美元;“东北工侨”为60,815,000美元。“东北工侨”解释说,鲍莱团仅谈及大矿二所及小矿若干之损失,而本团则亲至大矿十四处详细调查,求得其损失如上,此外尚有大矿十家,无法前往,其损失如何,亦无从探知”。而电报电话方面的损失,鲍莱的数字则大于“东北工侨”的数字;“东北工侨”也如实作了说明:鲍莱得出损失为25,000,000美元的数字,是因为鲍莱团假定全部损失为全部投资额的60%;本团(“东北工侨”)查得满洲电讯之投资几集中于新京、沈阳、大连三处,而遭受损失者亦以上述三处为重,达18,500,000日元之多,如以4.25除之,则得是4,588,000美元”。这种追求实际、不追求数量的调查资料当然具有说服力。

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对苏经济合作代表张嘉一到东北,就按照政府指示,向苏方声明,东北日资产业应作为日本赔偿的一部分,归中国所有,并对苏联大肆拆运东北机器设备,提出质问。苏方一口咬定,凡为关东军服务过的日资企业都是苏军战利品,毫不让步。1945年底、1946年初蒋经国访问莫斯科,直接要求斯大林取消“战利品”的说法,因为中国人感到耻辱。斯大林以取消战利品的说法将使苏联军人感到耻辱为由,把蒋经国给顶了回来。此后,苏联领导人和苏联学者一提到这次大拆运,总是理直气壮,还编造了种种理由,毫无歉意。其实,苏联这样做,即违反公理,也违反法理。

首先,所谓东北敌产(日本产业),不同于日本本土的敌产。据张嘉调查,东北敌产中相当一部分是东北人民的财产。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发行钞票130亿元,其它发行的公债、邮政储金、人民存款尚有二三十亿元。这样,中国中央政府对东北人民将负有一百五六十亿元的债务。而东北全部工矿如数保存其现有财产,不过百亿。根据这一基本事实,张嘉提出,“满洲所有敌产应以抵偿所负人民债务,如有剩余,应以之赔偿中国八年抗战之损失。故一切敌产,应归中国没收”。苏联谈判代表斯拉德科夫斯基则根据被苏军扣押的前日本在东北的企业负责人所提供的资料,说被苏军指

定的日资企业,日资占70%以上,而华资占30%以下。即使按苏方的统计数字,30%的中方资产也不能被作为敌产白白没收而去。于是,苏方提出,将被它拆运剩下的机器设备的一半,作为苏联对华友好的“礼物”,无偿赠予中国,与中国共同经营。实际上,还是全部没收。

其次,苏联谈判代表多次强调,苏联出兵东北蒙受了重大损失,暗示它有权占有和没收东北机器设备以弥补军费。这也是毫无道理的。对于苏军军费问题,有些情况必须阐明。苏联出兵东北,如果它完全是帮助中国,军费当然应由中国完全负担,因为苏联帮助中国收复了东北。但苏联出兵东北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过程中,斯大林说,旅顺口为苏联海军基地,大连辟为自由港,长春铁路中苏共有共管,外蒙古独立,这些问题不解决,他就无法向苏联人民交代苏联为什么出兵东北。中苏条约与各项协定签订了,苏联出兵的目的达到了。所以,当斯大林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约谈判过程中,提出让中国负担军费时,被宋子文一口拒绝,斯大林也没有坚持。苏联对日作战仅有一周,从中国取得的利益足可补偿苏联对日作战的损失,所以苏联出兵东北不应让中国支付军费。这是关键事实之一。事实之二,中国长春铁路(原中东铁路)的满洲里至绥芬河段与哈尔滨至长春段,苏联早已出售给了伪满洲国(日本),它对这段铁路这时已不再拥有所有权了。所以,这段铁路应该完全归中国所有。苏联将自己卖出的东西,与中国“共有共管”,就等于向中国行抢。事实之三,仅就军费而言,中国也不是毫无支出。苏军占领东北后,即将所有银行现金和金银等贵金属全部提走。特别是1945年9月24日起,苏军当局在东北发行军用票,变相地让中国负担了苏军驻扎东北期间的军费。该票以元为单位,与东北货币共同流通,比价为一比一。实际上苏军进入东北之后,苏军在东北的全部开支,用的是从银行提走的现金和军用票。这些军用票转化为东北人民供养苏军的物质负担。军用票的发行,至当年12月10日才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签订《中苏财政协定》。该协定将苏联发行军用票的日期向前提到1945年8月9日,并规定苏军撤退两个月后,由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用东北流通券将军用票换回。中国政府的这项开支,由中国向日本索

赔。这就是说,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为自己的战败国日本“垫支”了费用。苏军当局共发行多少军用票,待苏方有关档案公布后才能知晓,但到1945年12月1日,已发行了28亿元(相当于当时东北货币总额),以此估计其总数不下于60亿元。中国连日本战争赔款都没要,当然更不可能向日本索要苏军的这笔开支,苏联军用券补偿问题也就不了了之。这些情况,苏方完全明白,中国没有再行负担苏联军费的义务。因此,对军费问题,苏方从没有明提,但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开始,又总是不断地暗示。这种暗示,又往往与“无私”、“解放”等冠冕堂皇的用语同时俱来。

斯大林理直气壮地说,苏联将东北日资企业视为战利品并进行“毁灭性”的拆运,是根据战争法。但战争法是怎样规定的呢?根据1907年海牙陆战章程规定:战胜国对占领国财产的处理,首先要分清是公产还是私人财产,凡属私人财产一律不可侵犯。第二,对占领国的公产,必须分清动产和不动产,对动产现金、车船等经过移动不改变其原有价值的财产,战胜国完全有权据为己有,也就是说可以作为战利品加以没收。但对不动产,房屋、土地、工厂、矿山连同机器设备,一律不得搬运毁坏,必须严加看管,等候战后议和时处理。因为这些不动产,一经搬动,其固有的价值将损失殆尽。苏联是海牙章程的签字国,它对东北财产的处理,除了没收现金等动产符合战争法外,对工厂、矿山等机器设备的拆运,都是典型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被誉为战争法权威学者的夏尔·卢梭特别指出:“苏联政府于1946年把在中国东北各省的、曾经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所有日本企业视为战利品。这种解释遭到了美国和中国的反对,因为这种解释超出了国际公法和国际实践普遍承认的战利品的概念”。苏军不仅将东北现金、证券、金银搜刮一空,而且不分军需、民用,将东北轻重工矿企业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拆运而去,造成亘古浩劫,这是二战后一起最严重违反国际法的事件。

从国际政治角度看,苏联拆运东北机器设备对同盟国也是一种背信弃义行为。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英三巨头即已商定,对日本所有境外资产,应优先赔偿受日本侵害最重、在战胜日本的过程中贡献最大的国家。但日本一投降,苏联就背着自己的盟友(包括中国),几乎将全部

日本在东北的资产据为己有。非但如此,苏方还闪烁其词地宣称:苏军拆运东北机器设备,是根据三巨头或许在雅尔塔,或许在柏林达成的协议。这就更加激起盟国的一致抗议和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1946年2月26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断然指出:“据其所知,美英苏三强间,并无准许苏联搬运满洲方面日本机器之协定。”3月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本政府不接受战利品包括工业企业或如中国东北境内日本工业及设备(即工业企业之附属品)之任何解释”,并将其2月9日致中苏两国(其实针对苏联)的照会公开发表,把美国的立场和主张“认为对日本国外资产,例如满洲的日本资产的最后处理,乃一切担负击败日本主要责任的盟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建议成立盟国对日索取赔偿委员会处理日本赔偿问题”公诸于世,进一步引起盟国和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3月6日,英国外交部表示,苏联搬运东北机器设备没有任何协议根据,东北日本资产应由盟国共同解决,在解决之前,应由资产所在国(中国)保存。并于3月9日照会苏联政府,英国“对于第三者(即苏联)擅自运走此类财产(东北机器设备)不能同意”。美国62名社会各界名流还发表《对中国东北宣言书》,严厉批评《雅尔塔协定》和苏联,对中国表示同情和支持。该宣言书说:“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公布,使中国对美国的名誉信念发生动摇。苏联仅以6日的战争,竟藐视数年以来经历痛苦失败,卒赖共同牺牲,获致太平洋战争胜利之中美两国,中国于此危机中之反应,自属明白,然美国之反应又如何耶?”“吾人必须为中国力持正义……支持中国人民之呼声,彻底修正《雅尔塔协定》之要求”。外国报刊纷纷谴责苏联违法行为,对中国所受浩劫表示同情,对中国正义要求表示支持。

但苏联完全不顾美英抗议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于3月12日复照美英,强硬坚持“任何日军所属物件,苏军悉可视为战利品”。美英曾想在行将到来的巴黎和会上向莫洛托夫提出解决办法,但后来害怕影响和会议程,这一设想遂胎死腹中。

苏联对东北机器设备的拆运,直接影响了它第三个方案,即垄断性经济合作协议的达成,因为机器都差不多拆光了,还有什么可合作的呢!

(责任编辑 李 晨)

“孤岛”时期郑振铎抢救国宝

● 倪怡中

“日子久了,了解较深,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完全出于爱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他后来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

这是巴金百年诞辰时候发表的,他在1999年1月才修改、续写完的《怀念振铎》中的几句话,也许这是巴金发表的最后文字了,是什么引起巴金对老友这样深切的怀念呢。

“狂牖文献耗中年”,龚定庵的这一句话,对于我是足够吟味的。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摘自郑振铎《求书日录》

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以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摘自叶圣陶《西谛书话·序》



郑振铎

郑振铎说他不能逃避的责任,叶圣陶说郑振铎正在做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发动“事变”,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日本侵略军不仅仅要占领我们的国家,而且要毁灭我们民族的文化。许多保存着重要民族文献的图书馆、藏书楼都成为日本重型轰炸机俯冲投弹的目标,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常塾古里铁琴铜剑楼都遭到轰炸。8月14日,郑振铎寄存在虹口开明书店的100多箱古籍被烧毁。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

除了苏州河以南的所谓英、美等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其他地方都已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上海成了“孤岛”。江南历来多著名藏书楼,作为一名嗜书如命的学者和藏书家,郑振铎眼看江南许多珍贵典籍毁于战火,幸存下来的,也纷纷被其家属出售,贖救度难,这是怎样的一种伤痛呢!他深深地感到,国难当头,抢救祖国的优秀古籍文献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义不容辞的工作,他勇敢地、执著地留在了“孤岛”。

“八一三”以后大量珍贵古籍流失

“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许多著名藏书楼毁于战火,珍本典籍损失惨重。侥幸保存下来的,也纷纷被家属变卖换钱,维持生活。许多平时不易一见的秘籍频频出现在上海的古书摊肆上,汉口

路、四马路一带书坊里,北方来的书商终日盘据。他们为利所驱,南下收书,一包包收购来的古书,捆扎成邮件待运,堆得像小山。他们收购来的图书卖给谁呢?郑振铎通过书店的朋友打听到,大多是卖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去的。这时,上海报纸登出消息,报道中国图书流入美国情形时说:“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20万册。为数且与日俱增。”这消息使郑振铎极为愤怒而忧虑。更重要的是,华北交通公司是敌伪机关,他们居心叵测,大量收购府县志等地方文献和有关史料文献,显而易见,是帮助他们调查物资资源,研究地理形势和行军路线,直接为他们的侵略战争服务,更进一步妄想控制我中华民族史料及其文献,达到灭亡我中华民族和文化的罪恶目的。郑振铎忧心如捣,日夜焦虑不安。作为一名著名学者,他当然知道这批图书的价值,岂忍眼见这些国宝流失呢。作为一名著名作家,他的稿酬和版税收入丰厚,但他嗜书如命,余钱都用来买书,乃至他的夫人高君箴为了家庭生计经常与他吵架。尽管如此,他仍竭尽全力,遇到好书,倾囊收购。一时拿不出钱来,就拿自己的藏书作抵押借款,也要将书买下。有一次为了筹钱,他将自己珍藏的七十种明清书刊传奇杂剧、十几种明人集,分两批出让给北平图书馆,得7000余元。他想,卖给图书馆,书还是属于国家的,而且得到的这笔钱,又可以收进许多珍本书,使其不流散出去。这是非常值得,非常划算的。他用这7000余元钱收购了八九百种古籍。只靠他个人的微薄之力,即使把他的藏书全部卖光,也只是杯水车薪。他在《劫中得书续记》中慨叹道:“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一部《元刊古今杂剧》

1938年5月的一个晚上,中国书店经理陈乃乾打电话给郑振铎说,一个苏州书商发现了32册元剧,带到上海,其中有刻本、钞本,刻本有写刻

的,像《古今杂剧选》,有宋体字,不知何人所刻,钞本则多半有清常道人赵琦美的跋。郑振铎不禁怦然心动,难道是他寻访已久的那部书出现了?

郑振铎热衷于中国古代戏剧文献的收藏。但是,由于古代对戏剧的轻视,流传下来的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存杂剧,只有明代选家臧懋循《元曲选》和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所收162种(臧选实际上只选取了元人杂剧94种,其中还有可疑的在内,余6种为明人作)。现代陆续发现刊行于臧选之前或约略同时的杂剧选集若干种,较之臧选均相形见绌,所载至多不过臧选一半,且所能补充臧选取的,也不过寥寥几种而已。郑振铎曾在顾曲斋刻元剧里找到关汉卿《绯衣梦》一种,就诧为不世之遇。

可是郑振铎仍然认为一代元剧不会仅仅只留存百来种,完全有可能有新的发现。他在撰著《文学大纲》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从很多书中都有发现了元杂剧的线索。明代著名藏书家,如《祁氏读书楼目录》、《晁氏宝文堂书目》都有惊人的丰富的曲藏目录。《季沧苇书目》也载有钞本元曲三百种,一百册。特别是清代常熟著名藏书家钱遵王的《也是园书目》记载了大量元杂剧的名目,钱氏距今不远,郑振铎不相信这许多书会全部不存于世。

1929年郑振铎从欧洲回国。一天他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上看到常熟藏书家丁初我《黄菱圃题跋读记》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发现黄氏的《古今杂剧跋》。丁氏注云:“也是园藏赵清常钞补明校本,何小山手校。”又跋云:“初我曾见我虞赵氏旧山楼藏有此书,假归,极三昼夜之力,展阅一遍,录存跋语二则。”又云:“案也是园原目除重复外系三百四十种。菱圃所存为二百六十六种,实阙七十四种。……汪氏录清现存目录十四纸,依此书之次第另录之,实存二百三十九种,又阙二十七种。”

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个发现!郑振铎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就是说文章作者曾见到过这套也是园藏《古今杂剧》,这书至今没有亡佚,虽有阙失,但余下的二百三十九种必定还在人间!郑振铎立即写信给北平的朋友打听书的下落,又从朋友处询问到了丁氏已迁居苏州,便立即赶去苏州找他。丁氏说他当时只借阅了三天,匆匆过目就归还了

原主，他在跋里也是这样写的：“时促不及详录，匆匆归赵。曾题四绝句以志眼福。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掷笔为之叹息不置。”郑振铎又赶到常熟，找到赵家后人，也没有得到确证。但他没有灰心，始终相信书不会亡佚，而是藏在某识家的手中。

现在，陈乃乾在电话里说书是从丁家散出来的。郑振铎断定很可能这就是他多年寻访的书。他立即托付陈乃乾将书买下，并说应该还有三十二册，一共六十四册才对。第二天他匆匆赶到来青阁书店，老板杨寿祺告诉他，的确有六十四册，三十二册在书商唐某处，大约千元即可购得，还有三十二册在古董商孙某处，大约要一千四五百到二千元。杨还说他已看到了书。郑振铎大喜过望，二千四五百就二千四五百，他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就将筹来的一千元钱交给杨，约定隔天先取唐某的半部书。谁知郑振铎去取书时，杨却说，唐某的那部分书已被孙某以九百元买走，如今书已合成完璧，孙某奇货可居。热望了十多年的书，垂得而复失之，这懊丧，这痛苦，使郑振铎失眠了。

郑振铎只得又去找陈乃乾。陈说书成完璧后，孙某待价而沽，非万金不售。郑振铎托陈对孙再三说，书不可卖给外国人和汉奸，他一定设法筹款。

郑振铎发了两份电报。一份给在香港的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一份给在汉口的教育部干事、词曲专家卢冀野。第二天香港的回电来了，说无法筹款，只好“望洋兴叹”。但卢冀野却回电说要郑振铎再去议价。柳暗花明，郑振铎立即找到陈乃乾。经过三天和孙某的折冲樽俎，最后双方以九千元成交。先付一千元定金，余款在20天内付清。5月30号郑振铎携一千元借款到孙某处交定金签契约。至此，他才看到梦寐以求的原书。他激动不已，一册又一册地翻阅着，不忍释手，不忍挪离自己的眼睛。在他看来这无价的元剧的宝库决不是区区金钱所能等值的，在这座宝库前，再多金钱也如同粪土，只要能看到这部书，即使自己承担契约上的一千元定金的损失，他也毫无怨尤。

战争时期汇款困难，汉口来电说，请郑振铎先设法筹款在期限内付出。结果郑向他任教的暨南大学代理校长程瑞霖借了九千元，终于在规定的期限内，交款取回了书。当他捧着这六十四册古书回家时，那兴奋如同战场上的将军收复了一座名城

凯旋而归。

这六十四册书是何等宏伟的一部戏剧总集，包含钞本、刻本的元明杂剧242种，其中元剧有29种是人间孤本，即使有些名目和臧选及其他选本相同，而其文字间也大有异同。29种杂剧有关汉卿的4种，王实甫的1种，还有郑德辉、高文秀、李文蔚、贾唐、白仁甫等剧作家的杂剧。这是多么惊人的发现。欧洲文艺复兴不过三四百年，仅仅发现一个莎士比亚的签名，全英国为之骚动，如果发现莎士比亚的一个从未见过的剧本呢。元代距今已六七百年，中国的关汉卿完全可以和英国的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一次就发现关汉卿的4个过去亡佚的剧本，这该是中国文学史上怎样的盛事呢。郑振铎在《劫中得书记》中说：“其实，我在劫中所见所得书，实实在在应该以这部《古今杂剧》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书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时而得到了二百多种从未见过的元明两代杂剧，这不该说是一种‘发现’么？肯定地，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的和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郑振铎为保存祖国的文化典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事实上他最担心的珍贵古籍落入敌手，差点成为事实。就在他为购书将情况告诉袁守和时，袁写信告诉了在北平的藏书家傅增湘，傅则将消息告诉了已沦为汉奸的董康。董是古文献专家，懂得这部书的价值，便请傅出面，接连几次写信、打电报给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说愿意以3千元价格将书买下来，后来得知书已由郑振铎出面替国家买下，傅才写信告诉张说，不是自己买，而是董康托他买的。可见如果没有郑振铎的努力，书的命运难以预料。

出版界元老张元济慧眼识宝，立即决定由商务印书馆择其精华，挑选一百余种杂剧，出版《孤本元明杂剧》，并聘请曲学名家王季烈校勘。张不顾自己年老体衰，亲为复核，与王“函牒往返，推敲入细”。王季烈在序中说：“……前后300余年间，海宁王君静安曲录所载，凡九百四十一种，……可谓盛矣。然王君当日亲见其书者，元曲选百种及零星刻本十数种而已。”近三十年，各地包

括日本)的藏书楼、图书馆“，皆印其所藏珍秘，以公之世”；然除去重复之本，总计种数不足二百，是则亡佚者仍十之七八矣。”这次出版“，计得往昔未见之本，百四十种。”而三百年沉埋之古籍，今得读之，吾辈眼福不浅矣。”故此书出而元明两代之杂剧，非特骤增一倍，且于雅俗两途，可窥其全，为研究两代草野风俗人情者所不可缺也。”1939年四卷本《孤本元明杂剧》问世。第二年，王季烈七十寿诞，张元济贺诗一首记述往事：

人间法曲几销歇，百卷元明尚有书。

点定千秋不朽业，吴兴而后是吴趋。

中国文学史上平添了100多种从来未见的元明杂剧。在战争动乱的年代里发现、保全了这么重要的一部古代文献，这功劳当首推郑振铎。

联名上书重庆政府组织 同志文献会”

如果说收购《元刊古今杂剧》是偶然的事，郑振铎组织同志文献会，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有计划、有组织的。

抢救大批古籍文献，个人财力毕竟有限，必须依靠教育部和国家的力量。郑振铎考虑到，收购《元刊古今杂剧》获得教育部的公款，陈立夫、朱家骅还是懂得古文献的价值的，现在国共合作时期，如果能联系一些有声望的知识分子，联名上书政府，也许能争取到专项拨款来抢救古籍。看来这是唯一可以与书商们对抗的办法了。郑振铎是个急性人，想定了主意，便立即去找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张风举先生等人一起商量。这几位都是声名卓著的学者，又是有影响的文献学家，他们也为江南珍本古籍的大量流失而深感痛心，喟叹个人无回天之力，听到郑振铎的建议都表示这“抢救”工作必须立即去做。由郑振铎执笔，他们五人联名给教育部和中英庚款（英国部分退还的庚子赔款）董事会发电报，要求拨经费抢救民族文献。1940年1月5日，他们几位又联名给政府拍去一份长电，恳切地陈述了江南珍贵文献面临流劫的紧急状况，如不迅速采取相应措施，后果不堪设想，强烈要求政府立即拨款予以抢救。然而就在前一天，何柏丞打电话通知郑振

铎，说敌伪方面把文化界救亡协会负责人14人列入绑架黑名单，劝郑振铎出去躲避。拍电报的同日，郑振铎在锦江茶室遇到周予同，慨然说：“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周予同说：“人生找结笔甚难，有好结笔倒也不坏。”

1月10日，何柏丞在暨南大学收到两份电报。一份是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打来的：“歌（即5日）电敬悉。关心文献，无任钦佩，现正遵嘱筹商进行。谨此奉复。”另一份是朱家骅和陈立夫联名签署的：“歌电奉悉。诸先生关心文献，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语重心长，钦佩无既。惟值此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到沪，尤属困难。如由沪上热心文化有力人士共同发起一会，筹募款项，先行搜访，以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当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谨此奉复，伫候明教。”郑振铎看了电报，喜忧参半。政府支持赞同他们的计划，固然可喜，但如果他们有能力筹募款项，还打电报到重庆做什么呢。政府都拿不出钱，他们几个穷教授能凑出多少钱呢。这又使郑振铎忧虑重重了。他们商量后，又给重庆打了回电，说明由他们筹款的困难，再三希望政府竭尽全力。

利用中央图书馆的100万元扩建设收购古籍

重庆方面也在积极想办法筹款。朱家骅想起中英庚款董事会曾拨给南京中央图书馆一百万元扩建设。未及开工，因战争爆发，中央图书馆迁移，这笔钱没有动。现在战争不知打到何年月，等到战争结束回南京建馆，货币贬值，这笔钱所剩无几。还不如先用这笔钱让郑振铎他们去收购图书，既得到了文献，又避免了贬值，岂不是两全之策。陈立夫也表示赞同，他们说服了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骢，并派蒋立即去上海和郑振铎他们联系。

1月13日，蒋复骢秘密抵沪。1月19日，在张元济家，郑振铎、张元济、张咏霓、何柏丞、张风举、叶恭绰和蒋复骢商定，推举张咏霓主持收购文献事，对外严格保密，只以他们私人或所供职的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涵芬楼名义购书。原则上以收购

藏书家的书为主。未售出的,尽量劝其不售。不能不售的,则收购之,绝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失海外。最后一致同意,从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任其从他们面前遗失,有好书,有值得保存的书,必须为国家收购到。他们还明确了分工:郑振铎和张凤举负责采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张咏霓和何柏丞负责保管经费。日夜焦虑的事总算有了眉目,郑振铎自然十分高兴,他心中明白,分工不分家,主要的工作还是要他来做。事实上张凤举不久去了内地,采访即由郑振铎一人负责。而且他是著名版本学家,和何柏丞、张咏霓一起参与图书鉴定也是无法推辞的。他随即起草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其中规定,凡购书每部在50元以上者,须全体同仁通过,重要的宋元版本及抄本,必须由同仁共作鉴定后才能决定收购与否。落实了章程和分工,郑振铎立即提出,玉海堂、群碧楼两家的文献,亟需早日收下。北来书商覬觎已久,如农历年内没有款到,只恐书商们捷足先登。郑振铎还极力主张,收书决不能拘于一格,决不能仅以罗致大藏书家之所藏为限,凡市上零星所见之书,只要是善本、孤本,有保存价值的,都要尽力收购。

玉海堂、群碧楼和江南著名藏书楼

1月21日,郑振铎就迫不及待地请他的朋友潘博山介绍到书商孙伯渊家看玉海堂藏书。为慎重起见,他甚至请了70多岁的张元济一起去孙家。经他俩鉴定,确认玉海堂藏200册元刻元印本都是真品善本。孙开价2万元。郑振铎托潘博山出面与孙几次磋商,孙将价减让到1万元。郑振铎转告张咏霓、何柏丞他们,三人表示价格可以同意,先付定洋,余款俟蒋复骢回渝汇款到时再付。2月3日,郑振铎和孙签约,先付3千元(从暨南大学经费中借支),余款半月内付清取书。

初战告捷,郑振铎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收购苏州邓邦述群碧楼藏书。群碧楼所藏古籍从质量上、数量上更胜玉海堂一筹。邓氏的藏书楼之所以取名为群碧楼,因为他收藏了两部极珍贵的宋版书:一是唐代李群玉撰《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二是唐代李中撰《碧云集》三卷。这两部书上都刻印有“临安府栅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之宅书籍铺”的牌记,陈氏是宋朝有名的刻书家,这两部

书确是宋版无疑。不仅如此,这两部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宋版,还因为它们都经历了明清两朝许多著名藏书家的收藏而尤为珍贵。书中钤有文徵明、安岐、黄丕烈、金俊明、徐乾学、张隽、季振宜、冯新之等人的收藏印记。尽管如此,郑振铎仍请张元济同他一起到孙伯渊处看群碧楼藏书。稍后几天,他在给张咏霓的信中说:“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苦到底,自不至有人疵议。盖我辈所购者,决不至浪费公款一丝一毫;书之好坏,价之高低,知者自必甚明了也!一方面固以节俭为主,同时亦应以得书为目的。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浪费,乱买,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几乎同时给张咏霓的另一封信中说:“为公家购书,确较私人不易。我为自己购书,如为我所喜者,每不吝重值;但为公家购书,则反议价至酷。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生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近虽忙迫,然也甘之如饴也。”

原来北方书商听说群碧楼藏书要出售,纷纷聚集苏州。上海书商孙伯渊赶去,与他们合资,约



上海租界的外国士兵和日本占领军在站岗

以4万5千至5万元价格买下藏书。郑振铎闻讯,急忙找到孙伯渊,反复与他商议,做工作,要他们以民族大义为根本,绝对不可将藏书分散,各取所需。最后以5万5千元从孙氏手中将群碧楼藏书悉数购下。郑振铎在给张咏霓信中仍按捺不住喜悦之情:“昨日下午,由孙贾送来群碧楼藏书(已运沪之一部分),……在此三千一百余册书中,佳本缤纷,应接不暇。”

北方书商南来,看重的是江南若干大藏书楼的珍本古籍。这几年中,江南藏书散出者,尚没有像玉海堂、群碧楼那样量多而质精的,而这两批书恰恰又都是被郑振铎他们出巨款收下的。书商们知道在经济能力上、购书魄力上都比不上郑振铎,也知道在江南一带,确切地说是在郑振铎这个又是行家、实力又足的大书商“面前,他们已经不会再得到什么了。因此,他们反倒向郑振铎走动起来,经常拿些很好的、很重要的古书,让郑振铎识货收买。郑振铎当然“见猎心喜”,见好就收。这一来,书商们来的更多了。郑振铎仅因收这些书和张咏霓、张元济、何柏丞诸先生往来的信札,叠起来就有一尺多高。郑振铎的时间全消耗在接待这些书商上面了。郑振铎深受黄丕烈(清代藏书家,字绍武,号荃圃,又号复翁,江苏吴县人,搜购宋本图书百余种,专藏一室,名为百宋一廛)收书方法的影响,黄在书商到的时候,即使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选购几部,不使书商失望,以后自会有惊奇的发见的,这是千金买马骨的意思。郑振铎对凡是找他的书商一律热情接待,有时来的没有铺子的揹包的书商,也一样招待。因此,书商只要有书,总是先拿来给郑振铎。郑振铎自己也说:“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和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

上海古籍散失的局面迅速改观了,各著名藏书楼散出的书悉数被郑振铎他们收去了。继玉海堂、群碧楼之后,他们又一举收购下了邓氏“风雨楼”藏书、张氏“蕴辉斋”藏书、海盐张氏藏书、陶氏“和涉园”藏书、南浔张氏“适园”藏书、刘氏“嘉业堂”藏书等等。尤其是嘉业堂藏书数量极大,精品也很多。但悉数买下,数量太大,没处存放,价格太高,付不出那么多钱。他们商量之后,由

郑振铎和徐森玉(著名版本学家,从重庆专程来沪)去嘉业堂挑选,他们耗费了好几天工夫从刘氏所藏庞大的藏书中挑选出1200多部明刊本,以25万元巨款收购下来。

南浔适园的藏书,亦几经商洽全部收购下来。这一批书,数量并不太多,只有1000余部,但精品极多,仅黄荃辅校跋过的书就在100种左右。

“文物的事问郑振铎好了”

上海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为安全计,郑振铎把“国家级”的珍本80多种,托徐森玉带到香港,再转运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到这批书后,曾开了一次展览会,轰动了整个山城。其余3200多部(30000余册)珍贵古籍也陆续从邮局寄到香港,由许地山先生负责收下,并打包装箱,准备运往美国度藏。不料未及运出,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这批书被日寇劫去。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驻日代表在日本帝国图书馆发现这批书,经交涉追回,计107箱。

在郑振铎为首的同志文献会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以中央图书馆的百万元扩建费收购了大量珍贵的文化典籍。其中珍贵的“善本”有4000种左右,已经抵得上当时北平图书馆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善本书库的总数了。现今台湾的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几乎全是由同志文献会抢救收购的。徐森玉在给蒋复骁的信中说,郑振铎他们“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郑振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为民族为国家抢救、收购散佚的珍贵古文献,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自己也说过:“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后来,黄炎培、褚辅成、冷、章伯钧、傅斯年和左舜生等六人去过一次延安,据说在一次座谈会上,黄炎培先生向周恩来副主席提出,南方文物多,应当如何保护处理。毛泽东主席在一旁立即回答说,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好了。郑振铎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这样说,是对他在上海孤岛时期抢救国家珍贵文献的高度评价!

历史会永远记载郑振铎的功绩。

(责任编辑 萧 徐)

二十世纪初的新疆留学潮

● 帕哈尔丁 编译

现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是中亚一座闻名中外的文化古城，其在20世纪初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经济、科技、文教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当时，这里原有的学校进行了扩建，并重建了不少大学，不仅满足了乌兹别克斯坦青少年的求学需求，也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留学机会及条件。为此，中亚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纷纷去塔什干求学，在这出国潮中，中国新疆也有一批求学若渴的学生前往塔什干的高等院校进修、深造，新疆学生去塔什干留学在盛世才统治时期，达到了高潮。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赢得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促进新疆科学文化的发展，培养为其统治卖力的各类人才，并以此作为自己与苏联睦邻友好的具体行动，也选派了几批学生去苏联学习。

今天，我们且不论当年盛世才的用意如何，但就这件事本身来说，可谓轰动一时，也可以说是新疆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一大批有志青年相继归来为新疆各项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世才政府根据与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从1934年11月至1936年11月间，向苏联乌兹别克斯坦共选送了三批留学人员，留学生源基本上来自于新疆省立师范学校、省立中学的学生、工作人员及部分社会青年，采用自由报名、文化课考试（考试题目以初中教材试题为主）及体检等选拔方式。

盛世才与苏联政府的协定规定，每年选派100名学生去苏留学，并对出国学生民族成分的比例也做了具体规定，如：使用汉语的学生（汉、满、锡伯族）占40%，维族学生占40%，哈萨克、柯尔克孜学生、蒙古族学生占10%。实

际上去塔留学的汉族学生是84名，维族学生46名，然后是回族16名，哈、柯族30名，乌兹别克、塔吉克族4名，蒙古族12名，塔塔尔族5名，总共299名。有的材料统计为307名，这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每一批学生都有政府指定专人，负责送到塔什干。第一批学生由代理领事张英桓（音译）负责，第二、三批学生是由当时的教育厅秘书左南铨（音译）负责。

他们行进的路线是：学生们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坐专车出发经塔城口岸出境，到达苏联境内的边防站。然后由校方派来的专车送到西伯利亚火车站，然后在塔什干火车站下车。其中穆罕穆德·莫依提等学生是从喀什选派的，他们先是骑马经“阿日凯西塔木”路去“安间”（均是地方），再坐火车至塔什干。

生活方面，苏联政府为每个学生发放购买服饰的费用是2000卢布，每位学生每月还发放生活费100卢布，每年暑假学校还组织学生去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观光旅游，还去农牧草场考察学习，所花费用都由苏方提供，以后从借贷给新疆政府的费用中结算。



塔什干中亚大学一景



1935年在中亚大学留学的部分学生。后排左二为赛福鼎·艾则孜

中亚大学的学历为二年制，每周上课36学时，所授课程是教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法、国际制度、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虽然学制短，但一般大学所学的课程，基本上都开设了。

这些学生学成归国的时间是：第一批学生1936年，第二批1937年，第三批学生中有30余人被盛世才冠以莫须有的“叛徒子女”的帽子提前于1937年送回国内，其他学生于1938年集体回归。

学成归来后，他们还要参加短期培训班，经过政治教育以后，方由政府统一安排工作。大部分学生分配到高等院校、中学、报社、银行、教育、文化促进会、司法、外事、公安等部门工作。已故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赛福鼎·艾则孜同志，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先是分到塔城报社，后因受到盛世才政府迫害，被迫出走伊犁参加革命。开始他们都享受部门副职待遇，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很好作用，其中较大多数都信奉马克思主义，热爱祖国和各族人民。他们是一批充满希望、精力充沛、勇于探索的有志青年。回到国内后，他们竭尽全力投身工作，受到各族人民的好评和尊重。他们被亲切地称为“塔什干人”，意为曾在塔什干读过书的人。在盛世才统治时期，他们与其做了不屈不挠的抗争，他们也因此成为盛的眼中钉。

苏德战争爆发后，盛剥下了伪装与苏联和中

共断绝关系，彻底投入蒋介石政权怀抱。“塔什干人”中的大多数被盛世才逮捕入狱，有些在狱中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有的被折磨致死。1944年秋季，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部分的三区革命”爆发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积极响应，争先投入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他们不仅在唤起民族觉醒方面成为先锋队，还成为英勇善战的战士和优秀的指挥员。他们出生入死，英勇战斗，建立了卓著战功。赛福鼎就曾担任过三区民族军团长、教育厅厅长、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兼省教育厅厅长等职。1946年6月6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国民党新疆政府和平代表团与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团经过两个阶段的谈判，最终签订了和平条款十一条。此后，“塔什干人”中的一部分参与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及新疆各地的工作，并发挥了各自的作用。1947年十一条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方面撕毁后，新疆省联合政府宣告破裂。这期间，塔什干留学生中的一大批人员随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领导人一起赴伊宁，他们在解放战争年代，组织秘密进步团体和参加武装游击队，与敌军浴血奋战，为革命胜利洒下了一腔热血，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积极响应新疆的和平解放，衷心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

解放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为区内外各个部门的领导和专业骨干力量，为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的被致残致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重见光明，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不实之词被推翻，并给他们恢复了名誉、工作、党籍。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些留学生中也有几个人在盛世才的淫威、拉拢和欺骗下为反动政府卖过力，但最终他们也没能逃脱盛世才残忍的毒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中的幸存者，怀着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无限忠诚，热诚地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政策。（责任编辑 李晨）

“我从来不悲观”

——夏衍同志逝世十周年祭

● 袁 鹰

夏衍同志 1995年2月驾鹤西去,岁月不居,忽忽已是十年。哲人远行,他的崇高风范,嘉言懿行,长留人间。去年以来,受浙江文艺出版社委托,我参加了由周巍峙、王蒙同志主持的《夏衍全集》编委会,同姜德明同志一起负责全集中文学、新闻两部分的编辑工作,得以重温夏公大量著作,从盛夏至寒冬,沉浸在这位世纪老人、文学巨匠的手泽中。夏公一生著作等身,范围很广,涉及文学、戏剧、电影、社会科学、新闻和翻译,文学范围内除诗词外各种写作形式他都擅长。过去我读的比较多的,主要是话剧剧本、电影文学剧本,报告文学和杂文随笔,而属于新闻类的政治、时评、通讯和匕首式的小杂感,虽也有不少曾经读过和编过,但也有相当多数量是从未读到或只是闻名而未得一见的。翻阅之际,仿佛又一次次地亲近老人温文儒雅、坦诚亲切的音容笑貌,又一次次地触摸他的心灵,感受他真诚坦率的忧国忧民、关注国家民族前途的大海般情怀。

十几年中写了上百万字的时评、政论,在我国现代文坛上能有几人?

夏公生前一再说自己一生最值得怀念的是从事报纸工作的十二年,即自1937年起连续在上海、广州、桂林版的《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直到1949年离香港北上解放区的十二年。他在《懒寻旧梦录》中说:“这十二年的记者生涯,说来是十分坎坷的……但我觉得这十二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

八年抗日战争加上四年解放战争的十二年,

正是中华民族从沉沦到振兴,从屈辱苦难到扬眉吐气的十二年,作为从“五四”大潮中走出来的革命志士,作为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处于危急时期毅然投身中国共产党队伍的老党员,这十二年正是他用笔直接从事战斗、椎心泣血、经受艰辛严峻考验锻炼的日日夜夜。他的“记者生涯”,并不单纯是负责采访报道的新闻记者,实际上是总编辑、夜班编辑、记者、评论员、副刊主编等多种职务集于一身,无日无夜伏案挥笔,从社论到时评,从通讯到杂文,从三四千字的述评到三言两语式的一二百字的短文(抗战后期的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上,他还创造一种只有几十个字的三言两句式小杂感,署名司马牛,当时读者称之为“司马牛杂感”)。只要报纸版面需要,战斗宣传需要,提笔就写,一挥而就,倚马可待,署许许多多不同的笔名,或者根本不署名字。篇篇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反应迅疾,观点鲜明,立论尖锐,文风犀利。举一个小例: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夏公奉命去上海将《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迅速出版,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党政军官员对沦陷区大搞“劫收”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他写了一篇短稿:“(一)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地下钻出来的。(二)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一种是封条。”寥寥五十多字,连署名都没有,立时在上海人嘴上流传,表达他们对那批发“劫收”财者的愤怒。

1945年冬天,我进入由姚苏凤、冯亦代两位先生主持的《世界晨报》,开始五十余年的新闻生涯。当编辑不久,就有幸每天在第一版发一篇夏公署名“东风”的司马牛式时评《蚯蚓眼》。这



夏衍(右)与周扬

个小专栏,成为报纸每天吸引读者的亮点。例如1946年3月间,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座机在南京附近撞山失事,机毁人亡,尽管“中央社”没有正式公布消息,但是社会上很快就广为流传,人们奔走相告,喜形于色,有些天真的人甚至高兴地以为中国特务统治也许就此垮台。夏公立即在《蚯蚓眼》写了一条:“戴笠将军乘飞机失事的消息,成了全市议论的中心。中国人永远把人看得太重,把制度看得太轻。”短短两句话,就给读者送一付清醒剂。

夏公对时事的敏感和责任心,决不止从事新闻工作的十二年,几乎是终其一生的。上海解放初期,他身兼多职,任务繁重,但是百忙中仍然每天抽暇在《新民晚报》的《灯下闲话》中写一篇几百字的时评,针对当时出现的各种各样社会现象和思潮,及时指点、引导、匡正。一年间竟写了二百多篇。其后十多年,也常常用杂文及时抨击种种时弊和不正之风,有的文章因而成了“文革”中的罪名。《夏衍全集》新闻部分两卷,共有一百万字之多,由于年代太久,有的报刊难寻,或者有的笔名无法查证,以致还有不少遗漏的。夏公直到晚年,尽管在十年动乱中受到凶恶摧残导致目损肢折,他依然尽可能保持几十年来每天总

要写几百字的习惯。廖沫沙同志为《夏衍杂文随笔集》所作的代序中说:“单凭写作上的这种勤劳和数量的如此巨大,我们在现代中国文坛上能找到有几人?在世界文坛上又能找到多少?”

我看恐怕是没有的,至少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他一直戚戚于怀的是人口问题、教育问题和法治问题,说这是建国以来的三大失误。

更使我们许多人感到敬佩不已的是这位历经风霜劫难的老人,进入耄耋之年,仍然保持着几十年如一日的战斗风格,他那清晰敏捷的思维,深刻睿智的见解,忧国忧民的情怀,并未因年龄稍减,而是有增无已,特别是生命的最后十年间,还常常看到听到他那些闪烁着思想光芒的言辞。1986年1月,他对《望》杂志记者忧心忡忡地谈到:“这几年我常常想到,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是人口问题,就是十亿人口和近八亿农村人口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许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可是拿十亿人口这个数字来一摊,那就不是‘前列’而是倒数第几位了。他说:“人口是我们前进道路上一个最大最大的包袱,也可以说是我们解放以来三十六年间的一个最大的失误。……”“别的错误可以纠正,别的空白可以填补,而十亿人口则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最沉重的包袱。”“人口一增长,收入增加,就要满足他们衣食住行的需要,自然也就增加政府的困难。要盖房子就需要砖瓦、水泥和木材,市场供应不足,农民自然就有意见。他说:“大家都应该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有些人把目前的供应紧张和物价上涨片面地归咎于政府,而不想一想人口这个过去的历史性失误,我认为这是不全面、不公允的。”

两年以后,他对《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再次谈到建国以来的失误问题。这次他说了三个,除了人口以外,又着重提到“不重视教育,至今还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文盲和半文盲,而且还不断有新出现”。另一个是没有法治,“无法无天,造反有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连民法刑法都没有,除了《宪法》、《婚姻法》外,都是暂行条

例。所以十年动乱中,国家主席、中央委员都可以随便抓走,可以私设公堂,可以批斗打骂,甚至可以把国家主席整死”。他特别强调教育不发达,民主也难搞。孙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权思想中,设计了一个训政阶段,也就是看到了人民素质太低这个问题,完全自发地搞“民主”是不行的。在那种素质的基础上放任自发,只能搞个“文化大革命”出来。他语重心长地说:“像‘文革’这样的动乱,西方国家是搞不起来的。这么多年轻人跟着起哄,个人迷信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条,关键是大家都没有法律意识,什么法都不懂。”他还向记者回忆一段“文革”中的往事:1966年12月4日,他与彭真同志同时被“造反派”抓起来,第二天上午彭真问了一句:“唉,同志们,你们究竟打算怎么样?”啪!立刻就遭到一记耳光。这哪有一点法治可言?文化素质差,没有法律观念,没有起码的民主意识,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但是经济却不会搞上去。

夏公批评多年来流行的一种“左”的观念:“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讲人权的,凡是带‘人’字的都犯忌,如人权、人性、人格、人道等都不行。讲人道主义就挨批。这些都是民主最起码的东西啊!现在连人权也不敢讲,把自由、平等、博爱都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批……现在提出的

生产力发展为标准,但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人,长久以来却是我们最忽视的,许多弊端便由此产生。”

这真是如夏公对记者讲的:“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他认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实际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夏公说过:“十年‘文革’使他有机会回想过去,重新认识自己。被囚秦城监狱,获得准许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恩典’。可以不受干扰,边读边想,边联系中国实际。重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感受就很不一样了,这本书开始照亮我的心,从辩证法的认识论来回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才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人,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者的对立面!这就是公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

十年炼狱,有如烈火中凤凰得到新生,大彻大悟,把什么都看透了。

1989年4月“五四”七十周年前夕,夏公应《经济学周报》编辑之约,同一位青年学者进



1990年,朋友们同贺夏公(前排左二)90华诞(后排左一为袁鹰)

行一次很有意义的严肃的对话,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七十年来的艰难历程。夏公回忆上世纪初知识界的种种思潮:“那时的主义很多,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是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又有几种:有欧洲的,有日本的新村主义。”他说:“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不是马克思主义,实际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十月革命后三年的1920年根据英文翻译的,当时懂俄文的人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书,大多是从英文、日文翻译的,也都是三十年代我们这些人翻译的,真正马恩的书没有翻译过来。《资本论》五十年代才翻译过来。

这里,夏公说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就像把儒家只归孔子一家一样,我们学的马克思主义实际是列宁和斯大林主义,我们搞革命,学的是列宁的东西。我们许多共产党人当年引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就是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说到“五四”,这位十九岁就在家乡杭州参加办刊物鼓吹新文化思潮的老战士,禁不住感慨系之。他再一次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弘扬的实质是人的解放,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他说:“今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那时候就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五四”一方面是爱国主义运动,一方面是人的解放。后来我们把这些口号都还给资产阶级了。共产主义者还是要讲平等,要讲自由,要讲博爱。人的解放、文化的解放,实际上提倡的正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巴金、曹禺的作品反对封建主义,就是要求人自身的解放,要求自由平等,反对礼教的束缚。他们的作品抨击包办婚姻,提倡人道主义精神。讲到此处,夏公按捺不住满腔愤慨:“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周扬被整成什么样子!”说这话的时候,他那位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为革命文艺事业与他并肩战斗的老战友周扬,已在北京医院几乎不省人事地卧病三年,三个月之后含冤愤憾悒悒而终。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几次到他北京西单六部口寓所去拜访过。夏公已到耄耋高龄,身体渐不如昔,说话声音也轻了,但是思想清晰如故。谈到官场腐败案例有增无已,有些

地方民不聊生,一些地方官员一面花巨款盖楼堂馆所、大吃大喝,一面发不出民办教师工资等种种现象,他仍然止不住蹙眉长叹,忧心如捣。有时谈到有些地方的农民富起来以后,首先学地主老财的样子,忙于造坟墓,做道场,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一掷千金毫无吝啬,他认为这仍旧是愚昧的意识和心理在作祟,即使在他的家乡浙江这类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也难以避免。谈到此处,这位一生以笔作战的老人,也只得掷报叹息,想再写点杂文和时评加以抨击已力不从心了。不过他并不悲观,有一次对我说过一句语重心长的话:“关键在民心,老百姓都看着你,光唱高调说空话是不行的,老百姓见得多了!”

一个与世纪同龄、经历过那么多风霜雨雪、辛酸苦辣的人,又受“文革”炼狱的洗礼,成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他预见国家民族的前途必定光辉灿烂,坚信人民的力量必定会推动历史的进程。他晚年就一再宣称: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从来不悲观!”

这可算是老人的遗言,十年以后,仍在我们面前熠熠发光,继续给我们许多启迪、警示和激励,告诫我们不管可能见到突然蔽日的阴云,不管可能碰到无端横阻的挡路石,也不管前行路上可能荆棘丛生,暗潮涌动,都不要悲观,永远相信党,相信人民。正是:“哲人日以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文天祥《正气歌》)

(责任编辑 叶方)

敬告读者

因邮寄和装订成本增加《炎黄春秋》合订本的价格作相应调整,自2004年12月1日起调整的价格为:精装本(1999年—2004年)每年一册,每册75元;简装本(1999年—2004年)每年一册,每册70元。2004年合订本于2005年3月制成,价格同上。

敬请读者谅解。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坚持独立思考的胡克实

● 赖诗逸

2004年6月下旬,北京来电话,胡克实同志于6月27日深夜不幸逝世。接到这个噩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月的中旬,我们到北京时,还到医院里探望过克实同志。当时,他的病情已趋于稳定。一见面,他立刻叫出我的名字。他坐上轮椅,我推着他在医院的走廊里转了几圈,他很高兴。怎么过了20多天,就突然走了呢?但是,这个电话是克实同志的夫人于今同志打来的,我不能接受这个悲痛的事实。

接下来的日子,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克实同志的身影,想起与他有关的一些往事……

(一)

1957年,我到北京参加团的三大。克实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中,主动约见我,并做了一次重要谈话。讲的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除了强调毛主席提出此问题的重大理论意义外,他主要谈了以下内容:

一是说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意义。他说,积极主动地处理好这个问题,可以增强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家齐心协力,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处理得不好,则会严重影响群众的积极性。如果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就会人为地制造紧张的气氛,并在思想上、政治上遗留下许多问题。

二是指出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最常见的是群众与领导的矛盾。也可以说,这是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一对矛盾,在所有单位都存在,也与一切人都有关系。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使领导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处于主动的地位。

三是共青团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如何进行工作。他指出,发生人民内部矛盾时,一般是由党和政府出面来处理,共青团处于协助的地位。但是,团组织不能因此而放松自己的责任。相反地,我们应该采取主动的、积极的态度。首先应该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矛盾发生的原因,主动向党委汇报。在党组织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案后,共青团应该积极贯彻。特别要注意,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共青团要把加强思想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四是团的干部应该成为青年的知心朋友,绝对不能成为“青年官”。他指出,这是团中央历来强调的团干守则,特别是在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以后,更要注意这一点。只有成为青年的知心朋友,他们才会向团干部掏出心里话,使团干部及时了解青年的思想动态。如果变成一个“青年官”,就会严重脱离青年群众,无法妥善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到北京开会前,我虽然听了毛主席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重要讲话的传达,但还没有认真学习。克实同志的谈话,等于是给我上了一次政治课,使我大大地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可惜,毛主席不久就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真正付诸实践。但经过这一波折,我并没有忘掉克实同志的那一次谈话,而是想得更多,记得更牢,特别是不能当“青年官”这一点,更起到“警钟长鸣”的作用。

团的三大结束后,我向克实同志辞别时,他还以强调的语气告诉我,要注意阅读报上刊登的毛主席接见团代会全体代表时所作的指示。特别是其中最后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他提醒我:“这句话是公开



胡克实与胡耀邦（1972年）

发表时新加上去的。”

我回想了一下，5月25日毛主席的现场讲话中，确实没有这句话。当时，毛主席在号召代表们“坚定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后，就结束了讲话。克实同志没有说明，为什么在发表新闻稿时要加上这句话。当时，我只是认为，这是为了加重前一句话的语气。实际上，其含义要深刻得多。紧接着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表明：毛主席是用这句话来向党、团员正式打个招呼，也可以说公开发出要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动员令。在那场大风大浪的斗争中，我常常想起克实同志在5月底的叮嘱，并从内心里感谢他在政治上对我的关怀。

（二）

1966年4月，我到北京列席参加团的九届三次全会。在此之前，耀邦同志已经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仍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从1964年11月起，克实同志就全面主持团中央的工作。所以，这次全会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揭开序幕的。

会议开始后，有一段时间，克实同志没有参加小组讨论，听说他是去参加党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我很想了解中央有什么新的指示，一个晚上，我敲响了他住的宾馆住房的门。

当我问起中央会议有什么新的指示精神时，

克实同志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次中央会议，不是研究工作问题；会上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揭发批判。接着，他简要地谈了一下会议的情况。我记得的是：会议批判罗瑞卿同志组织军事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折中主义；还批判罗反对毛泽东思想等。对罗的揭发，是1965年12月在很小范围内开始的。1966年3月上旬，在北京正式进行了揭发批判。3月中旬，罗瑞卿同志做了检查，但没有获得通过。会议要求罗再做检讨。3月18日，罗瑞卿同志从住所的三楼跳下来，跌断了腿。以后，会议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吸收了中央各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人参加。克实同志是在这一阶段参加的。听说批判了罗瑞卿同志，我觉得很突然，特别是听到罗瑞卿同志跳楼的消息，我更感到震惊。

在沉默了片刻之后，克实同志又谈了对自杀问题的看法。他说，从过去的情况来看，领导干部的自杀，往往是在政治运动的紧张阶段出现的。有人觉得自己的问题被看得过分严重，或者认为别人的批判调子太高，还有人感到揭发的问题不大符合事实。总之，是认为自己受到了委屈，结果就出现了这种不寻常的做法。

由于克实同志强调，这个问题还没有正式下达，所以，我只是倾听，但心中留下了很多疑点。在这次会议的后期，克实同志还同我谈了耀邦同志在陕西的情况。

我先反映了一个消息：会议期间，有人在闲谈时说，耀邦同志在陕西工作不大顺利，还受到批判。我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一提问，引起克实同志讲了一段很长的话。

克实同志说，耀邦同志在陕西，确实受到了批判，精神和身体上都受到严重的损害，最后被迫离开西安，到北戴河疗养。他到陕西后，经过深入的调查，了解到四清运动出现了不少严重的问题。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他提出，暂时停止捕人；对有错误的党员和干部，暂时停止开除党籍和公职，留待运动后再处理，面上的夺权也暂时停止，待重新部署后再采取行动。他指出，惩办是个必不可少的方法，但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改造人、改造社会。他还提出，放宽政策，搞

活经济”的方针。这些意见,引起了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满。《二十三条》下达后,就给耀邦同志扣上了“大刮翻案风”的帽子,不断地进行批判。有一次,耀邦同志在陕西省贫下中农代表会上做检讨时,突然大脑发病。医生说有生命危险,会议才不得不暂时停止,把耀邦同志送往医院抢救。就是这样,在病情稍为好转后,他仍要躺在床上写检讨。有人做了个统计,耀邦同志在陕西任职200天,实际上干工作的时间只有100天,而无法履行职务和接受批判也有100天。1965年6月,叶剑英等同志到西安。叶帅说,耀邦,你在西安谈不清问题,回北京谈吧。耀邦同志提出:“不叫我走啊!”叶帅说:“跟我一道走。”叶帅把耀邦同志拉上飞机,回到北京。当时,耀邦同志已被免去西北局和陕西省的职务。

克实同志的一席话,使我了解到耀邦同志到陕西后的处境。听后心情十分沉重。我想起1965年底耀邦同志从福建到广东的情况。当时我到汕头迎接他,并陪他到肇庆休息。一路上,他只是参观,很少发表意见,与过去他谈笑风生的作风大不相同。看来,这与他在陕西受到错误的批判可能有关。

总之,克实同志在1966年4月的两次谈话,内容是十分重要的。对我来说,这是头一次直接听到领导同志讲述这一类政治事件。在谈话中,克实同志对罗瑞卿同志被批判的问题,没有明确讲出自己的意见。但他曾自言自语地说:“军事大比武进行集中表演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出席观看了呀!”这表明,他对批判罗瑞卿同志组织军事大比武一事是有某种怀疑的。在谈到自杀问题时,他实际上流露出同情罗瑞卿同志的想法。

至于批判耀邦同志,我从克实同志的谈话中看得很清楚,他是根本不同意的,特别是讲到那种过火的批判时,他的脸上充满愤慨之情。这表明,在“左”的倾向已占上风时,克实同志仍然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一边;而对于党内斗争,他是反对“左”的做法,维护正确原则的。

(三)

1974年,我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这是“文革”爆发后我首次进京。所以,在会议有空时,我

就赶快去拜访克实同志。当时,他已被分配到国家地震局。

谈话一开始,我先做了检讨。这要从我的一次发言讲起。

1972年我恢复工作后,曾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提到,1953年的团代会没有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团中央的一个“严重错误”。散会后,原来在团中央工作的一位同志对我说:“这个说法不对。当时不提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党中央决定的。”为此,我感到很惭愧。

克实同志听了我的检讨后说:“确实不应该这样讲。”但他没有做更多的指责,而是对我谈起当时没提“毛泽东思想”的由来。

克实同志说,“文革”中批斗耀邦同志时,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被揪来陪斗的李昌同志申辩,最初起草的团章草案中,曾经写上了“毛泽东思想”。后来陈伯达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为了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消除猜疑,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所以,李昌同志就根据这意见,把团章草案中清清楚楚写上的“毛泽东思想”划去了。1954年,中宣部专门发出一个通知,“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这说明,李昌同志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本文作者为胡克实推轮椅

最后,克实同志说,团的二大文件中虽然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仍然强调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怎么是一个“错误”呢!

听了克实同志的话,我恍然大悟,插上了一句:我看到不少大批判的文章,都把解放后有一段时间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当作一个大问题,谁知道竟是这么一回事。他接过我的话题,又发表长篇的议论。

克实同志说,对报刊上的批判文章,要注意阅读,但又要认真分析,独立思考,不要随风倒。过去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章,现在看来,有的就说过了头。接着,他着重谈了对批林批孔运动中一些批判文章的看法。他提到《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说“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就是‘克己复礼’。”他认为,这不符合事实,恐怕是另有所指。对于《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克实同志指出,柳下跖与孔老二生不同时,怎么能“当面痛骂”呢?还有一篇《从〈乡党篇〉看孔老二》。克实同志说,这篇文章在描写孔老二拜见国君时,竟出现“端起胳膊”四个字。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而大家都知道的是:周总理因为跌伤了手,没有彻底治好,常常“端起胳膊”。这不是借批孔之名,影射周总理吗?克实同志又说,最突出的是《红旗》杂志上刊登的《孔丘其人》。历史资料明明写着,孔丘在世时,鲁国根本没有设立“宰相”的官职。但这篇文章竟把孔丘加封为“宰相”。这是最明显的影射周总理。

会议后期,我还去见了克实同志一面。因为,我去拜访耀邦同志之前,有同志曾告诉我,耀邦同志还没有做结论。所以,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询问克实同志,他详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所谈的内容主要是:

“文革”初期,团中央已被定性为“修透了”的单位,耀邦同志受到了长期的批斗。1968年10月,他被中央临时“解放”,出席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接着,又参加了党的九大。在九大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初步名单上,原来有胡耀邦的名字。据说他并表示自己的错误严重,思想认识一时还上不去,建议不要作为中委的候选人。后来才换了别的同志。

1969年,耀邦同志和团中央的干部一起下放到黄湖干校。在干校,他曾做过检查,承认团的工作在十七年中的某个时期或某一问题上是有错误

的。但他认为,总的说,十七年是红线,不是黑线。他从思想上进行了检查,承认自己在解放后对毛主席有过“五次动摇”,即是对“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都有过怀疑。听了他的检讨,不少同志都感动得流泪。但驻团中央机关的军代表却很不满意。

在对胡耀邦定性的问题上,耀邦同志与军代表曾经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耀邦同志不承认是“三反分子”,也不承认是“走资派”。有一次,军代表提出责问:“文化大革命初期,你已承认是走资派,为什么现在又不承认?”耀邦同志答:“当时,我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如果我不承认是走资派,对其他书记压力太大。现在,我看清楚了,我根本不是走资派。”军代表拍着桌子,说他“翻案”,并要他在定性为“三反分子”的结论上签字,他拒绝了。最后,耀邦同志对军代表说:“你把你们对我的结论报到中央去,我在结论后面写上我的意见,请中央来决定。”军代表无法压服他,只好这样办。周总理看到送来的报告,立即决定把他调回北京休养。1971年10月,耀邦同志离开了干校。但在1972年秋军代表宣布“解放”团中央书记时,仍然没有耀邦同志的名字。

克实同志最后表示:“我相信中央会给耀邦同志做出符合事实的结论。他想继续干革命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克实同志同我进行上述两次谈话时,江青之流还在政治舞台上横行霸道。从他的谈话中,我体会到,他对耀邦同志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是深表同情的。但对自己被批斗的问题,却一点也没有提到。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些文章借批孔之名,影射敬爱的周总理,他已经觉察到,并持不同意的态度。这说明,在复杂的斗争中,他的政治嗅觉很灵敏,而且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

回想起我与克实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回想起他对我谈话的情景,我仿佛又看到他那慈祥、和蔼的脸孔,又听到他那娓娓动人的声音。但是,要真正看到勤劳工作时的克实同志,已经根本不可能,就是让他再坐在轮椅里,我推着轮椅转圈,也已经办不到了。我只能说:克实同志,请您好好安息吧!

(责任编辑 李晨)

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李新

● 魏久明

去年2月5日,正是大地迎春之际,86岁(1918—2004年)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原副主任李新同志,伴随春风西行了。他是中央党史研究室自1980年建室以来,年过80岁的、担任过室主任的胡乔木(1912—1992年,80岁)、胡绳(1918—2000年,82岁),担任过副主任的廖盖隆(1918—2001年,83岁)和谢筱(1916—1999年,82岁)当中,最后一位离开我们的老同志。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党在新时期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开拓者。他们有关中共党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和他们主编的重要史学著作,为研究和编写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做了奠基工作。

他是个坚毅自信的人

在这几位老主任中,李新同志的身体是比较差的一个。1988年,他得过一场大病。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单。医生根据他的病情,确定非要动手术不可,否则,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微微闭着眼睛,呼吸短促,身体十分虚弱,显示生命垂危。但是,他不听医生、家属和机关同志的多次劝说,坚持不肯动手术。他微弱的声音中带着坚定的口气说:“我了解我的病情,我相信不动手术也能把病治好。医生说:你要相信科学。李新回答说:科学要实事求是。虽然大家都为他担心,但都了解他坚毅和自信的性格,他决不会在生命的问题上随便作出抉择。他忍受着病痛,慢慢服用中药治疗和调理,奇迹般地恢复了身体健康。连医生都称赞:李新的这种精神了不起。后来,他谈起“为什么冒这样大的风险”时,他说:“如果我动了手术,保住了性命,但要少活几年;不动手术,痛苦一点,可以多活几年,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随后,他孜孜不息地继续编撰未完成的史书,并抽出时间写回忆录。近十多年来,他几次患病,也接到过病危通知单,但他都跨越了死亡线。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李新的主持下,先后编撰出版的有关民主革命时期的通史、革命史、

民国史,以及相关的资料丛稿、大事记、人物传等,有数百万字。对李新在史学上的成就,国内外都有很好的评价。

1972年,遵照周总理指示和国务院安排,由李新组建民国史研究组(后改为研究室),研究和编撰中华民国史。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这是为国民党“唱赞歌”。后来还有人攻击他编撰的通史没有坚持“红线”,是“白线”、“黑线”挂帅等等。本来,研究和编撰民国史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历史是不断延续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一个发展。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作为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史学工作部门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学习、研究中国的全部历史,更主要的是研究和撰写中国近现代史,包括中华民国这段历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李新对此据理力争。他说:“我们研究、编撰1919至1949年这段历史,能不写北洋军阀吗?能不写蒋介石吗?能不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汉奸卖国贼的行径吗?这些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历史,如果不写,不敢写,能说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问题是如何写嘛!只要观点正确,坚持写历史的真实事实,就是贯彻了红线。他坚决顶住了所谓要停止研究、不便编写民国史,以及不能如实地写民国历史的意见。他说:“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的历史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国民党及民国政府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对于我们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有好处的。经过三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李新主编出版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后来陆续编撰出版了《中华民国史》十余卷《中华民国人物传》十余卷《中华民国大事记》三十九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获得国内外史学界的好评。听说,国民党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得知李新编撰出版《中华民国史》后,感到“惭愧”,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中华民国史》写出来,估计也很难写出来。

李新同志说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人”,是“历史工作者”,他一生主张“论从史出”,要写真史,写信史。虽然

他在史学研究的道路上几经挫折,但是他想干的事业,都已基本完成了。

由爱国走上革命的道路

李新同志是我的前辈,也是知心的朋友。在抗日战争中,他做过青年工作,担任过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青委书记,在延安,他和胡乔木同志一起办过《中国青年》杂志。我也长期从事过青年工作,也办过《中国青年》杂志。因此,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接近和交流。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十多年间,我们成了忘年之交。李新同志平易近人,热情好客。他有个“清谈家”的戏称,很喜欢和他人交谈。我们常在一起谈工作,谈历史,谈时事及其它感兴趣的问题。有时道别时,他总是说今天我们没有谈完,下次来再谈,并嘱,有空就来。他不仅学识渊博,见多识广,而且胸怀坦荡,谈论精辟,听了受益匪浅。

我敬佩李新同志不光是他的为人,他献身党的事业的革命精神,他的科学严谨、求真务实和敢于创见的治学态度,他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和安于清贫的作风,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李新和一切正直的史学家一样,是一位虔诚的爱国者,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李新1918年出生于四川荣昌县,家境贫寒,幼年丧父,兄长以打工的微薄收入为他提供读书学费。他从小聪慧,学习成绩优良。他对我说过,对于生长在山河破碎、年荒时乱年代的人来说,九一八事变对他有着刻骨铭心的影响。

今年是中国人民全民抗战胜利60周年,李新等一批革命青年成长的经历,反映了中国人民从觉醒到奋起斗争的历史。

1931年1月春,李新进入初中学习。9月19日这一天,他在学校报栏中看到报上登载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的消息,他说:“当时我热血沸腾了,立即跑到学校操场和同学们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第二天我们就结队上街开展抗日宣传了。”由于他办事积极,待人热忱,有演说口才,喜欢唱歌,又会吹奏笛箫,很快就成为同学中爱国抗日宣传活动的骨干分子。他组织的学生歌唱队和话剧、川剧队,进行抗日宣传,受到广泛的欢迎。他说:“这些往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现在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唱到、演到中国屡受帝国主义欺侮,人民备受苦难的时候,演员和群众泣不成声;当唱到、演到我们誓死不做亡国奴,打倒帝国主义的时候,台上台下

振臂高呼口号,连成一片。这些情景是永远忘不了的。”这年的11月,他和同学们促进成立了荣昌县学生抗日救国会。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件,事先日寇曾向上海工人工义勇军进行挑衅,这件事激起了荣昌县声援的热潮。李新的大哥李忠恒,决心参加荣昌“工人援沪义勇军”。虽然他大哥是家里的顶梁柱,但他母亲深明大义,好男当报国,她对儿子说:“我们都有两只手,饿不死,家里你用不着担心。”此事对年仅14岁的李新激励很大,当时他写了一首豪情满怀的长诗和他大哥道别。诗意是:“吁嗟乎!男儿眶中亦有泪,有泪不当别时挥;念我中华五千年,而今乃复遭危急;伤心目击山河碎,壮士安能不奋起;万里出征送君去,不扫倭奴誓不归!”

1934年,他考进重庆川东师范学校读书时,听说他大哥因反对“剿共”,秘密策划离队上前线抗日,而被国民党军队杀害,十分悲痛。国仇家恨,更加激起李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决心,他说:我一定要实现哥哥的志愿,要为战胜日寇而死!”他在川东师范学校,联络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众志学会”,担任会长,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通过创办《众志周刊》,举办讲演会、演唱会宣传爱国抗日的道理。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李新等重庆一批进步学生,发起成立学联,“以北平学生为榜样”,动员青年学生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在重庆各学校的学生代表会上,他被选为学联主席之一。12月24日,重庆学联发动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在全城开展抗日宣传和示威游行。他回忆说,那天各学校100多支爱国抗日宣传队在重庆朝天门集合,人山人海,队伍浩浩荡荡,抗日救国的口号震人耳鼓。队伍走到哪里,市民都和他们同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次抗日宣传和示威游行成功之后,他们派人到成都、万县以及到上海、北平等地,和全国学生爱国抗日组织联系,以便把重庆的爱国学生运动和全国的爱国学生运动结合起来。这时,李新等人的爱国行动,遭到学校和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936年夏,重庆当局通知各学校都提前放假,以此来瓦解学生有组织的活动,李新也被学校开除。在这种情况下,李新别无选择,他对老母说:“我要去抗日,不赶走日本,决不回家!”

他含着泪告别家乡时,望着屋后山上的有名的“三块石”,增添了他的勇气和力量。相传,大舜为百姓造福,晚上耕田到这里,恰好鸡鸣天亮,牛和犁变成三块标志性的石头。李新说,这个传说故事鼓舞我勇往直前。这一年,是李新人生道路和追求的飞跃,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

先锋队,加入了民族解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他决心为抗日救国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1938年初,他和几位战友一道,经历千山万水,徒步走到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投入全民抗日的洪流。李新所走的爱国、革命的道路,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先进青年普遍走的道路。

在抗战八年中,李新先后当过编辑、抗日宣传剧团团长、青年干部训练班班主任、中央局青委书记,在太行山一带经历了1942年最艰苦的抗日反扫荡斗争,多次遭遇险情。在一次突围中,敌机一连朝他们投了几颗重磅炸弹,他们周围炸出几个深坑,泥土石块几乎把他身边的一位同志掩埋。他们掀起土石,把这位同志扶起来,竟一点伤也没有,李新和同志们仰天大笑,说:“天不亡我,日寇必败!”

1945年1月,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科长的李新,随着邓小平同志率领的北方局干部,由山西辽县的麻田镇,南下中原。这是邓小平率领八路军的一部,南下中原,实行战略反攻的重要步骤。临行前夜,李新兴奋得睡不着觉。他想起从延安到太行,由太行到中原抗日斗争的烽火经历,心潮涌动,彻夜写了一首词:“延安万古流芳,延河送别多悲壮。挥戈东渡,滔滔黄水,排空浊浪。高举红旗,仰天长啸,太行山上。望长城烽火,中原离黍,凝眸处,增惆怅。”他感到“增惆怅”词不达意,现在是“打胜仗”的时刻。正要修改时,天已大亮,立即收拾行装,出发了。

李新到豫东北濮阳一带,把太行山农村减租减息的经验传给当地党组织,以便更好地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后来他担任豫东杞县县委书记,不到半年,迎来抗日胜利的消息。这时,他想起一幕一幕中国人民八年抗战、前赴后继的情景,“泪飞顿作倾盆雨”。他写了一首诗,记录当时的心情:“爆竹连天天未倾,杞人今日尽欢声。八年流血山河赤,忽忆英雄泪满襟。”

他说:“为了中国的生存,为了民族的解放,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千千万万的人,我是幸存者,当时我和大家一样,主要的愿望是要争取和平建国,争取民主革命胜利。”

可是,事与愿违。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奉命进入北平,参加国共和谈,在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及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工作。他亲身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破坏和平谈判、挑起内战的斗争。1946年夏,在内战爆发前夕,李新和一部分同志奉命撤出北平。

李新回河北邯郸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因形势的变化,为加强平汉沿线的工作,他被派到冀南永年

县当县委书记。他出色地带领当地解放区的军民,开展反奸反霸斗争,进行土改,巩固和扩大地方政权,动员翻身农民参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进攻。因为李新在河南杞县、河北永年县“治理有方”,人称他有“百里之才”。

1948年夏,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他调回华北局主持青委工作。

不谋权位潜心历史

在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李新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在新中国的建设中该做些什么呢?

1948年8月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找李新去西柏坡谈话,要他接任华北局青委的领导工作。李新向任弼时同志汇报了他当县委书记时如何做党的工作,谈到他对组建青年团应如何吸取历史上共青团工作的经验教训的看法,以及建团要注意的问题。任弼时同志表扬了他“你这个县委书记当得不错”,对他谈的青年工作见解,也表示赞赏。当任弼时讲到“你到华北青委去工作”时,李新坦率地说出了他多次反复思考的想法:“我早不想搞青年工作了。”任弼时同志马上问:“你想做什么工作?”李新回答:“做教育工作。”李新当时考虑,全国解放后,新中国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教育工作就是培养人才的工作。任弼时没有想到李新不愿意做青年工作,他考虑了一会儿,说:“当然也可以。不过……”任弼时同志又问:“你根本没有进过大学的门,怎么敢到大学去工作呀!”李新回答说:“到大学去,给教授当徒弟,好好学习,和学生们打好交道,为党培养人才。”任弼时同志听后笑了,鼓励说:“不用怕,大学没有什么了不起,恽代英就没有上过大学,不是也当过教授吗?只要肯学习,你将来也可以当教授嘛。”任弼时同志同意李新的要求,是因为当时党确实需要一批干部去搞教育工作。他对李新说:我就向吴老(玉章)推荐你!从此李新离开政界,同吴玉章同志办教育,走上了教育和研究历史的道路。

1948年9月,李新任华北大学一部副主任。建国初,他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备工作。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学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主持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后来他长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领导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编撰工作。

李新是一位执着的忠诚的史学家。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都是亲历者。通过实践,他体会到,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很多关乎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经验教训,这是中国人民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他不计个人的得失和地位的升迁,甘于寂寞做个史学工作者。他说,我们这一代是亲身经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有责任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编撰历史,使它真正成为信史、真史。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太行山一带,一度曾在邓小平同志身边工作。因为他们都是四川人,有时在一起聊天、下棋,和邓小平有过很好的交往。1950年,邓小平给他拍来电报,要他去西南局任青委书记并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秘书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和职务。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婉辞了,他决心搞教育工作和历史研究工作。他说:他当时没有考虑地位待遇问题,宁肯坐“冷板凳”,而不去赶“热乎”。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李新同志除了一段时间管教学工作以外,他的主要精力是主持研究编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和《中华民国史》等巨著。李新同志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多年,他为了集中精力参加研究和编撰历史,没有参与管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日常工作。我在1987年初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时,他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是常务不常驻,他是(指另一位副主任)常驻不常务。他的行政关系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党组织关系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他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工作。

作为一位史学家,李新同志非常强调史德,写历史要秉笔直书。他说:“自古以来,要想写真史是很难的,首先在政治上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明写真史有时会遭到杀身之祸。但是,中国的史学正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传统,即认为写史而不真,有违史德,丧失了史学家的良心。”他说:“尽管有的‘史学家’由于昧心写伪史而飞黄腾达,但中华民族悠久的史学传统并没有失坠,它依然存在于史学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他非常厌恶为了所谓的政治目的,而把历史歪曲了。他说,我们写历史,不能像《红楼梦》那样,把“真事隐”去了。他在写回忆录中,就写到:“因为我亲身经历过一些历史事实,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机关干部春节团拜会上,针对某些现象说:“我们党史工作者要坚持党性原则,写历史不能讲假话,我认为最多写30%的虚话和套话,70%的要

写真话,不能写一句假话。”对于所谓历史科学要为现实服务的口号,李新不以为然。他说:“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有些人就借机粉饰历史,只唱赞歌,或者为现实某些失误辩护,以现代人的观点改写历史,这就使历史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我认为为现实服务,就是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几十年来,他培养和带出的一批学生,不少人目前在史学界是颇有盛名的学者,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按照他的“要敢于坚守历史,不受任何诱惑。切不可曲学阿世,追求一世闻达,败坏一世的名声”的要求;“直笔写真史,曲笔抒真情,彩笔传忠烈,朱笔诛奸佞”修史做人。

清贫的共产党人

李新同志生活一贯简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追求物质享受。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道:“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一向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来没有奢侈过。”我们革命队伍中有许多老同志,到现在还保持着这样的生活方式。古人讲“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在李新身上所体现的就是这样的革命精神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李新同志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期间,很长时间住在办公室。在中央党校南院83楼,他使用三小间办公室,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一间办公室兼会客室,约50多平方米。当时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条件很差,没有食堂。年至70多岁的李新,每天拄拐棍到中央党校南院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打饭到办公室吃。不搞任何“特殊”。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是看门的老头儿。他中午多打一点饭菜,下午把剩下的饭菜热一热,晚饭就这样对付了。根据中央不能住办公室的要求,中直机关管理局给他在万寿路分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居室。这样,他很满足了,可以把办公室和会客室分开了。后几年,才分给他一套部长宿舍。房间多了,没有家具摆设。大客厅里只有一张旧沙发和两把椅子,还是从机关淘汰的旧家具中折价购买的。他使用的破旧电冰箱,是“漏水不制冷”的,他看的电视机是“有影看不清”的。他做八十大寿时,他的学生集资给他买了一台新的电冰箱、一台新的电视机,作为寿礼送给他。尽管这样,他清静寡居,勤做学问,每次见到他,总是乐呵呵的,和你高谈阔论,津津乐道。而感染给你的是一种精神享受,是一种纯清的生活乐趣。就像陶渊明讲的“闻多素人心,乐与数晨夕”。

(写于2004年2月11日,近修改补充)

(责任编辑 萧 徐)

我的老师

张治中 梁漱溟 杨效春

● 陶天白

《出塞惜别两个小黄山》

小黄山下聚英俦，一曲骊歌别绪稠。

马后桃花马前雪，生徒怎能不回头。

1933年，张治中先生（字文白，1890—1969）在他的家乡安徽巢县小黄山之麓洪家疃，创办了黄麓师范，并亲题校训，曰：敬勇诚毅。1931年，梁漱溟先生（1893—1988）在山东邹平县的小黄山之麓，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我在这两个学校都求过学，且和创办人都有数十年的师徒之谊。1946年春，我在重庆北碚拜别了梁老师，追随张先生到新疆，途中作了几首小诗，上面的是其中之一。

1990年，张先生百年诞辰，黄麓师范举办隆重纪念，我寄去七律一首：

《敬怀张公文白先师》

敬事分劳忆训词，怀清崇礼旧新知。

张谊释囚甘担谤，公正存心致所期。

文教植基培国本，白拳创业慰亲思。

先生德范光传统，师表千秋世仰之。

1947年春在南京，国共两党打的不可开交，张先生心情烦闷，一些杂事他不愿管，写了条子，要我“敬事分劳”。

梁先生的墓在山东邹平小黄山之麓。墓碑为赵朴初所题。墓的左右，各有四块石碑，分刻陶天白、吴祖光、卢愚、袁晓、启功、沈醉、张岱年和冯友兰的挽词。我的挽词是：

邹平履霜，桂林步月，重庆雾浓，燕山云雾，五十年受教深恩，愧无报答，嗣后鳏生当继晷；

《觉悟》重农《朝话》示变《要义》探微，《人心》崇道，百万字研哲遗篇，多有创见，执中国

是不言文。

梁先生的生年为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重阳节）。1994年我作悼诗一首：

《重九梁漱溟老师冥诞》

黄花时节吊师魂，绝学传宗幸及门。

批孔何曾伤圣洁，标忠犹似着烟痕。

苏东恶浪惊康运，巴以和风泥怨根。

纵使世间多变局，天人之际德为尊。

张治中、梁漱溟两先生已成为古人。张先生留下了口述的《张治中回忆录》，60万字；梁先生留下了他大公子梁培宽主编的《梁漱溟全集》精装8大册；张先生大女儿、前全国政协常委、外贸大学教授张素我主编的《张治中将军》大型画册；梁培宽主编的《梁漱溟先生手迹选》等书亦已问世。

两位老师在去世前数月都有信给我。今天清理这些信件，对两位老师无穷怀念。决以有生之年，刻苦自励，期能对新疆的文化建设，略尽绵薄，或可有慰于两位老师在天之灵吧。



张治中

梁漱溟

杨效春先生冤案

杨效春(1897—19381),浙江义乌人,著名的乡村教育家。早年曾和李大钊、王光祈、曾琦、毛泽东、恽代英、刘仁静、张闻天、田汉、陈启天、左舜生、舒新城、吴俊升、邵爽秋、康白情、朱自清、高尚德等,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该会后分裂为各党派,杨先生属青年党(参见1982年全国新华书店发售的《中国青年党》)。

杨先生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作过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教导主任,成都大学教授,山东乡建院教授。1935年,张治中推荐杨为安徽省立黄麓师范校长。1937年底,日寇侵入南京,黄麓师范处于极端困难境地。杨校长前往合肥六家畈,和代理过安徽省长的吴忠英谋求应变之策。此时安徽省主席为李品仙,他的部下宋世科是吴氏仇人。宋捏造情报,抄了吴氏的家,搜出他们自己带去的“膏药旗”。李品仙误信为真,立即把吴忠英、吴忠流兄弟二人及杨效春都以“汉奸”罪名枪决了。

此事引起了社会人士的极大公愤。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曾琦、朱自清、闻一多、罗隆基等数十人在武汉、重庆各地登报为之鸣冤。1939年,我

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会里运输大队长章文晋(英语极佳,后为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汽车队长小何(湖南大学毕业,杨校长夫人何伯宏之弟),大家谈起杨校长冤案,亦都十分愤慨。杨校长被害时只41岁,张治中曾为之挥泪。后来李品仙知道错了,亲自到重庆中四路桂园张公馆向张治中道歉,并送了一笔抚恤金给杨夫人何伯宏及其子女平平、安安。1947年春,我和洪品山、张立钧等跟随张将军又回到了他的故乡洪家疃。李品仙亦赶来看望。他再次向张治中表示错杀杨校长的罪过。

黄麓师范校歌为杨校长所作,大意说:天下为公,伟哉大道。敬勇诚毅,吾校之宝。人生之乐,和合与创造。1946年在新疆,张治中小儿子张一纯要我题字,我写了此歌词的两句,现在一纯还保存着。杨校长留有《晓庄一岁》、《乡村教育纲要》、《人生哲学》等。1993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售、陈玉堂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载有杨效春,但对冤案则一字未提。作为学生,我应该如实叙之,使世人知晓。安息吧,敬爱的杨校长。希望平平、安安及其后代能看到我这篇沉痛的小文。

(责任编辑 李晨)

学习研究的好帮手
馈赠亲朋的好礼品
奖励孩子的好礼物

世纪藏书集锦

——完美的家庭电子图书馆



超值价 289 元
并赠送 2005 年精美挂历

内容介绍:

- CD1 中国现当代文学
- CD2 国外文学
- CD3 武侠小说
- CD4 中国古典名著诗词
- CD5 二十五史·资治通鉴
- CD6 法律·经济
- CD7 生活艺术百科
- CD8 素质教育
- CD9 英文图书
- CD10 中外名画鉴赏 3000 幅

每册书仅相当于 4 分钱哦!

大型电子图书《世纪藏书集锦》是中华全民读书书目推荐组委会推荐产品,全套共十张光盘,荟萃了 8000 多部古今中外各类经典名著及作品,涉及历史哲学、古典名著、诗词文学、生活百科等各个领域。8000 多部图书按市面价售需人民币 38 万元左右,重达 10 吨。一间 300 多平方米的房间才可以摆放,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超级“中外电子图书馆”

凡购图书即可免费加入北京蓝航书友会,可享受

- 1 成为终身会员
- 2 免费定期赠送最新书目
- 3 购书享受 2-8 折优惠。

编号

- A01 《中国养生百科》4 册仿线装 16 开 48 元
- A02 《本草纲目》4 册仿线装 16 开 48 元
- A03 《中华养生保健辞海》4 册 16 开 85 元
- A04 《家庭医疗保健百科全书》4 册 80 元
- A05 《现代家庭健康宝典》4 册 55 元
- A06 《周易全书》4 册仿线装 16 开 48 元
- A07 《中国历代书法家真品全集》6 册仿线装 95 元
- A08 《辞海》4 册 精装 75 元
- A09 《中国古玩收藏与鉴赏全书》上下册 120 元
- A10 《中国玉器收藏与鉴赏全书》上下册 120 元
- A11 《中国钱币收藏与鉴赏全书》上下册 120 元
- A12 《随园诗话》4 册仿线装 16 开 48 元

请在汇款留言中注明所购书名及册数
所有图书另加 5 元邮费

北京蓝航书店 咨询电话:010-67970454 80970719 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 100076-22 信箱 苏玉梅 邮编:100076

我收藏毛选四卷的遭遇

● 樊 思

我的这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是建国后第一次正式出版发行本。大三十二开，繁体直排。外有淡赭色的书皮，正中偏上是外形为正圆形的毛泽东侧面浮雕像。里面的乳白色封面上“毛泽东选集”五字是烫金的仿宋繁体字。第一卷 1951年 10月发行，第二卷 1952年 3月发行，平装本两卷定价共 4万元（旧币）。其时，我还是个穷中学生，对价值 4万元且又那么厚的理论著作不敢问津。听说老师们要事先预定才能买到。第三卷 1953年发行时，我是武汉某高校历史系学生，到新华书店购得此卷，并想买到一、二卷，但走遍书店均已脱销。

一天，我去看望任中学教师的表姐。谈到市面上买不到一、二卷，很遗憾。她当即将她收藏的一、二卷赠送给我。1960年 9月第四卷发行时，我已是武汉某学院从事“中国革命史”教学的教师。记得国庆节那天，我挤在人群中，在书店门前排队才买到。从此，一套“毛选”总算配齐了。它发行的时间与解放后我的成长同步，对这套书我是很珍惜的。

谁能预料，随着上世纪 60、70年代瞬息多变的形势，这套“毛选”同我这个收藏者一道，经历了一段坎坷、曲折的遭遇。

我经过近 6年的教学实践后，通过了政治审查和入学考试，由单位保送到北京某大学“中共党史进修班”学习深造。1963年 9月，我带着这套“毛选”和简单行李北上，重温了学生式的学习生活。该校图书馆藏有 1949年前解放区、国统区出版的大量图书报刊，进修学员可以享受进“教师阅览室”查阅资料的待遇；又有何干之、胡华、李新、彭明等教师为我们讲课。进修班的宗旨是，结合课堂教学，要求通读、熟读“毛选”四卷，熟悉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及“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反对右、“左”错误路线斗争中发展、成熟的过程，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体系，为提高今后的教学水平

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

这个学习环境让我如鱼得水，我带到北京的这套“毛选”派上大用场。在阅读中，我不仅用红铅笔做了自定的各类着重记号，而且写了许多学习心得的眉批，还夹了不少写满字的纸条，抄了一札辅助卡片，毕业考试时我取得优异成绩。我这个对马列原著读得很少的青年教师，当时自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哪里想到在后来被称为“红宝书”的“毛选”上批字是犯了弥天大罪。

1964年 7月，我带着这套“毛选”回校，给数学系某年级讲授“中共党史”（公共课），并随同他们赴南方某省参加“四清”运动。运动结束后回校，在政治系某年级主讲“中共党史”（专业课）。我在教学中运用进修时一些学习心得，并引导学生阅读“毛选”原著，颇受学生欢迎。

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在广州召开了开展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的会议。院党委书记从广州回来后向全院教师、干部做了传达。还介绍了长沙某军事学校学习毛著运动的经验。实际上，早在 1960年 12月，中共中央已就军委扩大会议的一个“决议”做出批示，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到我“四清”回校后不久，就听到传达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发出的“指示”，对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此后，对待毛泽东著作的这种庸俗实用主义学风，渐渐风靡全国。

“文革”运动开始后，在当时学习毛著这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上，出现了极其反常的现象。一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愈来愈高，林彪早就说：“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这种“顶峰论”在报刊广播中屡屡出现。另一方面，真正严肃认真系统学习毛著的人愈来愈少，像我这样曾经通

读毛选”四卷的理论教育工作者,也被卷入林彪煽起的这股庸俗实用主义狂潮。我收藏的这套毛选”四卷本,越来越受到冷落。这不能不说是老人家革命理论的悲哀,也是我这个青年理论教育工作者个人的悲哀。

1966年9月7日,中共湖北省委派人给我院送来了13厘米长、9厘米宽、2厘米厚的“红宝书”,还附上给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同学们、同志们(原文如此——作者注)的信,号召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1968年初工宣队进校后,给我们发了小三十二开、薄薄的“选读”本和毛选”简体横排缩印本。加以“两报一刊”三天两天用黑体字传达毛的最新、最高指示,要忙于敲锣打鼓游行庆祝,学习照办,我的这套厚厚的毛选”四卷本便被“闲置”在书架上,蒙上了一层灰尘。

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工人、军人走进大专院校后,没有听到他们向革命师生宣传毛的革命理论,而是手拿“红宝书”忙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两清”“五一六、北决扬(群众组织)”、“深挖细找”历史、现行“反革命”。按军事编制,我被编入第二连。中共“九大”召开前夕,连指导员叫我绘制了毛主席巨幅头像做庆祝游行之用,指挥长看了还给予赞扬。但工宣队对一批教师、干部的“内查外调”正悄悄进行。由于1968年5月我参加起草了批评工宣队“支派”的大字报,引起了他们的“警惕”。除派人到老家调查我的“历史问题”(老家解放时我不满17岁)之外,还乘我不在撬开我的寝室门锁和书桌的抽屉,企图寻找“反动”文章、日记之类的“罪证”,但毫无所获。于是,两名专案人员把目光投向书架,非法搜走了我收藏的这套毛选”,仅仅翻阅了我写的少量眉批,就断然宣布“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

1969年夏,在指挥长(某营级干部)指示下,原党委政治部某干事在院广播台播发了一篇题为《樊某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的“檄文”。1970年初,又用“院斗批改办公室”名义,散发了《系统清算樊某反革命罪行》的材料。专案组采用当年康生在延安整人的斗争手法,逼我承认“篡改”、“反对”毛泽东思想,但他们没能举出我“篡改”的一条具体证据。而我那套写了眉批的毛选”,又控制在他们手中,不让我见到。他们在斗批中反复宣读毛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要我“缴械投降”。我则在自我检查中,引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处理历史问题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

内容及社会、历史、思想根源的有关论断,说明那些眉批是在某大学“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的环境下写的,深挖自己没有无限崇拜主席著作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并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谴责本本主义的话,痛骂自己竟敢把伟大领袖的宝书当成“讨生活”的“本本”,但不肯承认篡改、反对毛的思想的“罪行”。批斗者和被批斗者都运用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可没有取得“双赢”的结果。但是,我后来遭到的惩罚就可想而知了。

林彪摔死温都尔汗的惊人消息,是我下放劳动两年后在某县区一个生产队水田里插秧时,听社员朋友悄悄讲的。到1972年夏,武汉某学院军代表和专案人员到区政府驻地,为那些因“历史问题”停止组织生活的“五七战士”恢复党籍,而对我们这些“现行问题”的“战士”却置之不理,我忿忿不平。

在他们即将返回武汉的前一天夜晚,我冒着细雨,在泥泞的路上赤脚摸黑步行十余里,从生产队赶到区政府,找他们索取被搜走的那套毛选”,对我的“问题”做出结论。他们已没有昔日威风,答应回去请示、研究。同年冬,两名专案人员到生产队找我,声言“毛选”不能还你,拿出一纸写着“篡改毛主席著作”、“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要我签字,我加以拒绝。1973年春,不少“五七战士”回武汉分配工作,我被转移到某县农场继续劳动。一天,我在水田里扯稗子,排长到田边叫我,说有人找。我赤脚带泥走进场办公室,来者是那两名专案人员。他们将我一再索要的毛选”交还给我,并说“你可要好好保管”。我说:“你们如果对我放心,还是请你们继续为我保管。”看来,他们也非常“珍惜”这套毛选”。不过,他们和我是以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来理解它的价值的。不管怎样,被非法搜走近4年的这套毛选”,终于回到我的手中。但见它那精美的书皮已被揭走,沾满了污垢的封面上,烫金字已失去光泽,书脊上的字迹已模糊不清,灰乎乎一片。同它的收藏者一样,它也遭受了一场劫难。

由于那两名专案人员后来又多次找我,要我在他们做的上述结论上签字。1974年春,我在某学院工作时,抽空对我在毛选”上写的眉批做了粗略统计和浏览。发现几个页码上打了一个大折,没有来得及做仔细研究。这年秋,他们拿着仅仅去掉“严重”二字的老结论又来“造访”,我在“结论”后面写道:“我1963年至1964年在某大学中共党史进修班学习期间,由于自己抱着资产阶级学术研究的态度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四

本‘毛选’上写了学习心得体会1335条,除其中7条有认识错误外,这1000多条,并非‘乱批乱改’,也没有什么错误。”此后,他们没有再来纠缠;“结论”问题不了了之。直到最近,因阔别20多年的朋友(也是我表姐当年的学生)来访,回忆起已故的表姐51年前送“毛选”给我的情景,也回忆起这套“毛选”的一段遭遇,促使我从书柜中拿出这套“毛选”,对当年专案人员打折页码上的所有眉批,仔细琢磨,才发现他们所指责的几条“确凿罪证”。

第一卷第31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五件“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中谈到农民将地主武装拿过来改为“挨户团常备队”。眉批为“夺取地主旧武装,更重要的是建立新武装。对地主武装此时尚未提到根本改造”。同卷第39页,同篇第九件“农民诸禁”中谈到农民禁运、焚烧鸦片,和政府的财政发生冲突,省农会下令暂缓禁运,农民忿忿不乐。眉批“暂缓禁运,当时比较适当”。又在“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旁批“这个矛盾这样解决是否正确”。当时的认识是,此篇是毛主席早期的著作,这些都是当时农民运动中提出的实际问题,其中不少问题毛也还在探讨之中。

第一卷第55页《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三“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谈到1928年4月前,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的红色政权,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下批“把广州起义不能坚持之原因放在此处,与其他各武装割据一起总结失败原因,是否忽视了城市特点”。当时的认识是,大革命失败后,对夺取大城市和农村武装割据的不同道路,全党和毛主席都正在探索之中,毛自己也曾率队准备攻打大城市长沙。

第四卷第1184页《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此文是1946年7月20日对党内的指示。“四,谈到农村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下批“农村政策还是五四指示精神”。当时的认识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再次提出土地要求。为此,



本文作者在毛选上做的批注

中共中央1946年5月4日作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上述7月20日指示的农村政策仍是“五四指示”精神,是我将两个指示有关条文做出对照后写的。

第四卷第1426页《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谈到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又谈到在相当的时间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我对照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全文,原文为“一部分国民党反动军队”;改编为吴化文、曾泽生的人人民解放军”。我在旁边加了“反动”二字及“吴化文、曾泽生的”七字。并在第1425页篇题下注明:“括号内为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原文所没有的。”

其他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核对了上述几条眉批之后,我才大有所悟。当年30岁已出头的我,是何等的迂腐、幼稚、无知,出于研究毛思想发展、成熟过程的虔诚、执着心态,竟然在老人家的著作上妄写“学习心得”,并妄加“考证”,以致招来一年多的隔离审查,三年全家下放。而“斗批改办公室”、“专案组”的两三人,当年虽受指挥长青睐,贯彻林彪、“四人帮”任意整人那一套很卖力气,但他们并没有“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也缺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基本知识。(责任编辑 李 晨)

随父亲为新四军采购军需物品

● 陶家云

我的父亲陶震生(又名陶翔知)是党外人士,安徽省天长县铜城镇人。他从年轻时代起就在家乡开办了宏新香烟公司。我记得,厂房宽大、明亮,整齐地排放着卷烟机、切丝机、滚筒机、动力柴油机等机器。工厂里大约有30名员工,父亲从上海请来了技师和包香烟熟练的女工,从镇江请来了制盒工人。工厂每天能够生产几万支香烟。在当时看来,规模是相当不错的。凭借着父亲的经营头脑,公司的产、供、销模式令当地商界人士耳目一新,不少人都希望能够与他合作经营香烟生意……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在淮南、淮北等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我的父母深知“没有国就没有家”的道理,主动将宏新烟草公司无偿献给新四军,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就这样,宏新烟草公司作为新四军在安徽路东八县联防办事处财经处下属的利民合作社,生产“飞马牌”香烟。办事处主任陈穆和父亲接触密切,张云逸、邓子恢、彭雪枫、罗炳辉等首长先后都来看望过父亲,称赞他在国难当头之时献出工厂的行动是爱国之举,称赞他“是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商人”。彭雪枫师长在接见父亲时说:“在敌人对我军严密封锁的关键时刻,你交出了烟厂,与新四军生死与共的真诚合作,我表示感谢!”

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新四军的兵工厂都由各师自己组建,从无到有,规模小,且都分散在不同的地区,军工物资的采购是关键。为此,首长们征求父亲意见,希望他能够为新四军二、四师的军工部和卫生部采购军工器材、医疗器械、医药用品。父亲采纳了首长们的建议,他认为,在国难当头的时刻献出烟厂,为新四军采购军需物品,就是为抗日战争出力,能够与新四军的将领结为朋友,能够相互以诚相待、彼此信赖、共同抗日,是一生中做的最正确的事情。从此,父亲往返于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的采购工作如同家常便饭,父亲将自己和全家人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新四军二师、四师军工工作的生命线上。

父亲每次采购的物资都是按照军工部、卫生部的要

求和所需材料、药品的清单办理。父亲采购的物资有刨床、车床、钻床、动力柴油机等急需的军工机械,制造枪榴弹的原料和各种西药。大部分军工物资是由父亲送到师部,也有一部分是师里的同志到我家来取。如硫酸、硝酸,都是用大坛子封装好的,整齐地排放在我家院内墙边上,大人们一再叮嘱我和弟弟、妹妹,不许靠近更不许触摸。

那时候,兵工厂的吴运铎等同志经常到我们家来取物资,只要父亲不在家,都是母亲招呼他们,为他们忙前忙后。那时,我们全家人齐心协力支持父亲的工作,我年迈的祖父也帮助忙里忙外。

1943年末至1944年初,父亲采购的一批军工物资及西药在镇江被敌伪三师查获,敌人按照一封电报上注明的地址去抓父亲,结果扑了个空。后来,敌人在上海抓到父亲,押回镇江市。敌人对父亲软硬兼施,想从父亲的嘴里套出背后的指使人。父亲和敌人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敌人把父亲绑在老虎凳上严刑拷打,用辣椒水灌父亲,致使父亲口鼻出血、辣坏了气管。父亲坚贞不屈、只字不吐。

地下党的同志及时将情况汇报给新四军的首长们。二师的同志根据邓子恢主任的嘱托,来铜城将父亲被捕、组织上正在积极营救等情况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和祖父立即与来的同志一起将存放在家中的物资迅速运走。一家人都急切地等待着营救父亲的消息,却忽视了我染上伤寒病的大策(当时已经10岁),他因贻误了治病时机而病逝。不久,组织上派人带着二十四根金条去扬州找青帮头子王老太爷联系(组织上曾允许父亲拜此人为师,主要是利用关系开展工作),请他出面设法营救我父亲。王老太爷亲自到镇江疏通关系,将父亲营救出来。

出狱后,父亲异常惦记还在敌人手里的那批军工物资和药品,根本顾不上养伤,他四处筹款,拿出家中祖传字画和积蓄,多方面打通敌伪关节,竭尽全力去疏通关

系,终于从二鬼子手里把那一批物品全部买了出来,运回新四军路东办事处。为此,张云逸、邓子恢、张爱萍、方毅几位首长会见并宴请了他。席间,张云逸副军长说:“陶震生同志死里逃生,而且物资完整无缺地运回来,立了奇功。”首长们对父亲在完成采购任务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挫折,甚至是危险,都能随机应变、化险为夷,赞不绝口,称他是“铁嘴钢牙”的陶震生。父亲却说,为了抗战,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再好的家传物品都没有新四军需要的物资贵重。确实,父亲的诚信和机智在新四军首长们心中留下的印象是最为突出的。

1945年春,邓子恢主任派父亲再次去上海采购军工物资。考虑到工作的安全,邓主任指示他带上一个大孩子做掩护,并指示对孩子做好保密教育。为此,父亲决定带我去。父亲对我说,你是为了掩护我工作而来,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能对任何人讲。我就是这样随父亲走上了为新四军采购军工物资的革命道路的。

到上海后,父亲租下了跑马厅附近一处楼房的两间房子。每次来人谈工作,我都在楼下放哨。父亲出去接头时都带着我,因为我不引人注目,机密的采购物资清单就缝在我内衣里。那时,父亲每次采购好一批物资都要亲自送回根据地,我们的住所就要变动一次。为了更安全起见,父亲托人把我安排在一个不起眼的私立中学读书。

我在私立中学名义是读书,实际上却是等待着父亲随时找我出去工作,有时还要随他去南京。我很少与同学交往,从来不和同学们一起到校外游玩。但是,为了完成任务,我经常一个人到上海的闸北去送信。我的学业始终是断断续续的。1946年6月,父亲运送军用物资到师部,并随军北撤到淮阴,到新四军军部后,由于旅途劳累过度,在镇江坐牢受刑留下的喘病发作,高烧不退。首长们非常关怀,请来医生为他诊治。病情稳定后,邓子恢主任让他在沪宁一带继续采购,我跟随父亲为新四军采办物资的工作直至1948年的秋天。

随着蒋介石疯狂挑起全面内战,新四军北撤山东,我的家乡成了敌占区。敌人得知父亲为新四军购买军工物资,多次到家里抓人扑空,就把我的祖父和母亲给关押起来,逼迫他们交人。地下党的同志设法托人把祖父和母亲保出来后,祖父

为了躲避敌人三天两头的纠缠,决定放弃祖传的家业,带着全家人逃离家乡,先后在扬州、瓜州乡下、六合、南京、镇江、上海等地过着颠沛流离、东躲西藏的生活。仅在全国解放前夕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的祖父因年迈和疾病客死他乡,我的四个弟弟、妹妹因肺炎等疾病无钱医治先后死去。我们在家乡近千平方米的祖宅以及家中的物品全部不复存在,地也被他人占用盖了房子,我们在家乡已无立锥之地,全家背井离乡,再也没有回去过。

全国解放后,我父亲一直在家乡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直到1986年病逝。一些知道父亲与新四军的许多首长关系密切的人,不忍看着父亲因在镇江监狱落下的哮喘病频繁发作,劝父亲找首长们帮助解决一些生活困难。父亲总是摇头说,当年我带大女儿采购军工器材,是我们心甘情愿的。现在解放了,不需要采购军工器材了,我又落下哮喘的病根,现在去找首长们,不是伸手讨功给人家添麻烦吗?我们自家的困难自己解决……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当回想起我跟随父亲采购军工物资的岁月,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特别令我感动不已的是,让我敬仰的邓子恢副总理的夫人陈兰和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在他们九十高龄之际,对我的父亲和我当年为新四军所做的一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党对我的父亲一生最高的奖赏。我想,父亲留给我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我们一家人在战争年代的所作所为,仅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万众一心抗战的一个缩影。

(责任编辑 李晨)



新四军缴获的战利品

陈登科提案恢复国歌歌词

● 陆志成

起 起来……”的雄壮歌声。接着又听说在全国人大提出这个方案的第一人,是著名作家陈登科。恰巧那时我正在从事“陈登科生平与创作年谱”的编著工作,住在合肥,同陈老接触的时间颇多,便就这件事专题请教了他。下面便是我当时记录的陈老谈话的主要内容:

早在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歌词时,我就持有异议。首先是一个对国歌原歌词的情感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年代,就是唱着这支歌走进枪林弹雨,走上抗日救国战场的。那时,一唱起这支歌,就想起中华民族的危亡,想起祖国山河被践踏、人民被蹂躏的现实,就抑制不住那种誓为祖国人民献出热血、献出生命的激情。因此,我们对田汉同志的这首歌词怀有深厚的情感。至于对新歌词,我们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那些内容也是硬凑的,空空洞洞,索然无味。但由于当时田汉同志的问题尚未澄清,所以也只能议论议论,没有写出意见来。

到了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时,田汉的历史冤案已经得到平反。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作为与会的文艺界代表,向大会提出了这个议案——要求大会讨论通过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就此事我曾同肖马、韩瀚二位作过深入的讨论,得到他们的支持,为议案拟出三条理由:一,原国歌的词和曲,都是毛主席亲自参加选定的,经历届人大通过决定的。二,现行的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粗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对这个词反映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我曾亲自一个人一个人地问过上百位代表,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唱。你看,全国人大代表不会唱自己举手通过的国歌,岂不是个大笑话?三,原词作者田汉同志已经平反,并有了明确结论。

近年来,不断看到和读到一些关于国歌往事的访谈与文章。但其中述及在“十年浩劫”中从禁唱国歌歌词,到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决定恢复原国歌歌词这一段历史曲折,大都语焉不详。而我倒认为这段史实不可或缺。今将我之所见所闻写出来,作为补遗,并借以寄托对陈登科先生逝世六周年的怀念。

国歌歌词《义勇军进行曲》,本是田汉先生1935年2月创作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词,由聂耳作曲后广为流传,其金石般的文字,号角式的旋律,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抗击日寇的战场上,前仆后继,奋勇前进。到了1949年9月,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由周恩来、徐悲鸿等人最早提议,并经由毛泽东参与讨论和研究定为国歌。虽然当时有人认为歌词中的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合时宜了,提出要修改的意见,但绝大多数人不同意。与会的毛泽东也认为:我国人民经过艰苦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全中国也快解放了,但还受帝国主义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的压迫,要争取完全的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留原歌词好。故,他后来在一份有关国歌的文件上批示:拟用,居安思危。

但自“文革”始,由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所致,又加上田汉被打成“叛徒”,原词不被使用,国歌就成了有曲而无词、只能奏而不能唱的奇怪之歌。至今,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年搞过的一次新歌词征集活动的情形,我还亲眼见过一本1978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征歌词选编》。里面选入歌词59首。由于选入了我们阜阳一位同志的一首,在当地产生过一些影响,故而对此事印象很深。

后来,1982年底原歌词被恢复,会场上又响

人平反,作品也应平反并受到充分的尊重。现在抽掉原词,以集体填词充数,这对国家的尊严、艺术的完整都是不严肃的,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

当然,也有阻力或非议。其中最突出的,莫甚于“过时论”。为此,我举出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自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马赛工人唱着它开进巴黎,一直唱到今天也没改。而我们的国歌,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的作用,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今天,它仍在教育、激发年轻一代人的爱

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它永远不会过时(果不其然,后来在恢复国歌原歌词的决议中,也明确指出:国歌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笔者注)。

不过,议案的办理也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当年大会秘书处只讲交付常委会研究,便没了下文。后来在五届三次、四次会议上,我也一次次坚持地提,直到五届五次会议才得到通过。终于使这首失落17年之久的歌词,重新回到人民心中。

(责任编辑 李晨)

| 书 名 | 作者或主编 | 定 价 | 邮 费 |
|--------------------|-----------------|-------|------|
|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 | 全套四册 | 67.20 | 8.00 |
| 之一 我的回忆 | 孙中山 | | |
| 之二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 蔡元培 | | |
| 之三 梁漱溟与毛泽东 | 汪东林 | | |
| 之四 亲历一九五七 | 徐铸成 | | |
| 林彪的这一生 | 少 华 游 胡 | 28.00 | 5.00 |
|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 冯建辉 | 22.00 | 5.00 |
| 庐山会议实录 | 李 锐 | 18.00 | 5.00 |
| 邓小平年谱 | 中央文献研究室 | 76.00 | 8.00 |
| 陈独秀风雨人生 | 朱 洪 | 28.00 | 5.00 |
| 扛起地狱的闸门 | 丁 群 | 21.00 | 5.00 |
| 梁漱溟问答录 | 汪东林 | 25.00 | 5.00 |
|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 冯建辉 | 16.50 | 5.00 |
| 苏共亡党十年祭 | 黄苇町 | 22.00 | 5.00 |
| 刘少奇蒙难始末 | 图 们 祝东力 | 17.00 | 5.00 |
| 人民公社兴亡录 | 宋海庆 | 36.00 | 6.00 |
|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 邓 野 | 29.80 | 5.00 |
|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 吴 思 | 23.80 | 5.00 |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 戴 煌 | 28.80 | 5.00 |
| 第二次宣言 | 王小平 | 28.00 | 5.00 |
| 周扬与冯雪峰 | 徐庆全 | 28.00 | 5.00 |
|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 徐庆全 | 24.00 | 5.00 |
| 红色第一家族 | 马社香 | 30.00 | 5.00 |
| 再生中国—— | | | |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 李 艳 熊志勇 | 44.80 | 7.00 |
|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 范 硕 | 36.00 | 6.00 |
| 断桅扬帆——蒙冤 25年的公安局长 | 丁兆甲 | 26.00 | 5.00 |
|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 | | |
|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 图 们 肖思科 | 28.00 | 5.00 |
| 25年——1978—2002中国大陆 | | | |
|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 王 安 | 26.80 | 5.00 |
| 蒋介石评说古今人物 | 戎向东 | 29.80 | 5.00 |
| 食无禁忌 | (美)巴里·西尔斯 比尔·劳伦 | 19.00 | 5.00 |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周扬与冯雪峰》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领军人物,周扬与冯雪峰的名字,一直被历史反复书写着。他们两人如何从蜜月期而交恶,他们的命运如何因“两个口号”的争论而扭结在一起,并在“文革”中难逃受批判的命运,他们的手又如何在度尽劫波后紧紧相握,留下了象征他们关系的《两只锦鸡》的美丽语言……本书以大量的鲜为人知的材料,从政治史意义下描述了两人的曲折的人生道路,揭示了历史迷雾中的文坛恩怨。

《陈独秀风雨人生》陈独秀离开人世已经60多年了。每到春天紫色的蚕豆花开放之际,人们自然会想起因误食此花而病发的陈独秀,想到了当年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老头子”的风雨人生。本书以30万字的篇幅,描述了这位中共领袖的曲折人生道路,并追述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大背景。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在刚过去的20世纪,那些让人记忆的历史太多太多,但本丛书让亲历者来讲述,就多了一份真实和一份况味。在这里你可以与徐铸成、于光远、蔡元培、陈独秀、朱德、杨振宁、林语堂、蒋梦麟等名家相遇,体味历史,重温记忆。

《食无禁忌》本书的英文原名为《健康区》,讲的是如何搭配不同食物的比例,以达到激素平衡,从而进入“健康区”。美国斯坦福大学游泳队请本书作者制订菜谱,结果,1992年一举夺得八枚奥运金牌。据作者说,他推荐的食谱以1982年诺贝尔医学奖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防治心脏病和癌症大有益处。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一九一八年的上海社会风情

● 吴国英

上世纪初的第二个十年,是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发展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年。一方面,上海已经初具规模,具有异国色彩的现代教育、现代商业、现代工业以及现代餐饮业已经萌芽、生根、开花,已经与林林总总的中国传统产业在一起,成为上海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俄国及其他东欧国家流亡来沪的各国侨民,与19世纪先来一步的西欧、北美侨民一起,带来了异域文化和新的色彩。这种异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上海的本土文化海派文化的撞击和融合,既产生了新鲜感,又产生了某种不安。

画展

地点在张园,目的是为救济从鲁豫皖来沪的灾民筹集善款,入门券是一块大洋一张,展期三天,时间是在六月份。由此可见,慈善事业在上海,早在1918年或更早已经开展起来。初期的筹办人是知识界和实业界人士。

此次画展引起轰动,是因为展品中有三幅中国古画珍品。一幅是明代唐寅的作品,据当时精于书画鉴赏和文物鉴赏的行家说:“此乃明代唐寅之杰作,此乃中国美术家所作风景画中最有名者。”从画法上看,这幅画的明暗对比及远近的透视,效果都非常之好。另外两幅画,是唐代画坛高手吴道子的作品,画面上出现的是大海和人物。据行家说:“年代虽久,君能见其美妙之纹”;“此画描写天然,此画似已重改。”由于这三幅画参展,我们可知,此次为灾民筹款的善举,得到书香门第和世家大族的鼎力相助。

出殡

1918年上海的阔佬及长官出殡,就如同现在有头有脑的人物出殡一样,送殡的人会来上黑压压一大片,争相拉关系走后门。

那时候,已经有许多在上海定居的外侨。上海人出殡,自然要引起他们的好奇心,驻足观望、引颈探奇。而

观察一个民族办丧事,如同观察一个民族的言谈、举止、吃饭、睡觉及其衣着打扮一样,是观察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习俗以及民族文明程度最直接的窗口。

在看过了上海人出殡之后,让所有外侨感到迷惑不解,进而颇有些微词:“论及大多数之中国人,君不能辨婚礼出行与出战与出殡,且吊者恒不知何者为适宜,何者不适宜。枢在前面而彼等乃高谈笑谑,而军用喇叭不和之调,则不堪入耳。”这样的大出殡,根本不能表达活人对死者的悼念,更不会引起旁观者的同情与尊重。

婚姻

在当时上海的知识界中,流行的观念认为,男子以二十七岁为最适宜的结婚年龄。其原因有二:一是此时身体已经发育成熟,早婚则有害于男女双方的身体;二是此时男子已经能够立业,从而能够承担得起养家的义务。但这个最佳年龄却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坚决反对,认为太晚了,因为“早生儿早得济”是社会大众共同的生育观。

新旧两派在婚姻上的歧见,形同水火。即使主张婚姻自由的知识分子,对新派的婚姻也颇有微词:“譬如吾少年男女,今有不欲与父母商及姻事者,而此则于稍得新知识者尤甚,居然有至于主张自由结婚者,在称为新派之中,吾人已闻有不正当之交际与离婚矣!此则自然较旧式结婚制度,更应反对。”

显然,这里是指的婚前同居和离婚率上升。现在,我们对此已经能坦然处之,但八十年前,中国人却把这看作是世界末日,是荒淫、放荡、堕落、败坏,众口一词地加以反对。

衣帽

通过衣帽,可以看出人的精神状态。

在当时上海的知识界中,穿西装已经是很普通平常的事情了,非常受欢迎。“洋服似将成为世界普通之装

束。各种族各阶级之人民,均用洋服。君当知舆论以为不着洋装,即不文明。”但“穿西装即假洋鬼子”却是义和团、红灯照、小刀会的观念。他们的事业正红火的时候,为此砍杀了无以数计的中国人的脑袋。

尽管上海知识界文明开化较早,但却竭力反对女子穿西装和烫发。“男子尚无害,吾国妇人中,在衣服上有较此尤劣者,有人不特效法外人之装束,且又效外人之整发,其形状实属可晒。”男子可以穿西装理西发(分头),女子却不可以穿西装理西发(烫头),这种心理是不是大男子主义在作怪呢?或是明为维新,实则守旧?或者是半新半旧兼而有之呢?

那时候在上海,不但有人大胆地穿上了西式男女服装,同时有人大胆地戴上了巴拿马礼帽。那时候,一顶正牌巴拿马礼帽售价是大洋20元。买不起的,只好买仿制品,售价仅为5元。看来,上海服装能够在大陆领风气之先长达数十年,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经贸博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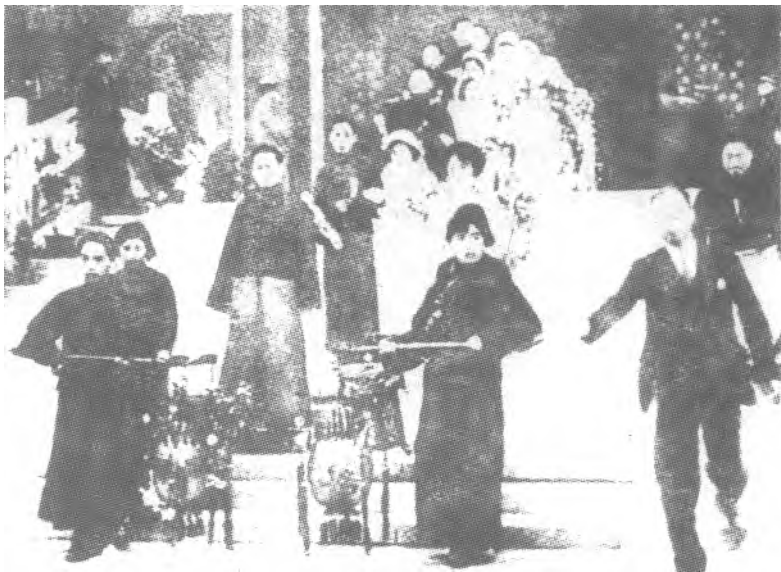
现在,流行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博览会,在1918年的上海已经成功地举办过,不过那时上海人称之为“赛珍会”。地点是在张园,时间为上午九时至夜半,会期共计三天。

会上,举办各种文艺表演,有皮影戏、杂技、戏剧,动物园展出各种珍奇动物,各展台出售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小物件和纪念品;晚间则燃放绚丽多彩的焰火,更是吸引得游人如海如潮,把经贸博览会推向高潮。

会上有文物馆,展出中国古代字画及古代瓷器;有实业馆,展出丝绸、茶叶、地毯、漆器、象牙制品等中国传统制品。

经济贸易博览会意义在于:“此种陈列,除教育上的价值以外,在鼓励实业上,亦为一极紧要之事。在一赛珍会如彼者,余等不能独见吾自己之物产,且能以吾的与人的相比较,如此则使余等得借竞争改良吾实业。西国之政府,为鼓励实业起见,奖赏佳美之制造家以奖牌。今吾国为共和国,则目的之一,即为发展实业。余等应有赛珍会较多,各省间之赛珍会,能在新实业上,教育各省鼓励各省,其益不浅。”

1918年的上海赛珍会,主办者并不是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举办第一次集体婚礼

而是张作霖主政的东北政府。当时上海人称东北政府为“满洲政府”。选择在上海举办经贸博览会,说明东北政府为发展东北经济,促进地区间经贸往来,还是很有眼光的。中国第一届经贸博览会,于1910年在南京举办,名称为南京市南洋劝业会,主要是邀请南洋华侨厂商来参展。

旅馆

发展地方经济,必须发展有地方特色的餐饮旅游业,唯此才能方便商贾往来,并能以此吸引商贾,吸引投资。可以说,餐饮旅游业不发达的地区,其经济是不会发达起来的。而上个世纪初期上海作为现代化大城市的崛起,与上海发达的餐饮旅游业是分不开的。

1918年,上海最好的旅馆有“共和旅馆”和“中央旅馆”。“共和旅馆”距离上海火车站仅一英里,距离邮局仅有两个街口,每日房价从二元到十元不等。

“共和旅馆”是中西餐兼营的旅馆。早餐的饮食是:面包、大饼、粥、火腿、腌肉、炒蛋、牛奶;午餐的饮食是:饮料有葡萄酒、红酒、香槟酒、汽水、咖啡,大菜有烧鸡和炖牛肉,佐餐的水果有苹果、梨、葡萄;晚餐有煮牛奶炖鸡蛋,蛋要炖得很嫩,吃前加上一点奶油,还有其他饮食。

旅店的服务遵循细心、周到、满意、礼貌的原则。旅客既可以在餐厅用餐,又可以在客房用餐,由侍应生随时送到,遵从旅客吩咐;旅客写好的信件,要购买的报纸,既可自己去邮局投递购买,又可由侍应生代劳,悉听旅客方便。

(责任编辑 李 晨)

世界坐标上的“康雍乾盛世”

● 李一鑫

清朝定鼎中国以后，出现了为一些史家称道的“康雍乾盛世”（1662-1795），“三位大帝”风光至今，不断有人津津乐道那一段往日辉煌。“大帝”们的真假事迹也被小说家和影视作者炒得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但乾隆之后仅隔45年，即从1840年开始，先后两场鸦片战争，竟把按说正值壮年的大清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一蹶不振，从此开始了当时已近四亿之众的偌大帝国的衰亡过程，真个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整个中国，也正是以鸦片之役划线，掀开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盛世”礼赞余音未绝，“东亚病夫”的帽子就落在了这个有着骄人历史的大国头上。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戏剧性的大起大落？盛衰荣辱之间何以衔接得这样紧凑？而最启人疑窦发人深思的是，举世早已公认，直到18、19世纪交替之际，即乾隆末嘉庆初，中国在总体经济实力上还是全球第一。为什么仅仅时隔几十年，就骤然弱不禁风，以至打不过远涉重洋而来的几千名外国水兵？在这场中西首战中，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为何没有起到作用？那么，又是什么起了决定作用？

于是进一步问题便是，“康雍乾盛世”究竟是怎样一个“盛世”？“盛世”外壳里头又潜伏了什么致命之癌？为我们整个民族又留下了什么殷鉴？

迄今对此所作的评析，见解很不同。看来恐怕不能只对这一“盛世”作孤立的单一维度的观察，而是要结合当时中国内部和外部条件，作多维度的观察。比如说，不仅要从中国历史作纵向的比较和观察，还要把中国放到当时世界坐标系即全球大背景下作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比较和观察；不仅要从国家的疆域、财富积累变化状况，还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状况作广泛联系地比较和观察。

“奉天承运”定鼎中原，其兴也勃焉

单就有清一代来说，康雍乾三朝确是其鼎盛时期。首先是战绩显赫，逐步消灭汉族农民起义军和几个南明小朝廷，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收复郑成功后裔海商集团所据的台湾；同时又通过“改土归流”，即对一些少数民族安抚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使有效控制的版图在明朝基础上有所扩大，初步建立了比现今疆域还大的统一国家。从政治经济建设来说，清朝初期，确实也在中华民族长期积累发展的经济基础上，使生产力得到了新提高。在康雍乾三代以后，无论是国家整体还是国民平均GDP，都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这在世界级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新著《世界经济千年史》和许涤新、吴承明主编2003年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新书中都有详尽的历史数据和考证论述）。以这些成就，不仅在清代，即使在整個中国历史上，确实也够得上屈指可数。

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一改明末时不断闯入关内却只为席卷财富以供享乐、抢掠子女以充奴隶的狩猎游牧民族旧习，而是开始意识到要励精图治，准备坐稳天下。因此，除仍旧力图维持包括满人服饰和剃发留辮等“祖宗旧制”之外，还通过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等汉族士大夫，努力学习远比满族文明优越的汉族文明，而以汉儒经典特别是明朝治国的现成的典章制度为主。事实上，不止康雍乾三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三帝开始，就已刻意效仿中国历朝的统治术，杂糅以满族奴隶制度的传统“特色”，例如八旗兵制、耕战并举的庄园制等等。从康熙朝开始，为了保持骄人的骑射技能，在热河建山庄和围场，定期举行“木兰

秋”对八旗将兵进行声势浩大的练武检阅。那架势，明显是要认真地开创一个以少制多的强大王朝，即以不足百万的满族人，统治人口比本民族多几百倍的中原民族的爱新觉罗王朝万代基业。

中国历代新朝建立，总要在国号帝号前加上“奉天承运……”等一串字眼，以表示上承天运下符民心。李自成农民军进北京，也自称“奉天承运……”。但清朝建国时，说是上承天运，赶上个好历史时机，却是不假的。

首先，明朝后期几个皇帝昏庸腐朽，糜费无度，民怨蓄积已久，国家危机严重，到崇祯时，已是徒有中兴之心，而无回天之力。不断暴动的农民和武装海商集团（这是一股更大的新势力）的夹攻，已注定了旧王朝大厦将倾。而由于战祸频连，人心思定，乱极待治，这是清初可能出现盛世的绝好条件。另外一个重要历史条件就是，积中国几千年发展尤其是唐以后各朝发展的经济基础，出现了虽历经封建主义压抑而仍旧挣扎破土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中外学术界公正指出的当时中国已占到全球财富总量1/3的经济实力。而这就意味着，当时中国的生产力要求着一个利于它发展的空间。由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便有了反映这一萌芽发展要求的思想，这就是明末出现的有点类似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意味的新思潮。其中，以黄宗羲等人针对明朝重农抑商的“本末”政策提出的“工商皆本”主张，和削弱君权尊重“天下”权利的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主张，最具时代代表性。

三个半世纪前以结社形式（如东林书院、复社等）成群出现的明末思想者中，黄宗羲的思想体系或许是最完整先进的。清华大学教授秦晖首先提出并被我国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所谓“黄宗羲定律”，应是世界上较早认识到农业社会发展极限的理论之一。不久前，温家宝总理曾

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如何摆脱“黄宗羲定律”怪圈这一思考题。我国农业经济历史悠久而发达，社会却终于不免落后，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及早走出以农为本的政策园囿，反而因朱元璋出于统治术的需要而更加强化了农本商末政策。所以，重新认识黄宗羲的思想，就不仅是思考怎样走出农税减了又增循环不已而农民总是不能脱贫的“积累莫返之害”怪圈问题，而是要把他“工商皆本”思想、大量减少胥吏（中下层官员）和削弱集权于一人的君权制度，建立民间权力制约机制等主张，联系起来作全面理解。胥吏过多必然加重农民负担，这是“积累莫返之害”根源之一。但大量胥吏虽是国家的脓疮，却又是加强皇权的需要。因此削弱君权就成了黄宗羲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心。而只有发展工商业，作为税收主要来源，才能从根本上减免农民税赋，并使更多的农民变成工商业劳动后备军，减少农业人口，逐步走出农业社会多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怪圈，进入更高发展层次。明末清初这种反映历史要求的思潮的出现，如果被权力中心认识和接受，就可转化为真正盛世契机。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指出作为一个关键性过渡时期：“18世纪是商业的世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2页）；而恩格斯用这样一段话来划分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74页）

事实上，从明朝中叶起，尽管抑商仍是国策，但民间商业仍发展很快。运河边上的盛泽由万把人的市镇，只因商人“集这里做丝绸买卖，不到百年成了十几万人的‘绸都’”，就是农业社会后期也即其高峰期商品生产活力必然会迸发的生动例子，



康熙



雍正

就是恩格斯所讲的“文明时代”的风雷已在天边乍隐乍现的鲜明现象。

此外，崇祯时吸取前朝镇压敢言之士激起苏州民变的教训，特别为大胆议政而遭流血镇压的东林书院一案平反昭雪，并允许比东林更为激进的复社存在，举行上千人的集会活动，使明末民间结社议政公开臧否官吏的风尚达到我国历史之最。崇祯也大胆起用了参加文社的一些人士如徐光启、史可法等。几个南明小朝廷更是大量起用包括张煌言、黄宗羲、瞿式耜等复社精英，并联合曾被称为“海盗”、“富甲东南”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海商集团，共同抗清。这些，固然有明末（包括南明）政权病急乱投医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其时一切已不决定于临近存亡关头的末代帝王主观动机，而是客观大势使然，是以崇拜集权的朱王朝统治力量彻底式微，而商业发展、商人利益冲击着不合时宜的“重本抑末”国策，中国式启蒙思想氤氲发作的时代大背景使然。在新的历史资料（指上文所指《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最新著作中的翔实历史数字）佐证下，应该认为，当时中国已有可能向“商业的世纪”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潜在动力。否则，所谓中世纪曾领先世界的中国GDP，靠农业而不是靠相当可观的商

业是创造不出来的。

总之，清朝所承接的正是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出露、与之相应的启蒙思潮有所活跃这样一个关键性过渡时期。这个王朝的运数——历史机遇实在是太好了。

然而，无情的史实却是，满族骑兵所至之处，随着朱明王朝残余的扫尽无遗，上述条件也成了划过黑暗天空的一个闪电，一种新的铁血秩序又建立起来了。

终未逃脱历史怪圈，其亡也忽焉

在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爱新觉罗家族是否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盛世，要拿到当时世界大历史背景下，去比较观察。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中国历史学界公认的三个盛世，前两个，即汉朝文、景、武之世，唐朝贞观、开元之世，也都是我国历史上文治武功显赫、疆域广大的盛世。但如果只以这些论盛世，那末以血与火征服欧亚两洲广大地域的蒙元帝国是不是更应该称盛世？所以还必须提出更多的比较、观察条件。

汉、唐与康雍乾之世之间，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汉、唐盛期，都是我国比较开放的时期之一。这决定了它们可以吸纳当时世界文明之精华，成为当时世界的强国，因而是评价盛世的一个必要标准。汉初之世，不仅天下大治，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开辟了丝绸之路，掀开了中西商品和文化交流的首页。当时西域一词涵盖很广，最远可包括大秦（罗马帝国）、大秦（阿拉伯帝国）。张骞在公元前2世纪到了中亚，他的副使到过南亚和西亚。而比张骞晚约两个世纪的班超，则派副使到了欧洲最强大的罗马帝国。中国轻柔华丽的丝绸曾风靡了欧洲上层社会，而成为中国古代一大骄人商品。到了唐朝，不仅扩大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交往，在长安建立颇具规模的四裔馆（外国人宾馆），很多西域商人甚至长期留居长安、洛阳等地，与汉人通婚，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从隋唐开始发展起来，从而使远销的商品量大增。在文化交流上，佛教是汉朝时传入中国的，而唐朝时容纳的宗教信仰更多，儒、道、释之外，景教（基督教派系之一）、摩尼教、伊斯兰教都是这时传入中国的。在

服饰、音乐、舞蹈、绘画等方面,唐朝人也接受了不少外来影响。因此完全可以说,开放是汉、唐盛世的重要特点。

唐以后,中国的开放又断续延伸了四个半世纪,在明朝开国后因禁海而中断。但明末利玛窦、汤若望等大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带来了西欧先进科技和学术,与崇祯朝重臣徐光启、李光藻等成为知交,被聘为钦天监。徐光启、李光藻甚至加入了天主教,引起一些保守派大臣激烈抨击,崇祯对此却不予过问。在一群中国文人参加下,西方天文、地舆、数学、历法、兵器学等被大量翻译引进,一时形成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小高潮。在明清政权易手后,西方商人寻求跟东方财富之国接触的努力,也以新的狂热开始。中国再次面临东西全面交流的客观形势。西方这种狂热来源于“新大陆”的发现和技术革命,使世界大棋局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所处的世界已蓦然扩大并面貌一新了。特别是,欧洲已处于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法治社会迅速转变阶段,作为人口小国商业大国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先后成为海上强国,把触角伸到中国周边。但清朝廷却继承明朝国策,紧闭国门。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海禁小有松弛,康熙仍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三卷468页)看来他是很以这种鸵鸟式避免危机的“远见”自负的。另一个上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故事是,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已战胜荷兰取得世界霸权地位的英国,派驻俄公使马嘎尔尼为特使,到承德面见乾隆,要求通商。清廷把他代表英国国王所赠礼物称作“贡物”,并要他对中国皇帝行跪拜礼。英王特使拒绝,竟致通商告吹。马嘎尔尼在这次出使《纪事》中以揶揄口气写道:“中国自从满洲鞑靼占领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满洲人打仗爱用弓箭,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已放弃弓箭而只用来复枪打仗时,他们愕然不解,认为在奔驰的马上射箭,比站在地上放枪豪迈。”

欧洲在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发明了蒸汽

机,逐渐广泛应用于生产和运输,大大提高了利润。而利润的刺激和商业竞争又不断引发新的技术革命,从而开始了西欧工业化进程。几乎同时,欧洲也开始了与经济同步的人文领域革命。作为社会主体和生产力第一要素的“人”,得到了空前尊重和解放。在民主浪潮下,西方一个个国王权杖落地。而正在“康雍乾盛世”期中的清朝,为了保持“以少制多”的特殊社会结构,却更加强化集权。其两手策略是一方面加强民族镇压,一方面加强民族拢络。镇压手段可举出:一、令汉人满族化,强迫剃发留辫,改穿满人服装,抗拒者杀无赦,甚至不惜屠城;二、实行民族等级制,满人优先,在京畿周围百万平方公里内强行圈地,分给满人贵族作为份地,把被夺去土地的汉人充当“包衣”(奴隶),在北京城进行民族隔离,内城汉民一律迁往外城(南城),内城只给满人居住;三、严禁文人结社,大肆查禁图书,大兴文字狱,仅庄廷珑、戴名世、吕留良三案受株连被杀者就超过万人。怀柔拢络手段可举出:一、对与满人合作的汉人给以优厚待遇,功高者封王晋爵;二、颁行“博学鸿词科”,对全国有学识有名望的汉人,经荐举,不管曾应试



乾 隆

与否,强行“请”到京师考试,赐给翰林学士名衔;三、依明朝旧制,严格八股文科考制度,使天下读书人只学习两种东西,即朱熹所注的经书和八股文范文,只要八股文做得好,就可当官。明清八股文考试制度,是一种鼓励士人大讲合格式的官方套话的制度,众口一词只说套活,久而久之就丧失了个性和思想能力,不仅没人再有异心,也没人去研究经世致用的东西了。曾以“四大发明”贡献于人类的中国人,后来殊少科技发明创造,与这种科考制度不无关系。而曾被西方欣赏的中国公务人才选拔方法的科举制度,最终成了束缚人民思想、圈定人才发展方向的有效统治手段之一。

特别是,对转而为清朝效力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等,先用后弃,一度投入监狱,并以“查禁异端”为名严禁天主教,耶稣会士从此绝迹中国;明末已翻译和待译的各种西方科技书籍也大多随传教书册(二者加起来共四五千种)散落流失。17世纪初开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断约二百年。

辩证规律说明:否定力量往往来自自身。满族皇帝强化自身权力的治术,却戕害了统治者的后代并戕害了整个国家。鸦片战争后,爱新觉罗王朝虽然没有马上覆灭,而是又苟延残喘170年。但越到后来,越形成一种外仰洋人鼻息,内赖汉族官吏支撑的死棋已定局面。爱新觉罗家族以及满族特权阶层越来越成为可怜巴巴的傀儡和大势已去仅存形骸的多余群体。一个曾以金戈铁马横扫中国而忽已发现膏肓重症的王朝,就这样构造了一个为衰世直接准备了充分条件的虚假“盛世”。

当欧罗巴人已经走向世界,几个文明古国如印度、埃及、中东阿拉伯诸国,已经沦为殖民地,从而表现出西欧资本主义与东方封建主义的质的差别的时候,清朝前期当权者们却仅有选择地留下传教士带来的自鸣钟、望远镜、地舆图等器物,以及红夷大炮(清人忌“夷”字,改称“红衣大炮”)制作方法,而无意学习乃至有意漠视西方所以强大起来的方法,更拒绝承认其物质文明深处的精神文明。中国人当时能够大颂“盛世”之歌,是因为离当时真正进入盛世的西欧较远,没有沦入另外几个文明古国亡国的命运。因而它是一个闭门自封的“盛世”,身旁没有或视如不见比较参照系的“盛世”。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没有顺应当时的世界历史走向,几个号称英明圣主的皇帝,看不到历史已经提供的机遇,没有使中国这样一个当时生产力正臻于世界前列的国家,顺理成章地走进先进国家行列。这一页历史,既生动地验证了落后的上层建筑可以多么顽固地阻止历史的脚步,也完全验证了这样的国家只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规律性命运。

“盛世”就这样为衰世准备了条件

“康雍乾盛世”就这样为其后世的衰亡直接准备了条件。甚至可以说,有几千年骄人历史的中国盛极而衰,其实也正是通过最后一个虚假“盛世”表现出来的。

尽管马克思把鸦片战争直斥为西方强国加于中国的“海盗式”战争,但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马克思对“天朝帝国”基于道义”的战争竟然失败,还是给予了冷峻的批判:“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716页)

为什么是“对联式悲歌”?因为“陈腐世界”扬起的是“道义”之旗,是免于亡国灭种自赎自救之旗,晚清无数慷慨悲歌之士,从林则徐、关天培,到邓世昌、刘铭传……高举这样的旗帜,向“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的“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奋争,却终不免失败。因为这是个不对称的“对联”,讲孔孟之道的古国的陈腐“道义”,被现代文明国家的“不文明”打垮。而这归根到底是自作自受,赖不得别人。这就是“悲歌”的悲情所在。

历史毕竟就这样走过来了,不允许推倒重来,也不允许假设。但历史允许回味,而且需要人们回味。如果不咀嚼回味并领受历史的馈赠,历史就失去了价值。所以恩格斯说:“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马克思说:“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责任编辑 致 中)

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郭嵩焘

● 朱 薇

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面临着翻天覆地的激烈变化，正如当时人所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西方列强与近代文明空前的挑战和冲击下，中华帝国迈开了艰难的近代化步伐。

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大体上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1840—1894），这属于器物层面的近代化时期。部分觉醒的知识分子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铁路轮机和生光电来维护清王朝的纲常纪要，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8—1911），这属于制度层面的近代化时期。其间，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还是在国会请愿运动中轰轰烈烈的立宪派，他们都认为改造中国首先是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等深层次的东西；第三阶段是五四新文化时期思想意识层面的近代化。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举起了“民主”、“科学”的大旗，开始了改造国民性和开启民智的反思。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进士点翰林，入值南书房行走，曾担任过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署理广东巡抚、诏受福建按察使，并曾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出使英法。他是近代化历程第一阶段的代表性思想家，但其思想又远远超越了同时期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他不仅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更强调了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文明，甚至远见卓识地觉察到了道德、人心、风俗的重要。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郭嵩焘不仅超越了器物的层面，而站到制度的层面，甚至更跨越到思想意识的层面上。其认识的深刻和超前惊世骇俗、振聋发聩。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

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看到了闭关自守的危机和朝廷士大夫的虚骄自大，承认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但他们认为所要学的和极尽赞赏的仅仅只是以洋枪、洋炮、洋船为表象的西方科学技术。郭嵩焘也曾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

他第一次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和比较系统地接触西方事物，是在咸丰六年（1856年）。这年年初，他曾奉曾国藩之命，赴江浙为湘军筹款。正月二十五日，他在杭州与浙江著名学者邵位西讨论“西洋测天之略”。他对自己最近在西洋读物上看到的“日心说”颇为怀疑。在和邵位西充分交换了各自看法之后，郭嵩焘似乎豁然开朗，满心新奇无以言表。二月初五他来到上海，初七



郭嵩焘



1870年李鸿章扩建的天津机器制造局

日他参观了上海洋泾浜法国人办的利名、泰兴两处洋行,看到了价格极其昂贵的风雨表和双眼千里镜。接着他又参观了领事馆的一处洋楼,他在日记中不仅详细记录了房屋的结构和陈设,甚至记录了领事馆洋人女子的生活习惯,以及在回船路上遇到的两个“秀美”的夷人小儿。初九日他在人陪同下前往参观火轮船。他全面介绍了英国富领事轮船的结构、各主要部件的作用以及工作原理。他还不厌其烦地描述洋人款待的酒食,即便是悬在轮船两旁随风摇摆的西洋吊床也没有逃过郭嵩焘的眼睛。最后他还考察了由西洋传教士麦都事创办的墨海书馆,并由此结识了著名科学家李善兰、王韬等人,觅得西人所撰《数学启蒙》和西人刊行的新闻报纸《遐迩贯珍》数部。在那里他还第一次看到了印刷机以及它工作的情况,情不自禁地赞叹说“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短暂的上海之行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虚心求教的态度表明了他对西洋器物的赞赏。此后,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和十一月间,郭嵩焘多次与友人何秋涛讨论俄罗斯史地,并向其索要论著《朔方备乘》仔细赏读;同年九月二十五日,郭嵩焘在日记中还特别提到了魏源《海国图志》近增一百卷,以及详细介绍西洋制器之法两本新书: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和邓复光的《镜镜论痴》。同治初年(1862年),郭嵩焘在上海、广东等地,继续接触

西人、西学。他从与李鸿章侃侃而谈,议论军事方略的英国军官身上看到了西洋也大有人在;他从英法联军会攻嘉定太平军,顷刻拿下的战况感到了洋人兵精器利,是为忧患;他在“得利洋行”第一次看到了碾麦的“火轮磨”和所谓“传书铁线”的电报,禁不住赞叹真是巧夺天工,称雄中国。

郭嵩焘一开始也相信以西洋先进的器物、技艺,嫁接中国传统的纲常政教就足以解决天朝所有的困惑。然而洋务实践的处处受阻,事事受挫,以及整个洋务事业的了无起色显然使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渐渐对中国固有政教习俗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他看到西洋也有二千多年的文明,它之所以富强并非偶然,有其自身的本末和体用,而根本在于政教风俗。洋务派极力效法西方的所谓“长技”,其实只不过是其“末节”而已。郭嵩焘这一思想的变化,清晰反映在不同时期他对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活动家做出的不同评价上。

早先,郭嵩焘在和友人谈论洋务时,对李鸿章、丁日昌和沈葆楨等洋务名臣大加赞赏,认为李能知其大,丁能致其精,沈能求其实,而自叹不如。可是若干年后,光绪四年(1878年)十月,当在巴黎担任驻法公使的郭嵩焘,看到李鸿章通篇谈论枪炮军械的折件,并得知其跃跃欲试计划购买德国制造的轮船时,毫不客气地说:李相伯考

察西洋军火虽然是很精通的,但是很可惜这些都只是洋人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而最根本,最精要之处李鸿章却没有注意到。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二十九日,郭嵩焘和友人张力臣谈论西洋政教风俗的本源。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张氏重新评价李、丁、沈三人的赞赏。在他看来,李鸿章、丁日昌和沈葆楨都一味地考求西洋富强的技术,对于西洋政教风俗毫不涉及。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即便是他们能够使中国的技术和西洋相匹敌,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些细节问题。更何况中国与西方在技术方面的差距也根本是无法丈量的。

因此光绪元年(1875年),郭嵩焘于《条议海防事宜》中,就最早在中国提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观点。他认为“本”是指政教和政治方面的创制,“末”是指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承认中国之“用”,即科学技术不如人,而不承认中国之“体”,即当时的封建制度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无疑割裂了体与用的统一关系。恰恰正是因为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才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所以在郭嵩焘看来,要使中国富强,不能光学西方的坚船利炮,也不能只学西方的工业制造,关键还是要首先从政治上进行改革,才算抓住了根本和基础,否则只能是舍本逐末。

郭嵩焘在出国之前对政治改革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和笼统,仅仅集中在对朝廷法度和纪律的剖析上。然而出使英法以后,他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明确。在担任英法公使期间,他对西方国家的新事物、新学理细加研究,勤加考求。初至英国后,他亲赴下议院听议员责诘政府,言语颇为强硬;他看到了西洋国家新闻报纸议论时政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衙门和议院行政、立法的分权;他注意到了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英国两党政治,较之专制政体的随声附和确实要高明多了。实地考察和潜心研究使郭嵩焘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看法。在和友人李丹崖讨论英国政治风气时,李氏不解为何平日里相处很好的两党议员,对于国政却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辩论的结果总是以人多为胜,败者一方也不会因此要挟为难。郭嵩焘发表一段十分精彩的议论,指出这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而不是政治人物个人品质的问题。他说西洋国家议会和两党相维系的施政保证比君主贤

德更靠得住一些。何以能如此呢?郭氏进而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千余字的日记,概述了英国由君权到民权的历史,不啻为一章英国政治简史,他说西洋国家长期稳定、国运昌盛的原因就在于有巴力门议院维持国是,由民自选的买阿尔衙门处理政务,上达民情。两者相辅相成,所以才能立国千百年而不败。他接着说限制君权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争取民权却容易得到人民拥护。他看到了中西政体国体的差异:中国崇君,西洋重民;中国强调德治,西洋则强调法治,国家的安危更加合理地系于法制的建立和健全基础之上,所以能够形成普遍的规范和约束;中国皇帝总揽大权,政策的推行依赖有限的官僚体制。西洋国家则凡事以民为本,将政权交给大臣和庶民,各国士民都可以参与国政得失的讨论,所以能够保持长久的稳定和繁荣。他大声疾呼:西洋的这种风气是最应该提倡的。由此,郭嵩焘肯定了英国的“巴力门”和“买阿尔”,从而否定了将天下的治乱和苍生的祸福完全系于最高统治者一人之身的“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政体。他说英国的强盛在于议院制的设立,日本也是因为仿效了西方的议院制才使国家走向繁荣的。对封建政治的不满和对议院制的赞赏,明确反映了他认识到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优越于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在近代思想史上,郭嵩焘倡导在中国开议院的政体主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外他还非常留心西方司法制度等其它社会政治制度,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改善监狱条件,废除过于严酷的刑罚等,这样才能受到西方列强的平等对待。光绪四年(1878年)驻英期间,郭嵩焘在一次与英人的讨论中,热情地描绘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蓝图:即在保留皇帝的前提下,其他一切,包括各项政治制度都要全面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资产阶级所渴望的“民主”和“民权”似乎都在这里隐约可见了。

郭嵩焘虽然批评舍本逐末的洋务思潮,但并未因此裹足不前,他同样深刻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等经济活动在强国之路上的重要作用。郭嵩焘在国内任职期间,即很关心生产、流通、交换等经济领域的事务。他在出使英法时期,更是十分注意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

济制度。在赴英途中,他和一个意大利的富商同舟,通过交谈,得知这个在国内是世爵,并获一等宝星的富商居然在伦敦开设洋行。贵族经商,这在贱商、抑商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郭嵩焘由此开始注意到中西经济生活领域的诸多不同。出国以后,他与英国著名的铁路专家史蒂芬森书信往来,讨论中国修建铁路事宜;他在英人陪同下至斯达佛访问煤铁各厂,参观炼钢轧钢、高炉出铁,并和矿工矿主攀谈;他参观了洋行、电报局、皇家造币厂、英格兰银行、税务局、织绣院、轮船机器厂、瓷窑……广泛接触到欧洲工业文明之后的郭嵩焘继续放眼西洋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并开始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来探索英国繁荣兴盛的原因。他诚恳地向井上馨、马格里等询问研究财政经济应当读什么样的书,得知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及詹姆士·密尔的《经济学》等经典著作;后来还反复与英、日学者和官员讨论中国的税收、矿物和铁路造价。他对英国官吏根据薪俸纳税的法则大加赞赏,并大胆地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在专制国家是行不通的。西方各国的统治者都十分关心商业的举措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谋求中国富强也要先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为最终引进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奠定物质基础。他大胆主张开埠通商。在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十八日的奏折中,他说古往今来治理国家,都是要招徕商贾,没有谁会把闭关绝市当作仁义来施行的。他甚至说多开一个口岸就多一个口岸的税收,对国家有利,对老百姓也没有坏处。他呼吁撤销出海禁令,鼓励人民从事近代造船业。他说,如果老百姓能够制造火轮船,那就是和洋人夺利,这和战场上的争胜负没有什么差别。他积极主张打破官府垄断,给商民更多自由经营的空间,从而成为近代民办工业的首倡者。他奏请纂成通商则例以保护商人利益,甚至主张让商人参政。他希望朝廷效法西方各国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求国富民强。这些思想的火花在仍重弹着重农抑商老调的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犹如空谷足音。

郭嵩焘数度成为晚清社会的风云人物,但是仕途的坎坷又使他最终处于天朝政治的边缘,所以他的体制改革思想在其生前对清廷的影响是有限的。然而在郭嵩焘作古十多年后,清王朝又

进行了最后一次的垂死挣扎——清末新政。从清廷这次改革的许多政治经济措施中我们都似曾相识地看到了郭嵩焘的影子。

思想的先行者总是孤寂和悲哀的。郭嵩焘倡导的“以通商为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以“政教为本”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的主张,均遭到了来自朝野上下的百般非议。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历史境遇,郭嵩焘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商业也好,改良政治也好,都必须从改变人心风俗做起。正如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一疏中论述的,只有使政教深入人心,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风气,才是最根本的出路。他通过对西方国家的考察和中西文化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深刻认识到道德、精神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当时的顽固派抱残守缺,拒绝学习任何西方的东西;即便是看起来先进的洋务派也只是单纯强调“师夷长技”,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至于在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域,他们也仍然固守着传统。郭嵩焘比同时代人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对传统的人心风俗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分析批判,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一种当时更为先进的人心风俗——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风气及其体系,并且进一步成为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滥觞。

风雨飘摇之中的晚清社会经济凋敝,吏治腐败,社会动荡,道德沦丧,价值迷失……然而走出国门的郭嵩焘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西方人永进无止、乐于趋公、不避艰辛、拱卫国家、风俗淳厚的精神面貌和两党相持、君民相随的民主风气。他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已经从整体上全面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中国在上世界上实已沦为文化二流之国了。他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心理、行为方式的批判,对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粉饰作伪以及好虚不实的传统人心风俗作了具体分析。同时他通过对英法的实地考察,对西方人的开放求实、积极奋进以及重商求利的民族精神颇为赞赏。

为了废除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传统人心风俗,他积极投身于实践。起初他寄希望于朝廷能够以身作则,风范天下,从而扭转世风日下的局面。他在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陛见皇帝时说,只要朝廷认真一段工夫,破除陈规陋习,老老

实实办事,那么就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天下的百姓自然跟着朝廷走,久而久之便会形成良好的风气。所以只要朝廷做个好榜样,社会风气便会好转。但是不争的事实击碎了郭嵩焘对满清统治者的幻想,他转而寄希望于士大夫能够积极进行风习教育。他认为政教的得失,纪纲法度的修废,士大夫无能为力,但却应该以改善人心风俗为己任。改善的方法无非是大力推行有益于人心风俗之事,而坚决反对有损人心风俗之事。他在晚年深切体会到人心风俗是立国之本,而挽回人心风俗必须从学校开始。只有学校修明,人心风俗才能够得到振兴,懵懂之人才能够被潜移默化。

他自己在解职返乡、赋闲家居时,更是以挽救人心风俗为责,孜孜于教育事业。他曾写信给长沙三大书院的山长,痛呈完善学校对于挽救民情的重要作用。他更是尽一己之力兴学、办学。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他参与湖南学政朱肯夫的兴学计划。他帮助拟定章程,建立经、史、文、艺各堂,还参考了严复草写的英、法两国的学馆课程。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主讲城南书院时创设了思贤讲舍,初衷除了要陶冶和培养人才外,还想有益于乡里国家,不单纯追求为学而学。但是在当时,要想建立一所全新的西式学校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若干课程如数学等,亦遭大忌。世风如此,他也只能着力于整顿风俗和转移风气,而不能奢谈其他。办学的艰难使郭嵩焘充分认识到人心风俗改造的难度,陈规陋习决非朝夕之功可以消除。他说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三十年可以告成,学习西方生产制造技术则需要五十年,而建立一所学校需待百年之后才大有收获。一百年清除陋习,一百年培养新人,再一百年稳固新风尚。振兴人心风俗需要不间断的三百年光阴。

如果说教育是人心风俗改造的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工作,那么禁烟则是眼前最具体入微的问题。郭嵩焘在英国时,就和英国禁烟会的友人有过私下的接触,对他们的行为表示赞同和感谢。他还亲自参加了英国人的禁烟会。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初八,郭嵩焘和副使刘锡鸿会奏朝廷请禁鸦片,他说朝廷对烟民应该宽限时日,辅以教化,最重要的是让人们从心里感到吸食鸦



19世纪末的上海海关大厦

片的可耻。返乡以后,他与友人一起筹备设立禁烟公社,商议禁烟公约,拟定每年集会四次。几乎每次集会都由郭嵩焘主讲,他反复宣讲鸦片流毒中国,人心风俗日益败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他号召人们要认清鸦片之毒害,下定决心洁身自好,不要沾染恶习,已经吸食成瘾的一定要坚决戒除。然而这样一个温和、公益性的工作,还是招致了时人的不满,禁烟活动步履维艰。即便如此,郭嵩焘依旧没有放弃,他告诉友人,自己之所以知难而不退,是因为禁烟确实有关人心风俗啊。

郭嵩焘在思考实现近代化的历程当中,甚至还触及到了人的近代化这一问题。他觉察到了国民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认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兴盛要靠国民的觉悟和奋起,渐渐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问题提上了历史议程,并且导引了国人认识自己,提高自身素质的探索。

郭嵩焘的许多思想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似乎已经走得太远,大大超出了封建主义本身所能调适的范畴,因而几乎受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他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只能败下阵来。这是郭嵩焘的悲哀,也是中国近代化的悲哀。然而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后,历史似乎依然走上了当年郭嵩焘指出的那条道路,所不同的只是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而已。(责任编辑 李晨)

虚导与实导

——精神现象零拾

●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导向,是指对人行为的引导。

能引导人行为的,有虚实两种。虚的,是理论的、舆论的引导。这一点,一向很受重视。要求舆论一律,思想一致、意志统一,不要有杂音,不要有噪音,哪里出现一点问题,就临渊履薄,抓得很紧很紧。实呢,就是利益的导向、物质的导向、实证的导向,这方面不能说没注意,但比之对虚导的重视,就远远不如了。然而,在我看,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实导远过于虚导。

比如说,图书出版是采用书号办法管理的,为的是防止没有版权的单位或个人乱出书。这办法已经沿用了几十年。每年有关部门都要核定各出版社书号的数量。有一个号,可以出一本书。书号管理,有关部门也曾三令五申:不要见利忘义,不准买卖书号,不准一号多书,不准以书代刊……为此,各种指令的、收费的学习、培训也搞了不少。虚导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但是,为什么买卖书号依然屡禁不绝呢?那就是因为在虚导之外,还有一个力度更大的导向存在。这是实打实可以量化的导向。出版图书有利可图——有的为了赚钱,有的为了出名(个人的或单位的),有的为了评职称,有的为了课题交差,当然,还有的为了某种纪念。为了种种利益要出书的人,因为没有书号,利益就不能兑现,只好同有书号的出版社打商量。于是原本不具价值的书号,因为需求的旺盛就成了可居的奇货。一家出版社,假若有三百个书号,拿出一半来卖,每个收取一两万(名目可以叫合作出版或管理费或其他什么),赚他一二百万不费吹灰之力。试想,那是怎样的诱惑,怎样的导向!于是,为了这掂得出斤两的实导,许多出版社竞相把费尽千辛万苦培训过的那些道理丢到了九霄云外,循着利益的导向



前进了。

学术刊物“评定 核心期刊”,本来是为了提高这些刊物的影响力,提升刊物的品格,形成优质期刊,发挥正确导向。可是一旦评定,刊物就面临着另一种更实际的导向。硕士、博士的学业,专业职称的评定,岗位任务的完成,都要有论文发表,而刊物版面也就成了他们竞买的“商品”。有钱,文章质量可以降低门槛;没钱,对不起,敬请另投。于是,“品格”也罢,“优质”也罢,往往成了纸上的空文,虚导的功效被实导冲销。

同样,如果只有少数贪官受到查处,而多数逍遥法外,如果权力滥用的风险很低而收益颇丰,如果弄虚作假能博得步步高升,那么,无论发表多少篇论述清正廉明、要说实话、要办实事的文章、讲话,都是很难改变人们观感,力挽官场颓风的。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虽然古有明训,但我始终怀疑这“言”的力量是被有意无意夸大了。加大了“言”责,也便有意无意缩小了“行”的责任。而天下的事,大抵是做坏的多。做得好,要说坏它也很难。在讲导向的时候,不要把力气都放在了虚的上头,而要注重实导。如果不注重实的改进,单是说得好,其效用有限,还可能掩盖或涂抹了实情,助长不良风气的孳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夫子说这句话时,也是有些感慨的吧。诗曰:

无言桃李下成蹊,乌雀恼人恰恰啼。
多种梧桐能引凤,遍栽荆棘鸟难栖。

本期: 终审 徐 孔

执行主编 李 晨

审校 赵友慈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举办2005年新春联谊会

我会于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活动中心举办2005年新春联谊会，在京的顾问、理事、会员、企业家等二百多人出席。张铨秀、朱光、李耀文、胥光义、贾若瑜、王定烈、蹇先佛、李昌、庄炎林、曾建徽、赵海峰、杜子端等老红军、老将军、老省长、老部长等到会(图1、2)。

联谊会由常务副会长张文彬主持(图3)。他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祝到会的同志鸡年大吉大利、新春快乐、阖家幸福。接着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曲润海向到会同志汇报了研究会2004年工作成绩和2005年工作安排。主管学术工作的常务副会长王俊义介绍了2004年学术工作完成的两件大事：在澳门成功举办“中西会通与文化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及首届“中华文化优秀著作奖”评审工作，同时介绍了2005年学术活动的安排。

接着文艺工作者和老年时装模特队表演了精彩节目(图4)。联谊会在充满欢乐、祥和气氛中结束。



呼唤工商文明

杨明斋为陈独秀鸣不平

“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

“孤岛”时期郑振铎抢救国宝

二十世纪初的新疆留学潮

我收藏毛选四卷的遭遇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